



www.duxiu.com

天津庄益電廠

# 內容提要

天津發電三廠是天津的第一座發電廠，到現在已有50几年的歷史。

它歷經了許多次變遷：法國資本家、比利時商人、日本財閥、國民黨統治者，他們都在這裡施展了滅絕人性的伎倆壓榨工人，來裝肥自己的肚腸。

可是我們的黨，早就這個發電廠里播下了革命的種子，因此儘管工人們受盡了剝削，但始終堅持着不懈的鬥爭。他們的勇敢，他們的智謀，都給了敵人沉重的打擊。這部歷史就生動地記述了這些壓迫和反壓迫的鬥爭史實。



天津工廠史從書

天津第一座發電廠

中國作家協會天津分會編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和平區6號)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執照津出字第006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 河北省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787×1092mm 1/32 印張 65/8 字數117,000

1960年4月第1版 196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8 100

## 天津工厂史丛书序

“天津工厂史丛书”的编辑出版，是想把从一九五八到一九五九年間，天津工人进行工厂史写作活动的成果，做一个初步的总结，以便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前进。

工厂史的写作，是由第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倡议的，并得到苏联共产党中央的赞同，和广大苏联作家和工人的热烈响应。在二十到三十年代期间，苏联工厂史的写作活动，在高尔基亲自主持下，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对苏联的工人阶级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整理和保存了大量有关苏联工业发展的宝贵史料，还培养了一批为数不小的优秀的工人阶级作家，成为整个苏联文学队伍的组成部分。

天津工厂史的写作活动，就是受到了苏联先进经验的启示，在中共天津市委和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和帮助下进行的。一九五八年，是一个伟大的、难忘的年代：中国人民以巨人般的步伐，跨过重重困难，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天津工人写作工厂史的活动，就是在这样的年月

GD2/2/1

开始的。工人们意气风发地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劳动，同时，回忆到了过去的黑暗年代，悲惨生活以及英勇的斗争，而更加鼓足干劲，为彻底埋葬旧生活，和迅速建立新生活进行了胜利的战斗。

“天津工厂史丛书”，可以说是这一时代精神特征的反映。虽然就其写作内容来说，大部分还是旧生活的回忆，但其中已经包含着有觉悟的对比；包含着对于已往反对帝国主义和阶级敌人的光荣自豪；而且对正在进行中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充满信心。就这个意义上说，一九五八年工厂史写作活动的发生和发展，正是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空前提高，革命热情高度昂扬的表现。事实上，写作工厂史活动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不但发动了数以万计的工人参加提供材料和进行写作，并且每一篇优秀的工厂史作品的出现，都立即变成了良好的工人教材，随时随地起到了鼓舞和教育的作用。同时，就是在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工人阶级集体写作工厂史的活动中，涌现出来了一批积极的、有才能的工人作者。

在写作工厂史的活动中，各工厂党委积极领导了这一工作。因此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获得比较大的成果。工会、青年团和一些高等学校的教师、学生，都是这一活动积极赞助和参加者。不少的作家，直接参与了编写和整理工厂史稿的工作。

“天津工厂史丛书”，就其内容来说，是丰富的；就形式来说，也是多样的。但是，这毕竟是一项新的工作，

是群众性的創作。關於它的許多想法和做法，以及作品的內容和形式，都還不能說是成熟的，還有待于在實踐中逐步解決。但是作為天津工人階級在描寫自己的生活和鬥爭，在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感情，在傳寫工人階級偉大的創造歷史的活動中，他們已經邁出了勇敢的第一步。

中國作家協會天津分会

一九五九年六月

# 目 录

## 上卷 变迁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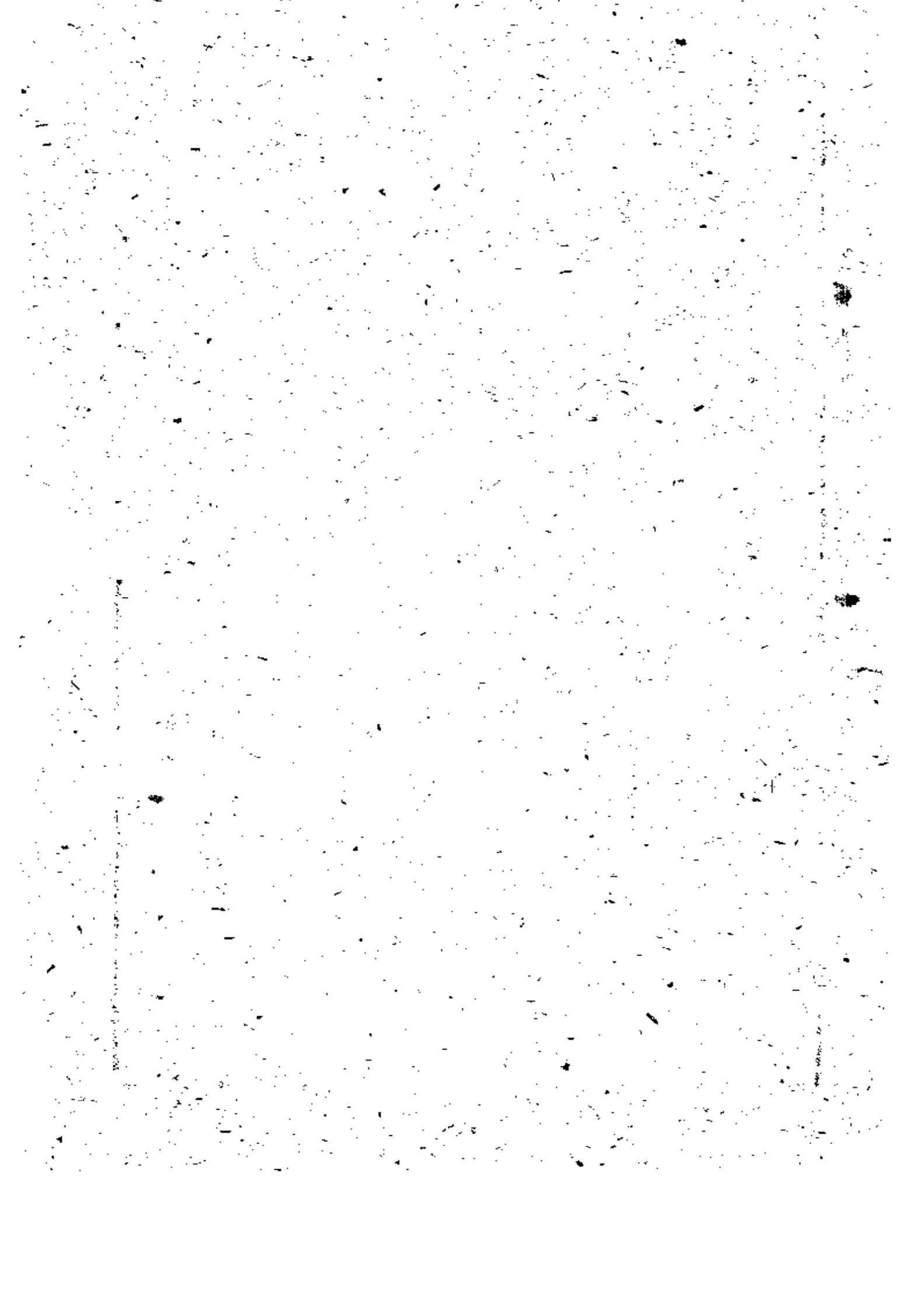
躲在望海楼教堂的后面.....	( 3 )
第一次罢工——争双月.....	( 10 )
第二次罢工.....	( 16 )
第三次罢工.....	( 34 )
从西洋鬼子手里轉到东洋鬼子手里.....	( 57 )
跟日本鬼子斗.....	( 61 )
血 债.....	( 70 )
又是一个朝代.....	( 78 )
包身工.....	( 87 )
解放之歌.....	( 107 )
电厂年青了.....	( 110 )

## 下卷 人物志

温兆宾.....	温兆宾 口述 ( 121 )
裴树林.....	裴树林 口述 ( 130 )
焦登潤.....	焦登潤 口述 ( 135 )
于庆云.....	于庆云 口述 ( 141 )

于文富	于文富	口述 (152)
馬增惠	馬增惠	口述 (158)
于恩源	于恩源	口述 (167)
趙樹才	趙樹才	口述 (185)
王庭芳	王庭芳	(191)

卷  
上  
遷  
志  
麥



## 躲在望海樓教堂的后面

金鐘河、大清河兩條濁流終於在天津的心臟地區匯合了。它們并成一股更大的水勢泄入海河，蜿蜒地向渤海灣流去。這三河相結的地方叫三岔河口。几百年來，几十年來，一直到今天，它都是天津的水陸要道，是內通外達的樞紐。

守在三岔河口上的，有座遠近馳名的望海樓教堂。這座青磚砌就的教堂，實質上是一座變相的碉堡。法國教士為什麼單單看上這塊地方，那是別有用意的。因為望海樓的鐘樓可以修的很高，法國神甫可借撞擊鐘聲之便，了望三岔河口上的船舶往來，以及對岸督署、衛城里的動靜。平時是文化侵略基地，戰時便是一座控制水陸要道的大寨了。不過，法國侵略者的算盤打得並不如意，望海樓教堂兩次被激怒了的人民群眾給燒光。特別是第二次，1870年5月（同治9年），因教堂戕害嬰兒，群眾激憤，当场打死法國領事丰大業，成為舉世震驚的“天津教案”。這場教案雖然由清政府奴顏卑膝，砍了十五位劳动人民的

头顛，給帝国主义找回一些面子来，就此結束；但是做为火燒望海樓的导火綫，那塊埋死孩子的亂葬崗子——“修女坟”和“小鬼庄”却成了法国神甫的一塊心病。吃了苦头学了乖，法国鬼子不敢再向坟地里埋死孩子了。光这样还不行，人們总管它叫“小鬼庄”，这个名儿在这个地带刺激性，对于教堂的影响还是不利。再一說，在他們看来，“小鬼庄”还是可以換錢的土地呀，怎么能讓白花花的銀子扔在地上呢，得想法子呀，一晃三十年过去，这才由法国駐津領事館的一位高級職員兼商人叫克立孟·布吉瑞的出面，向清政府交涉，要在“小鬼庄”坟地上蓋起一座發电厂来。当时的北洋大臣是袁世凱，自然唯命是从。于是就在1904年簽訂建厂條約，并圈購了附近的一些坟地，一共用地250亩左右。这个法国人并不是独資，是聯合比商世昌洋行一起訂約的，营业的区域以天津城內的鼓樓为中心，圓周六华里以内为限。这个世昌洋行的股东是谁，原来就是比利时国王王室。当时投資額很不小，是電灯電車一起办。后来布吉瑞又另办法租界电厂，整个移給比商了，所以这家公司的名称叫“比商電灯電車有限公司”。因而人們后来簡称这家电厂做“比国電灯房”。

电厂开初只有鎰驼机兩台，發电量每小时才一千瓦。1906年开始供电，發电量很少，主要是供官銀号城里一带用电。別瞧电量不大，可是买卖做得霸道，真称得起是一本万利，电费簡直和掠夺一般，貴的邪行！据当时給比商总办做翻譯的職員講，这家小小發电厂賺得的利潤，有个时

期足供比利时全国军队军费开支还有余，乍听起来，好像有些玄乎，但是细算一算账，却是半点儿也不假。我们就可以这家电厂在比商时期中间阶段的一年（1928）来算算看吧。这一年发电厂的发电量平均起来，每小时可以发电一万瓩，一天廿四小时共发电24万瓩。这些电卖给用户要多少钱呢？要兩角五分錢一瓩电。一天廿四小时就是六万元，一年三百六十天，恰好是1836万元。当然啦，发电量不可能每小时都是高负荷，减半计算，也很可观了。再说它的发电成本要用多少呢？每一瓩电的成本（包括人工、煤费、设备折旧一包在内）才合一分多钱。请看看外国资本家赚的是多少倍的利钱，这还不算，那时候，接一个电表先要交20元钱的押金，用户用电在四瓩以下的一律月收一元钱，四瓩以上的才按兩角五分一瓩电折合，里折外拐，它的利润真是连滚带翻呀。

比商对于中国职工的统治是秉承了西方帝国主义的手段分而治之的。工薪一律按日薪算，小工是每天兩角，临时工是兩角五，职员每天由五角到八角不等。工头是直接骑在工人头上的，给的薪金比职员还多，由一元到一元二角不等。通过几次罢工斗争，工人的日薪上升到平均七角到八角，职员由一元五角到两元。职员和工头还额外管房子住，灯水全不花钱。仿佛这是一块香饵，引诱着人们往上爬，越是骑在别人头上越有好处。把职员和工人严格的区别开。在工人之间，他们也还是分而治之，利用方牌和圆牌的不同，硬把工人划成两堆。挂圆牌的是长期的，正

式的工人，这些工人还能享受一些正式員工的福利；另一种是临时工挂方牌的，干一天說一天，那就什么都享受不到了。自然，这部份临时工，活不少干，錢却少拿，看着正式工未免眼热，总是尽量多做好做，盼望升为正式工。正式工有这么一帮临时工等着挤进来，当然也要战战兢兢，嘀嘀咕咕了。鬼子通过工头还經常在這裡面制造一些矛盾，生怕工人們團結起来，手段可是毒辣了。

比商的待遇和中国人比起来，那簡直是一天一地。駐厂的总办和副办的待遇高到每天要15元到20元的工資，厂里还供汽車用、三个侍候他的佣人、一人一栋三層楼房。公司总办的薪金每天要30元到40元，汽車楼房都更加講究之外，佣人增加到五至七人。虽然他們要中国人侍候，吃中国厨子做的洋餐，可是中国人却不能直接給他們送飯，他們嫌中国人髒。专为送飯設計了一个升降机。當他們需要吃饭的时候，一按电鈴，饭就从楼下送到楼上。吃完之后，一按电鈴，杯盤碟碗就又从楼上降到楼下来了。中國人是輕易不許进屋的。

因为發电厂是开在望海樓教堂的后面，又是利用“小鬼庄”坟地蓋起来的，所以一开头就和教堂里的神甫有著不可告人的瓜葛。教堂里不少神甫，經常开了后門，悄悄溜到这里，和这里的总办們一起大吃八喝，乱搞野妓。

当时河北一带，除去望海樓教堂的塔尖和电厂的大烟囱以外，周遭地区都是一片荒凉。每到望海樓教堂的鐘声

敲起，电厂值班的工人听得特别清楚，有的工人连忙用右手划一个十字，表示他们的感激和虔诚，要不是靠了教堂的引荐，他们怎么能吃上这碗饭呢？有的工人却暗自咬牙，想着为什么处处受洋人的拿捏，在这儿受这份穷罪。他们在高大的电厂楼房里干完活，出来却要踏着荒野到周乔庄一带去住。他们的住房都是用爐灰大焦子块砌起来的窑铺，冬不抗寒，夏不避热，有的一家老少三四辈只睡在半间房那么大的土炕上。人们能不恨吗？人们是恨得牙痒痒的。

教徒在电厂工人里起着统治的作用。这里，我们只說兩個人。一个是宗子明，一个是李寿山。

宗子明名义上是在鍋爐房看水，其实是千拿錢不办事的一霸，綽号宗胳膊。是一条单臂虎，那条胳膊是跟人家干架打下来的。他父亲在五十年前就信奉了天主教，和当时望海楼神甫养的一位打手是把兄弟，兩个人勾結起来，称霸一方。据说在群众起来，火燒望海楼的那一天，宗子明他爹也被約进教堂里来，帮着神甫们守堂，手持洋槍，打死了不少穷人。后来他怕人們报复他，就逃往外地去了。留下他的儿子宗子明，还在这一带晃蕩。神甫自然是另眼相看。到“电灯房”来，就是神甫荐来的。一来就是圓牌，拿头等工資。对人是张口就罵，动手就打，連把头都鋪他一头。

李寿山也是神甫荐来的，給比圖佑“傻魏”做总管，随后便当了大管事。这小子見錢眼黑，認錢不認人，长的嘛

瘦彌瘦的細高個，一臉小碎麻子，肉皮一松，麻子亂動，主意最多，就是把頭給比國佬送禮，也得有他一份，不然，他給穿个小鞋，准保讓你吃不了兜着走。大家給他賀了个外號叫李麻子。李麻子立下規矩，誰要想吃電廠這碗飯，不通過他不行。通過他先送兩袋洋白面，或是送對三錢多重的金戒子。

有回，在望海樓教堂做完禱告，李麻子跟宗祿臂走在一起了。宗祿臂說：“大哥，您給想想法子，讓我二弟也進電燈房吧。聽說現在沒空。”

麻子李的麻臉一松：“兄弟的事，你交我啦。好辦，好辦！”

他的主意真多，到了總管辦公室，指手划腳的分配完雜役的工作，他兩只貓眼就緊着扫一個姓侯的，這人不是教友，他早相准他了。

不大會兒，姓侯的跟另外兩個伙伴來了，路過這裡。李麻子把他們吆喝住：“來呀，有點事給辦一下。”

姓侯的他們不敢怠慢，連忙過來問：“李管事，嘛事呀？”

“今天上午你們到後邊總管院里打扫院子，把土箱倒了。完了事再進車間干活。”

“李管事，車間的頭不知道，活等着做呢，請您老另找人吧。”

“你們頭不知道，那沒關係，就說我叫你們干的。快去！快去！”李麻子不願意啦，肉皮一緊，麻子直動。

老侯他們一看，非去不可啦，只好先到比國總管的院子里來。一進門正看見一個穿着華麗睡衣的女人，塗着一臉脂粉在那兒聞花香呢。三個人沒敢過去，再一看牆角上的土箱打扫得干干淨淨；那裡有土？這是怎麼一回事？老侯覺着不对味兒，連忙問那二位：“這是叫咱們幹什麼來了？李麻子這小子餽主意可多。”

“反正是福不是禍，是禍逃不過。咱們快去車間吧。武大郎盤杠子，可別兩頭都够不上呀！”

“對。反正是搬倒葫蘆洒了油，要找碴，咱們等着吧。”這三人連忙趕回車間去了。

李麻子笑不及及的，溜進後院來了。見了總管就說：“總管，您看見剛才那三個工人了嗎？他們上班不干活，跑這兒看她來了，這些小子們不是好人。”說着直用眼睛斜那女人。

那女人是南市的暗娼。是李麻子給找來的。她明白李麻子意思，就說：“這些臭小工子，饑貓的眼睛，瞧這盯我的勁兒！”

比國佬犯醋勁了。當時和李麻子說：“把他們三人給我開除出厂！”

第二天，宗子明的弟弟宗禿子上班了。這天晚上，望海樓教堂里，李麻子又和宗賂聳見了面。宗賂聳張嘴先道謝：“大哥，多亏您了！兩袋面，我讓禿子給您送過去。”

“嗨，自家哥們，說這些子什麼。”其實，李麻子的算盤可打的緊，這一向不是兩袋面，是六袋面，他另外還上了兩個人！

## 第一次罢工——爭双月

虽然比商剥削中国工人的手段很残酷，但在充满穷困饥饿的旧中国，在遍地都是失业入們的貧苦年代里，能够一月拿上八、九、十塊來錢的工資，这在吃了上頓沒下頓的人們眼睛里，还不是金飯碗啊。因而人們曾經把“電燈房”这行飯和鐵路、郵局并列，認為是生活比較穩定，了不起的好事由呢。加上電厂規模很小，人數不多，所以一直到1920年底這才爆發了第一次罷工斗争。

表面来看，这一次罢工斗争是年关挤的。大家都想年根底下松快着点儿，还还飢荒，因而比照着有些洋行，有些大鋪戶的慣例，要求比商来个年終双薪，發双月。是自發的斗争，其实也飽含着时代斗争的气息。尽管这家發電厂的鐵門关得牢牢的，但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那股反帝爱国的風浪却已悄悄襲到这里来了。大家恨比国鬼子恨得牙痒痒，干柴烈火，所以一点就着了起来。

事情是从鍋爐房起來的。鍋爐房，当然誰都明白，这

是發电厂的最緊要部份，鍋爐要是不运转，怎么輸氣發電呢。鍋爐房的哥儿們明白他們一天流出来的汗够多么紧要，所以大伙一合計，拿捏他洋鬼子一手儿，在卅号这天，乘洋鬼子們准备过新年，欢渡除夕的当口，由彭头領着去找“大白脖”。这一下子就把“白脖”弄蒙了，年关底下横来这么一杠子，已經出乎意外了，更出意外的是由工头領着来的。工头是他們养的看家狗，怎么这当儿，胳膊肘儿朝外擰了呢？洋家伙耍洋脾气了，藍眼珠子一翻，也不說給，也不見工人。

彭头不舍乎，和穷哥們一齐张大了嗓子轟轟地喊着：“哥儿們放心，咱們一定讓‘大白脖’年底發紅！”

“不發双月不上工”，大伙把这一招端出来，不是吓唬他，当真把工具家伙扔了一地。

从早八点起不干活儿了，可也不走，等着“大白脖”答复。鍋爐房不冒蒸气，發电厂还有什么概念？“大白脖”耗到中午吃不住劲了。于是答复鍋爐房的工人，說是方牌工人不發紅，圓牌工人給加半个月的工資。瞧瞧这个答复吧，还在利用圓牌方牌打算挑起工人的不和呢！

大伙明白，这不是答复条件，干脆說，这是嗆火呀。嗆火就得給点顏色看，鍋爐房的哥儿們一人手里拿着一根木棒，一窝蜂儿拥到办公室门前。举着大棒子喊喝：

“給我們發双月！”

“不發双月不干活！”

“大白脖”先还不肯出头，好像和工人們見面，他就

扫了面子，输了这口气了。可是架不住大伙喊的厉害。而且，越喊人越多。这一拉队伍不要紧，全厂的各部門工人，都出来了。全厂罢工，将办公楼团团围住。逼得“大白脖”和工人照面了，嘴里也吐人言了。說道：“伙計們，大家不要鬧。有事商量商量好。”

光抹兩句甜話頂什么用。大伙忽拉一下子上来，把“白脖”围在当中。又是一陣喊喝：

“發双月！不給就不上工！”

“大白脖”一看，事情不妙。把他圍了个風雨不透，想跑也跑不了。真要是棍棒往下一落，不砸成肉醬，也好不了哪儿去。捏着鼻子他答应下来，全厂工人一律加發半月工資；算是年終双薪。

大伙一听，又是一片喊喝：“發一个月的！發一个月的！”

“大白脖”實行，是舍命不舍財的家伙。他有个推辞，要發整月的他做不了主，得請示公司。大伙七言八語的一合計，生怕“大白脖”借碴溜了，再不算話。于是就接受半月加薪的条件，結束了這場斗争。不过，当时的斗争經驗还太少，沒有料到外国資本家詭計多端，沒有讓他簽字，也沒有附帶任何保證条件，以为拿到錢也就完事大吉了呢。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大伙这一夜干的挺欢。等轉過年来，大清早晨，人們剛剛下班，“大白脖”的走狗，吃洋飯的刘三，帶着一批在電車廠修道砸石头的临时工进厂来了。二話不說，立刻



吹胡子瞪眼睛宣布：“鍋爐房的工人，不論圓牌方牌一律開除！”

誰也沒料到竟有这么一招！下了工，連洗個澡、換件衣服都不許，仗着那邊人多，竟推推搡搡的，全給擰出去。氣得大伙登時起誓：“你把我們開除！好吧，看你大鼻子藍眼珠子怎麼燒鍋爐發電！”

這時，“大白脖”呆在他那洋樓里，還很得意哩。心裏的話，讓你們要雙月的，讓你們帶頭鬧事的，我統通把你們的飯碗砸了。看你們怎麼辦！

怎麼辦？“大白脖”的算盤打得滿如意，只是差了一等。萬萬料想不到，這批臨時工，沒燒過鍋爐，瞎抓撓一陣，鍋爐燒的不跟勁，影響發電，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腳，“大白脖”這下子栽了！可是，這口氣還得壓下去。

壓了兩天，“大白脖”壓不過去了。於是又叫劉三出頭，把彭頭找到辦公室來。

一進屋，姓劉的先來了一臉嘻嘻哈哈，又讓坐又斟茶的。

彭頭沒坐，也不喝茶，粗聲粗氣地問他：“找我來，干嘛吧？有話就說，咱們別來這一套。”

“前天的事是誤會。”走狗樂呵呵地說，“要開除那幫龜雜子，就不能不連你也捎上，要不，他們非把你揍了不結。你說是吧？東家有話，你是事出無奈，這事不賴你，你沒錯，叫你回來，領着這伙新人，咳，都他媽的‘力巴頭’，接着燒鍋爐。你今天就上工吧。……”

彭头早料到这一層了，他們出去固然沒飯路，洋鬼子离开这批熟練工人也会玩不轉。他就盯問一声：“那我們這帮兄弟呢？”

“咳，有眼不識高低，跟外国人頂。管他們呢，死就死，活就活！”刘三哈哈地笑了兩笑。

沒等他笑完，彭头指着他的鼻子罵起來：“你這是想買我呀！想讓我爬門子，鑽狗洞呀！嘿嘿，你瞎了眼。我們窮哥兒們有義氣，要回來都回來，要走都走！”

合着是瞪着眼睛撞在牆上了。刘三吃了一頓掄白，冷笑一声：“胳膊擰不過大腿呀。你可別後悔！”

“中國人里头也有你這一號的。呸！”彭头一扭头，把門踹开，揚着脖子走了。

收買彭头沒有成功，洋鬼子不死心，又去收買別人。但是工人弟兄義氣為重，這一撥鍋爐工人各奔前程，堅持到底，沒有一个单独回头的。

工人們時常叨念彭头。他家就住在電廠的廠外邊，以後就在門口擺了个小香煙攤兒，賣点儿豌豆蘿卜糊口。但他一生都不輸這口氣，一直和電廠鬼子斗。以後，凡是電廠工人為了解恨，或為了糊口，偷出了廠里的東西就放在他這兒，他這兒成了轉運站。老彭頭總是拍拍胸脯，給哥兒們收藏着。

## 第二次罢工

比國佬統治工人有一套办法。在电厂里他們安着一种电表，大鼻子坐在办公室里，只要看看电表就知道推煤推灰工人干活的情况了，車一不动，电表便有标记，他們就出来检查。另一个办法，就是花錢雇流浪的老白俄来做监工，用鞭子抽打工人。

凭鞭子能治服工人么，那是白搭。他的鞭子越是晃来晃去的，工人们活儿越是干得少。只要他一转身，一出车间，大伙就聊的聊，睡的睡，谁也不干活了。这情况，車厂要比电厂还厉害，因为电厂的鍋爐不饑人，到时候它得张嘴要吃黑煤。車厂是修电車，是快是慢那內里的深沉可就大了。

光做活不出活，这是怎么一回事。老白俄讓比國佬問的一楞。他一研究，發現廁所有問題。其实廁所离车间远，来回走一趟得好几分钟，再加上廁所容量小，老是显着人們满满堂堂的。綠眼珠儿一斜，他认为毛病在这儿。于是立下一个“解手公签”。誰要是上廁所誰就得拿签，沒签

就是鬧痢疾漏肚也不准去。去的时间长了也不行，居然还要扣工资。理由是：大小便影响干活就必须扣一部份钱，以免比国资本家受了大小便的时间损失。这招儿真算是使绝了。谁不是又气又恨啊！

1929年，车厂的修配车间来了两位师傅，这二位年轻人是北京电车公司派来学习电焊技术的。来看一看，两人眉头子一皱多高。就说：“兄弟们，你们这样还行啊！连大小便都受辖治啊！是条牲口也得让它随便拉呀，尿呀的。”

“受不了，怎么办呢，洋鬼子开的买卖！”

“你们组织工会，大伙一抱团，跟他洋鬼子斗斗，他们就不敢这样欺侮咱们了。”接着他俩把北京电车公司如何组织工会，如何和外国资本家斗争的事儿，细说了一番。

大伙一听，劲头来了。谁不愿意组织工会呢。于是工会长工会短的，有一股风在人们之间传开了。

纸里包不住火。不消几天，自有耳报神把这消息通过把头传到比国佬的耳朵里了。好像工会这两个字儿是炸弹，吓得鬼子当天就把这两位派来学习的师傅给撵走了。

还是那句话，纸里包不住火。工人们立刻也知道比国佬怕成立工会了，也知道那两位师傅被撵走的事儿了。大伙是火上加油，要成立工会的心情更迫切了。而且要联合电厂工人一起罢工。

正这节骨眼上，忽然像吹气泡似的，冒出一个叫刘治

倫的來，他带头儿喊着要成立工会，私下里到处拉攏人。大伙都願意搞工会，可是誰心眼里也有个小六九，怕招風惹禍，不敢冒然出头。劉治倫既然带头，自然大伙全都贊成。这时橫插一杠子，又跑出个叫陳澤林的。這人腰板上好像支着一根頂門棍，別人不敢說的話他敢說，別人不敢招呼的事他敢招呼，成天价也是把搞工会的事兒挂在嘴皮子上。大伙一看，行啊，誰敢出头算誰的，也支持他。沒多久，工会成立了，理事会中推出他倆來負責。其實呀，他們這兩家伙是老虎帶數珠，假充善人来了。各有各的背景。劉治倫是壞分子，是比國人相中的一塊坏料，特地打發他出來搞工会的。原来，比國佬看出工会非搞不可了，他們便想，如其被动的等着工会讓別人抓去，何如搶先下手，搞個御用工会，守在自己脚边，一鼻孔出气呢，翻手云來復手雨，那多便當，陳澤林倒是工人出身，可他這人一腦門子升官發財思想，加入了国民党。国民党正大抓黃色工会，這個时期，天津各个工厂，无分大小，不論中西，都支起工会摊子来了。“比商電燈電車公司”油水很大，自然也是这批党棍子極想撈摸一把的地方，陳澤林正是他們派来的尖兵。就这样，兩派人物都挤到一个黃色工会里来了。究竟工会抓到誰手里呢，兩邊勢均力敵，于是搞了三個平行最高的常务理事。另一个落在老工人王桂芳头上。

在洋鬼子眼里，国民党是替他們办事的一群狗，那里放在眼里。嫌陳澤林插这一手儿碍事，于是毫不客气的下了手。头一天陳澤林当选，第二天他提着小飯盒，兴高采

烈地，一边哼着小調，一边搖搖晃晃地來到工廠。剛一迈进坎，就讓門房的人把他攔住了。說道：“外國人把你開除了！”

“啊，”陳澤林先是一楞，沒想到洋大人這麼沒面子。接着便冷笑了兩聲，他怕什麼？反正有地方找飯路去。就說：“沒關係，我不上班不要緊，也得讓我把那身破油包拿出來呀。”

“這我做不了主。”傳達室的人連忙跑到辦公室告訴了總辦。總辦生怕陳澤林在廠子里燭風點火，擲下兩個無形的炸彈，便派了兩個走狗跟他一塊兒去拿衣服。他進廠原想發作一通，可又不敢，只好挾着自己的油包，出厂去了。出厂以後，洋人管不着了，他的膽子也就大了。當天晚上，廠里的工人接到他寫來的一封公開信，希望大家無論如何也要跟外國鬼子干下去！

工人們聽說陳澤林為工會的事被開除，已經是火苗兒一着多高，再看到他寫來的号召大家鬥爭的信，大伙都急眼了。有人就說：“不能這樣看他被開除，要活一起活，要走一起走！”又有人出主意，馬上找陳澤林，一來是安慰他，二來是取得聯繫，接着在外邊干。

一看大伙的勁頭這麼足。劉治倫也披上一層人皮，雜在人群里头賣乖裝蒜，竟說：“走，咱們找陳澤林去，咱們干到底呀！”積郁已久的工人的怒火一下子爆發出來。罷工的局勢已經勢在必行了。

这天晚間，国民党市党部的会客室里灯光大亮，当时天津国民党的两个头目人孙墨池和莫子鎮正坐在沙發上，叨着烟卷，唧唧喳喳地商量着什么呢。門“呀”的一声推开，国民党市总工会主席席兴泉夹着大皮包也走进来。他一进门便喊：

“工人的火点起来了，要鬧呀！”

“比国人买賬不买賬呢。”那兩人緊着問。

“大鼻子眼睛朝天，还是不理这个碴儿。”

“好呀，讓他們也知道知道咱們国民党的厉害。非給他們点顏色看不可。”

“我的意見得大搞。”

“对，得大搞呀。”随后，这三个人小声儿叨咕起来，他們像是做什麼投机倒把的买卖，那么机密，那么謹严。

第二天，由黃色的总工会出头，召集車厂、电厂的工人开了一个全体职工大会。

孙墨池把昨天穿的考究衣服收拾起来，換上一件灰布大褂，站在一张小方凳上，朝大家喊着：“劳工兄弟們，你們辛苦了！”

工人们围了个里三層，外三層，兩只眼睛瞟着这位嘴里甜不罗索，但神气派头总有些看着別扭的人物，一时摸不清是那一类字号的。孙墨池不是单槍匹馬来的，早有他的下屬暗暗扇風，替他吹嘘了一番。說：“这是孙墨池呀，孙中山先生的侄子，市党部的負責人，专替工人办事

的。”工人們一听，来头不小，小会变大会，也就不再唧唧喳喳的了，聚精会神地听他說下去。

“弟兄們，勞工弟兄們！我們古老的，历史悠久的中國不幸得很，很不幸哪。”孙墨池可着嗓門一喊，还把胳膊一揮，这才又說下去。“由于滿清政府的腐敗无能，不事富國強兵之道，以至招來八国联軍的騷亂，使我們中國主權飽受摧殘。他們外國人在我們土地上办起来工厂，賺我們中國人的錢。而我們中国人，这富饒土地上的主人，却給他們当牛馬，受苦累，終日不得溫飽。过去我們屈服，由于政府无能，現在革命已經成功，北伐已經胜利，我們不能再忍气吞声了。我們要反抗，要爭取我們的自由，爭取我們的福利。弟兄們，起來吧！讓我們向外国資本家宣戰，提出我們的要求來。不答应我們的要求，我們就罢工。勞工弟兄們，我們不管資本家怎么样，努力斗争吧！為我們中国人的自尊、权利、荣誉斗争吧！兄弟我代表市工会，以万分的同情支持你們。你們斗争到底吧！你們为中国争光吧！”

大伙一听，甭管他那南腔北調的口音怎么难懂，总还是好听的話，打氣的話。那有白費唾沫的，于是大伙給鼓了一陣巴掌。

不过，吹完这通話，会也就散了。下面并无具体行動計劃。大伙是怎么来的还怎么回去。回去干什么？还是照样儿給洋鬼子干活。大伙这个嘟囔啊，有人說：“这是为嘛許的呢？大老远跑一趟，光听他嚷嚷一陣，回头燒鍋爐

的还是燒鍋爐，開電車的還是開電車呀！”那時節，國民黨在天津出頭露面還不久，打着“革命”的幌子，一時人們還摸不清是怎麼一回事，所以也沒往壞處想。其實呀，孫墨池這通講話，那兒是給大伙講的，那是給比國人講的。話里話外就是這麼一個意思，你們要是再不理我們黨部的碴兒，你們可估量着，吃不了讓你們兜着走！

偏偏，這些洋鬼子傲氣沖天，自踏上中國國土，要怎麼的就怎麼的，還沒碰上這樣的事呢。一群國民黨党棍子就放在他們眼睛里了，不慌不忙，給來了個相應不理。

過了幾天，由黨部給出主意，由工會出面向公司的資本家寫了一封公函。告訴他們，如果你們不做答復，我們可就要罷工了。洋鬼子看了這封信，這真是強盜遇上劫路的了，誰不明白誰呀？於是公司業務處的經理林三——林子香給回了一封信。回信的大意竟這麼說：中國人罷工不罷工對他們沒關係。你們要是不怕挨餓，你們就來！口氣好硬。

工會接到這封回信，正好用來向工人點火，於是又在車廠電廠召集大會，對大伙講：“洋鬼子說啦，說咱們要是不怕餓呀，就罷工。罷上一月、兩月、半年、一年，他們也不在乎，咱們可得餓死。比國佬是豁出去了，咱們有決心罷沒有？”

大伙一听這話，亂喊成一團。這個說：“這回非讓比國鬼子看看不結，別讓他小瞧中國工人！”那個講：“他們讓咱們罷一年。好呀，咱們按兩年給他招呼。”

當下工會跟大家商量，提了十項要求。這十項要求是：

- 一、陳澤林必須復工；
- 二、建立工人子弟學校；
- 三、年終發雙月；
- 四、不准無故開革工人；
- 五、職工傷亡給埋葬費一百元；
- 六、不准外國人查票；取消白俄監工；
- 七、所有員工一律給接電表用電；
- 八、發給工人工作服；
- 九、撤銷洋翻譯馬本宣等三人的職務；
- 十、實行三八制，每天八小時工作。

大家就這樣給資本家下了最後通牒。如果不答應，立即開始罷工。

可是怎樣，洋鬼子這回連信也不復了。他們要跟工人較較勁，他們以為他們一定得把中國工人餓趴下。

1929年6月11日到了。這天天津的街面上十分熱鬧，因為正是初夏，過端午節的日子，真是車如流水馬如龍，人們熙熙攘攘，電車站頭上淨是等着上車的人。突然由油漆工人于世清率領着一隊工人，在圍城的東西南北四條馬路上一站，一條路上五個人，都是些膀大腰粗的工人，他們朝電車喊喝着：“十點啦。停車啦，咱們罷工啦。”

立刻街口上的電車都停了。

电車上有查車的稽查，他們錢拿的多，跟工头是一撥，一看大伙不干了。他先嚷嚷开了：“你們为什么不开車？”

于世清是車厂里的油漆工人，整天油油刷刷，那摸的着說話呀，現在他不管这些了，掄起手里的大木棒，劈头蓋臉便打：“你敢破坏罢工！”工人起来了，那陣勢可不一样，吓得稽查夾着尾巴溜走。

警察過来了：“喂喂，快开车，不許破坏交通。”

“我們罢工了。跟洋鬼子干！”

“不行，我們不許罢工。”

可是，警察白嚷嚷，各路電閘都已关闭，車輛要开也开不了。

“不行，不行。你們把電閘拉开。”

“市长来了，我們也不拉。”

正这儿爭執不下呢，一輛汽車馳來。吱的一声停在他們身边。車門推开，兩個穿中山裝的人，先后鑽出車廂。一个是孙墨池，一个是莫子鎮。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多咱有过这样的事。孙墨池拉长臉子罵了警察一通，還說：“我讓停的。”隨後又換一付笑臉給工人們看。

饒挨了罵，警察还倒堆着笑臉，連聲：“是，是！”

接着騎自行車的警队开出来了。沿路曉諭警要保護罢工工人，不許發生冲突。

当真他們真心支持工人罢工斗争么？把戏当天就露着馬脚呢。行驶在“租界地”里的电車，因为帝国主义派兵

把住界口，强迫工人开电車，所以当天沒有停下来。孙墨池和莫子鎮却假裝沒看見，不敢撐腰了。还是工人們心齐，悄悄溜了号，第二天便也全停了。

当天罢工以后。电車工人集中到車厂子开大会。陈澤林按国民党市党部的授意，領着大队浩浩蕩蕩奔电厂来了。

电厂工人早就准备好了。只是为了維持社会秩序，發电照常，其余的人們手里拿着棒子，兩支队伍合成一股，一直奔河东总公司而来。公司里的工人也早做了准备，到时給开了大门。工人們涌了进去，把那一座考究的大楼围了个密密扎扎。有的人們便在陈澤林帶領之下冲进办公室里来。

比国佬半躺在沙發上，强做鎮靜，瞧那股子穩重劲儿，亞賽樓里樓外沒来一个人似的。他那把中国工人看在眼里？

工人們喊了一声，一嗓子就把这位高貴的总管吓得立起来。他端了端肩膀。

“喂，我們提的十項条件为什么不答复？”“限你廿四小時答复！”

人多聲音重。比国佬吃不住劲了，連忙摆手說：“伙計們，不是我不答复，是我无权答复。我要請示本国政府。……”

明摆着这是胡弄人的事。工人逼到这儿，原可以再攻下去。洋鬼子的那股子傲气已經吓得沒影儿了。可惜領头的是陈澤林，这小子是国民党員，唱双簧，去小跑的，他生

怕把洋鬼子吓着，真要挤出点事来，他吃不了兜着走。赶忙见好就收，楞把大伙喊出来了。说是等几天，看他们怎样答复。倒替洋鬼子解了围。

工人們前脚走了。后脚，比国佬就把买办林三、林子香叫进办公室来，一肚子邪火全泄在他身上，“你那里去了！工人們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

林三笑笑，这小子一肚子的坏水，立刻给他洋主子献上一条毒計，說是国民党这样搞，純粹是利用工人炸咱们的肉醬，咱们也可以利用工人炸他們一下。把工人煽起来，工人什么事干不起来，說着，便如此这般地朝总办直咬耳朵。比国佬听了，呵呵地笑了起来。

原来这家伙使了一計。这天夜晚，派出一批狗腿子乘天黑摸进轉电处，打算破坏輸電線路，这样一来，半个天津都得漆黑一片，事情鬧大，洋鬼子他們可以倒咬一口，說是工人罢工破坏供电，扣住这个帽子就好办事了。国民党也就不敢再利用工人了。

不料想，工人們的糾察大队真有本事。狗腿子摸进去的时候，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并无动静。等到下手破坏的那一剎那，好嘛，糾察队员突然从暗处闪了出来。闹了个捉賊帶貯，当场抓住一个。偷雞不着失把米，林三的鬼計露了餡。

按說，比国佬唆使走狗破坏轉电处，是一樁了不得的扰乱治安，破坏社会秩序的大罪，應該严加处理。結果你猜怎么着？洋鬼子还是躺在他的沙發上，連問一声也没有。

人間，倒是警察局調來大批警察，把工人們看住。說是防止破壞活動。瞧瞧國民黨棍子這一套花招兒吧，他們是要利用工人，又怕工人起來。工人這麼齊心，糾察隊又這麼有本事，雖然工人手無寸鐵，拿的只是木棒，但是他們却不得不防范一二了。工人真要起來，那還了得！他們有些嘀咕。

更使他們犯嘀咕的是：工人的罷工堅持下來，從兄弟二廠，從各个角落得到了支援和同情。工人階級團結的力量當時是很強大的。最先到電廠來慰問的是鐵路職工代表，他和罷工的哥兒們說：“咱們工人不怕餓肚子，你們別愁錢不錢的，我們鐵路工人堅決支持你們。一張火車票增加幾分錢就够大家生活用的了。你們鬥爭到底吧，有我們支持你們！”就這幾句話，給了工人多大的力量！但這只是开头，接着，裕大紗廠，裕源紗廠，電話局……都派來了代表，表示支持和援助。他們不光帶鼓勵和友情來，還用車拉來饅頭、汽水、餛子，許多吃食。真是“千里送鵝毛，禮輕人意重”。有些工人吃着饅頭，激動得淚水嘩嘩地向下滾。不光是送吃食來，有些工廠還派了慰問團、話劇團，給罷工的弟兄們演出，那真是熱火朝天，把大家的心連成一片。接着，不光本市的工人伸出來援助的手，上海、漢口各地的工人也都拍來了電報支援車廠電廠的罷工運動！工人的力量很大呀！大伙的決心可大了！看到這種光景，一些党棍子更是暗吃一驚，絕大多數工會都是他們掌握着的，怎麼會搞的這麼熱火朝天呀？怎麼這麼熱情

呀？这里面是不是有共产党在操纵呀？他们心里打鼓，赶紧派人深入下来调查。这一调查不吃紧，可把他们吓傻了！

原来在罢工的第三天，共产党地下顺直省委①于6月13日发出一个“援助天津电车工人罢工事”的紧急通知。这个通知分析了这次罢工是工人們反帝意志高涨，不甘受洋人气，同时要求改善生活，反抗工資少、工作重的一项革命活动。党要积极支持，援助这次罢工运动，并要引起各界民众的重视，引导成为全民的合法的收回电灯电車运动。党还为这次运动制訂了14条口号。口号是：

- 17、增加工資！
- 27、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 37、不論长短工一律要花紅！
- 47、不論长短工疾病时一律照發工資！
- 57、各种紀念日放假，有工作者要双資！
- 67、恢复被开除工人工作！
- 77、罢工期内照給工資！
- 87、坚持罢工胜利到底！
- 97、坚持无条件收回电車电灯公司！
- 107、沒收帝国主义在华产业！
- 117、收回租界！
- 127、撤退帝国主义在华駐軍！

---

① 当时党的河北省委叫顺直省委。

137：驅逐一切帝国主义滾出中国去！

147：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国民政府！

另外，还具体的指出紧急动员以下兩项工作：一是組織电車电灯公司工人罢工后援会等团体，向各界展开宣傳和捐募援助；二是推动当地工人进行斗争。

这就难怪为什么各界响应，那么多工会都来支援，而且搞得这样热火朝天了。国民党市党部几个头目人，吓得都低下头去。原是想趁火打劫，把持工人斗争，捞票油水，没想到共产党把工人斗争运动向广度深度的方面推进了一步！这就叫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全慌神儿了。

党棍子慌神儿，比国佬也慌神儿了。風潮越闹越大，工人們一握手不吃紧，他們这才明白，懂得，尝到这股味儿。这那儿是餓死中国工人，干脆是跟自己的腰包过不去呀，是自己給自己堵了进錢的道儿。事情是非破綻不能解决了。洋鬼子的眼睛不再朝天了。由林子香出头和当地党政軍三路大头談条件。要求把風潮压住。

談判的結果是，原来想多要的不敢再滿天要价了；怕共产党把工人斗争运动再發展开来；原来想少花几个小錢就把这群党棍子打發走的，也忍痛多掏了几个。双方的买卖一拍即合。共訂了四大条款。第一条是比国佬出六十万元名曰軍事捐款，捐給当时正在进行南北大战的北方軍閥閻錫山和馮玉祥。其实这錢拿到手后，由他們按勢力和官职大小分派了，多的一千，少的五百、三百不等，搶分一光。第二条款是国民党要派宪兵、巡警看門，压迫工人，

这条是錢沒到手已經照办了。第三条款是公司紅利，每年要抽十分之一給天津市府。实际上就是从此开例，要对中国党政要人、一些地头蛇进行馈送。第四条款是国民党政府要帮助公司清查电表，催收电费。从这四条看来，比国佬虽是拉下点肉来，但有政府帮助清查电表，确实好处也不小哩。

罢工的第十四天上，6月24日的早晨，黃色工会大头目席兴泉便召集車厂电厂上午上班的职工一齐开会。他一上台，双手一張，大声嚷道：

“弟兄們，我祝賀你們，我向你們道喜。我告訴你們一个好消息。通过我們国民党党部的支持，我們总工会的援助，兄弟我个人的热情，你們提的条件，比国資本家已經答复了，你們今天可以复工了。”

說到这里，陈澤林站出来了，他得把这出戏帮着唱下来，破开銅鑼嗓子，一陣儿吆喝：“弟兄們，我們勝利了，比国佬被我們打敗了呀！大家鼓掌呀！”

一陣鼓掌过后，有的工人就問是怎么答复的，那条同意，那条不同意，七言八語的問題还真不少。工人們不相信磁公雞拔毛，比国佬竟有这么痛快的。

席兴泉挂火儿了，問題并不答复，只是这么說：“你們已經勝利了。勝利了还要怎么的？我告訴你們，你們明天都要复工，假若你們不复工，保安队可要拿槍打你們。你們不复工，誰要出头誰就是共产党；你們誰出头呀，誰是共产党呀？”这小子把嗓音拉长，兩只賊眼乱扫。

大伙听了一怔，誰也不敢再問了。这儿有頂紅帽子等着往下扣呢！这时候，陳澤林又出来了：“我們的条件全答应了。我就复工啦。我又回来啦！”

紅嘴白牙；既是說的这么板上釘釘，那还假的了么？大伙也就半信半疑，罢工就此結束。

工人們也許想算完啦，但是比國佬却不肯罢休；心里是一鍋开水，乱滾一陣，那里肯服。別出毒招来和工人們干。

头一天一复工就出了事：工人們上班来了，好哇；那些破坏工人罢工运动，替洋鬼子当打手，当小跑的工賊，原来被工人群众打走了的四十来号人，也来复工了。工人一看，真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怎么着，白白罢了这么十三天工，到头来还讓你們这些工賊監視着我們哪？大伙不由分說，上去就把这些工賊們揪住。比國佬蘆法出来了，他替这些工賊說話：“他們是好工人，他們要复工！”

工人們的滿腹怒火正沒处出呢，一声喊喝，拳腳齐上，看你藍眼珠大鼻子又怎么样，按住蘆法一頓好摸。这一摸不要紧，蘆法的腿被打折了。陳澤林一看惹了事，就喊大伙：“讓一讓吧！”大伙心裏有数，把洋鬼子的大腿打折，事情不小，也就一个个溜之乎也了。蘆法被送进医院去了，但究竟是誰打的他，連他也找不着号。

乘这乱劲，工賊們复工了。陳澤林一看，这不是事，他們这些工賊非和工人敵对不可。連忙跑到市党部問怎么

办，市党部的党棍子們連他也不理碴了，冷着个臉蛋子說：“不准罢工反对資本家。你們要打官司办交涉有法院。一定要合法。”就这合法兩字把工人的斗争又給压下了！

比国佬的算盤打的緊。这不是受了些損失，又掏了几十万元的腰包么？有道是羊身上丟的羊身上找。于是鬼子緊跟着便搞了个電車加價計劃。原来的車費是三个小銅子，如今打算翻个儿，一律收三大枚，要加倍的價錢。

为賺大利，少不得也得先花几个打發的小錢，比商往国民党的市政府和市党部都下了注。可是，他們誰搶着是誰的，那些撈不上的，未免饑涎欲滴，好哇，罢工撈一笔，加價又撈一笔。不打点够了还行。于是有人就支使一些抽白面的，扎嘴啡的游民在電車上演說，搗亂，那些辭兒都很漂亮，什么“帝国主义剥削我們！”什么“为了大众的利益反对加价呀！”这一来不吃緊，国民党內部的头目人展开了狗咬狗的內爭。爭來爭去，發展到这么一天，全市工会召集工人在中山路的河北公园开大会，当场打手和工人群毆，借这机会，这个系派把那个系派頂走了。

在开大会当中，車厂电厂工人不知底細，有几个人受了伤，还有一些人把衣服撕了扯了。真是乱攬一鍋粥，工人們直喊丧气！那曉得大伙却又受了国民党和比国佬的一次利用，从此加价的事儿就順利實現了。比国佬的錢刮得更多了。

錢多了，得喂一喂手下的狗呀，再說，公司答应了那么多的条件，总得晃晃大伙眼神，实现一条呀！于是比国佬批給了工会七千元現洋，說是为了酬謝大家的。可这錢發出来，不貼布告，不提用項，暗含着由林子香轉到刘治倫手里。他們把錢吞吃了个一光二淨。却讓手下人跑到工人里吹風兒，說：“錢是發下来啦，大伙可沒見呀！都在誰手里哪？”“在誰手里，当然在工会主席陳澤林手里。”

“咦，他把錢弄哪儿去啦？”“你們还不知道，这小子拿这笔洋錢胡吃海花，在皇宫影院包了个女招待呀！”这股風吹来吹去，吹到陳澤林的耳朵里了。他正为这笔錢急得坐不是臥不是呢。怎么，現在錢發下来了，他一个沒撈上，倒落的背上这么个黑鍋！气得他去問比国佬，比国佬就向外推，气得他去問刘治倫，刘治倫說謊油油滑滑不沾边儿。陳澤林冒火儿了，找国民党市党部的头目人去了，到了那儿，又是一鼻子灰。真是兜头一桶冷水，到这时候他才明白自己是多么可憐的人，是一个被愚弄的角色。有口难分辯，大伙原来就对他不满意，答应的复工条件怎么一条都不实行呢，再加上这些風言風語鬧的，誰也不用正眼瞧他，鬧了个威信扫地，里外不是人。連急带气，陳澤林便得了一場夹气伤寒，倒在炕上，沒过多久，便嗚呼哀哉了。比国佬这一着又胜利了，到底把一棵眼中釘拔掉。折腾半天，总算工会是理想中的御用工会了。哈哈，連国民党的狗他們也不容啊。

## 第三次罢工

比国佬和买办林三自以为鬼计得逞，连国民党的一条小尾巴都给排挤得一命哀哉了，天下还不是他们洋人的！工会由刘治偷把持，更是从此太平无事。所以比国佬对待工人的威风就抖得更足。什么条件，楞来了个推翻不算，没有一条实行的！

工人服这一套吗？当然不服。谁也是窝着一肚子火气，嘟嘟囔囔，等时机爆发。后来事情发生在这个出缺的常务理事职位的问题上了。工人坚持要补上一个新的来，资本家不同意。拉了很长时期的锯，才由一个叫张广兴的补上来。张广兴是个俊俏的小伙子，那年才24岁，是公司的一个抄表员。原来文化水平也很低，渝县人，在乡下念过几年小学，后来便通过一位本家叔叔托情到“比商电灯电车公司”来了。这个年轻人很有雄心大志，白天抄表，晚上还到法汉中学夜校去学习，很懂得用功。而且他为人刻苦朴实，不吃喝玩乐，有点儿富裕钱便去买一点杂志新书看。懂得思索一些什么事情。如今老工人回忆起他来，还

說：“人家張廣興是好樣的，能說能道，又是赤胆俠骨，好交朋友，好联系群众。”自然，像他这样人物要被大家推选上台了。

他所以能够代替陳澤林，自然还另有原因。因为他也是国民党員。經常把这个身份挂在他的嘴皮子上。他上台以后，常务理事是三头为大，沒有一个总干事了。什么事全得三个常务理事联銜蓋圖章。所以并初先施了个时期，称得起是相安无事。

但是，比国佬却心狠手辣，毒計一招跟着一招来，打算把所有的老工人，特別是参加过1929年罢工的那些工人，都抓碴开革。另外一着便是只出入不进人，要职工越来越少。比国佬是懂得人多浪大这条道理的，兩個厂子合在一起一千来人，委实是受不了呀。活忙的时候，比国佬就找工头外包，这样一来，他就不怕什么罢工的威胁了，因为干活的人和公司沒有什么雇佣关系。但这样还不算，还要停止增薪（按公司旧例每年增薪一次，一次可增几分錢），还要取消已有的福利。比国佬的面孔越来越冷，特別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更是把中国工人当做亡国奴看。

工人吃这一套么？不行，千柴烈火，越着越高，最后在1932年10月14日，召开了“比商電灯電車公司工会”代表大会。出席代表212人，张广兴被推选做大会主席，当场向比国资本家提出十項条件。条件的內容是：

- 一、設立工人子弟学校，月增教育費200元；
- 二、給职工免費乘电車，免費用电的待遇；

- 三、年終發花紅；
- 四、工人在工作時一律發給官衣；
- 五、工友有死亡者發給葬埋費200元；
- 六、每個工人由公司代買兩袋牌價面；
- 七、職工工齡達22年的加發一年工薪做為養老金；
- 八、在定額以內節約用煤，發給職工煤賞；
- 九、病假不扣工資；
- 十、給工人解決宿舍住房；

比國佬接到工會的意見書，恨得直啄牙花子。心里罵道：“你們這群臭工人忘記自己是老几了，你們要上天哪！”如出一轍，洋鬼子表面不露聲色，擺出洋大人高高在上的嘴臉，又來了个不答不理！

就跟上一次罷工一樣，國民黨市黨部聞着腥味，党棍子們又來伸手了。只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地面上換了一撥子新的地頭蛇而已。如今已非南北大戰那時局面，正是奉系坐天下的時代，市長是周榮光，市黨部里有邵華和時子周，省委里面有張厲生、嚴智怡，這些錢串子們早就耳聞上次罷工，如何炸醬的事兒了。這回是機會湊手，如何肯輕輕放过？于是假惺惺地代工人們辦起交涉來了。

比國佬跟买办林三一合計，這筆款子有上回的數目擺着，能多不能少呀。這錢挖的未免心痛。洋鬼子這回鬼头多了，幅氣擋不住多花錢；這是何苦來？便由林三出頭，悄悄把張廣興約來。在他辦公室里密談一番。

林子香和張廣興一碰面，這小子先笑唧唧的朝他一堅

大擇哥，說道：“廣興，你真是好樣的，我真佩服你，這手兒搞的多漂亮啊。”

張廣興已經料出几分來了。他也會不動聲色，只是說：“到底什麼時候答复工人呢？老這麼拖下去要出事哩！”

“咳，出事不出事，都在老弟你啦。”林三說到這兒，干笑兩聲，隨後又講：“咱們有錢花在自己人身上。這事只要你不管，抽手一走，兄弟，你發洋財了，這個數！”林三把話打住，朝他眼前伸出兩個大手指來。

張廣興看也沒看，不做聲兒。

“好吧，咱們剃頭圖涼快，我給你再添個數！”林三又伸了一個手指出來。

張廣興這人可有計謀，還是不聲不響。

林三干咳了兩聲，又笑了兩笑，點點頭。“好哇，你年輕輕的真辣啊。行，我佩服你，我成全你。這樣吧，再加個碼兒，四萬塊。”林三把四個手指直晃到他鼻子跟前，嚷起來：“廣興，見好就收。可以啦，太可以啦。你算算吧，你一個月才拿三十幾塊錢，你一年才拿三百多塊錢，十年才拿三千來塊錢，你就是活一百年也拿不到這四萬塊錢。你算算吧，拿回去置房子買地做买卖，干什么不夠啊？”

逼到這兒。張廣興忍无可忍，這才頂了他一句：“我謝謝你的好意，你給我算的挺好，錢也給的不在少數。拿這錢發財做买卖嘛，那自然是够折騰一氣的了。可惜我不

想發財，不做买卖，我是替工人大伙办事，我是人，不是狗！”

这一嚷不吃紧，把个林三嚷的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万沒想到鼻子碰在城牆上了！他把笑臉收住，冷笑兩声，說道：“你可別不識好歹，我要買你的命，花不了几个錢！”

張廣興也不含忽，說道：“你也別不識好歹，工人們干起來，够你瞧的。你不是有錢能買人么？好，你就拿錢花去吧！”說完，他扭头走了出來。

不敢怠慢，張廣興連忙跑到國民黨市黨部來。把這情況和頭目人一說。把這幾頭餓狼餓狗都氣壞了。他們咬牙切齒地說道：“好哇，好哇，比國佬也太錢狠了。這倆錢說什么也不放啊。拿四萬塊錢就想把事情壓下去呀，沒那麼便宜的事！廣興同志你做的太對了。”

廣興便也裝做“同志”的樣兒，乘機獻策：“我們得大搞，得支持工人們罷工啊！”

“罷工？”幾個頭目人有點害怕。半晌才有誰喃喃地說了一句：“万一要是讓共產黨利用上，點起火來呢？”

“不會，不會！有我，有我哪！”張廣興一拍胸脯。这几个頭目人一想，廣興是國民黨黨員，他能掌握住，便不會出大漏子，還是炸比國佬的肉醬，發洋財的事兒要緊。就說：“罷工事情太大，得問一下市長啊。”

那時候，國民黨黨部和國民黨市政府總是碟兒碗兒的碰得叮當亂响。要步驟一致，還得協商，就由張廣興以工

会代表的身份跑去見市长周荣光。这位周市长上得台来；兩袖正嫌風清，急着要大把抓錢呢。听张广兴來請求支持他們电厂車厂工人罢工的事儿，正中下怀，这不是肥猪拱門么？这不是給他市长送大洋錢来了么，登时眉开眼笑，反倒給张广兴打气。說道：“比國資本家这样压迫我們工人，这是帝国主义侵略，工人要求罢工是正当的，政府一定支持，兄弟我嘛也一定帮忙。哈哈……”这一关也打通了。

这天，九月十二日，天剛蒙蒙亮。深秋的早晨格外清涼，一群群工人往电南厂子走来。这里由工会临时召集了一个大会。

人們黑鴉鴉的圍了一片。从人群中直立起来，张广兴举起喇叭筒朝大家喊道：

“弟兄們！公司資本家拖了又拖，結果是十項条件，一項也不接受。好吧，我們給他一个厉害看看。从今天起，我們罢工了。但咱們罢工不能影响社会秩序，咱們電車还是照樣開，只有一样，隨便坐車不要錢。讓咱們中國老百姓也沾点光。他們帝国主义賺咱們中国洋錢賺的太多了，也讓他們吐点儿出来吧！”

黑鴉鴉的人群里爆起一片笑声。这个办法太好了，大家都拥护，一來不誤大家坐車办事，二來比國資本家还得往外貼本，比不干活还讓洋人难受，这簡直是拉他們的肉呀！

張廣興又一揮手，喊道：“咱們電廠的哥兒們也照常燒鍋爐送電，可就是查電表的不查，收電費的不收電錢，讓中國人白用電燈吧！”

大家又是一陣哄笑。笑聲中，人群蠕動了，罷工開始了！

這一着可厲害！電車還像往常一樣，車輪子格楞格楞地在鐵軌上滾着，可是白花花的大洋錢却隨着聲音扔掉了。電燈還照樣兒淨光冒亮，可是那些電錢却一個也不見！比國佬一下子急傻眼了。

但是，他們還不肯和工人講條件。這口氣那能輸啊，於是又由林三布下他的黨羽，打算和工人們斗一斗。他們有句話：“我們洋人的买卖，不能受拿捏。”

如今不比先前，林三的手下人也多多了。又約來了兩名專門破壞工人運動，對付工人的大流氓、大走狗錢伯驥和王彩南。這些人的手法又毒又辣，比劉治倫這一群壞蛋的本領自是高出一籌。不來硬碰，却來個軟泡，他們想撒下迷魂陣，專一的勾引那些不堅定的分子掉入陷阱中去。他們在“日租界”鴻義棧租了間房，大烟白面足這麼一供應，另外是酒肉，金錢，女人明擺在那裡，把一些他們認為可以腐化、拉下水來的工人叫到這兒來，然後問：

“跟我們，你看見了沒有？吃吃喝喝，玩玩樂樂，人一輩子倒是圖個么呀？”

不頂用，工人們臭卷他們一通，一个个火氣都不小。這一着沒有使上。不光這一着沒使上，相反的倒聽說張廣

興他們另外搞了个秘密办公地点。这地点在那儿，他們不知道！

比国佬一看，想用分化工人的手段，內部自行解决是办不到了。得認头花錢。于是由比国佬出面，在××飯店摆了一桌洋餐。雖說是洋餐，但也上了很多精緻的中菜，要吃什么有什么。因为是請市长吃饭，怕不对这位周榮光的胃口。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比国佬这回自动开了腔。說道：“我們公司工人又鬧風潮了，這事还得請市长維持、制止。”

周榮光假裝不明白的：“哦！怎麼他們鬧事了？不是電車还照样开着嗎？電燈也很亮嘛？”

“要命的是他們不收錢呀！”

“哦！怎麼他們不收錢呢。这还了得。”这时候，通过林三的手，一张三万元的支票遞过去了。周榮光用眼一扫，臉子一搭拉，眼角上挂着冰霜。立刻把支票退回去。

打着官腔說：“总办先生，你們勞資之間的事，我嘛，也很不便插手，因為他們工人还是照样开車，照样供电，从維持社会治安角度来看，我也不便說什么。”說着，他立了起来，攤了攤屁股，說是还有飯局，端着个官架子走了。

总办也明白自己下的注小。于是轉天又是一場酒席，把支票換成了五万。五万，周榮光心里的話，我的价碼沒这么高的，吃完了飯一抹嘴，又走了。总办只好又咬牙，

又請客，又加碼儿。直到怠工的第十五天头上，支票換到廿万元的大數，周榮光一合計：“好啊，廿万！廿万能买多少所楼房了呢？弓也拉得够份儿了，老这么抗着洋鬼子，回头再惹出別的事来。”赶紧唔了一声，把支票按在腰包里，立时話鋒就改了。他气气哼哼地，說道：“这帮工人真是可恶，老是搗乱。我看这里面一定有共产党的人操縱。”

“一定是有共产党分子搗动！”比国佬連忙点头。

周榮光就問：“你們有凭据么？”

“凭据沒抓住，可是影影綽綽的。”

就凭影影綽綽的这四个字，当然还不行。周榮光做官的人講究四面圓，八面光，便說：“要是这样的話，你們还得和市党部啦、省党部啦交涉。兄弟我是要严办这群搗乱工人的。”他真滑，还替党部攬了点儿买卖。

其实，买卖不用他給攬。林三是拜八方的买办，过去他在煤矿上干过，这一套自然駕輕就熟，另外几张为数不小的支票也早已經开过去了。

就在这天晚上，深夜一点鐘的时候，省府委員張厉生忽然用電話将工人代表张广兴，还有印刷工会的陶子明，一共四个人叫到耐子周的私室作最后的談判。連周榮光也在座。張厉生扯了一套官面儿話，滿应滿許的：“咱們明天立即复工，这样闹下去，有碍观瞻，违背邦交。怠工期間的工資嘛，照發！年終双薪嘛；兄弟我拿人格来担保。你們总信得过我张某人吧？”

张广兴他們早料到这一着了。他們不从这一面和党棍

子頂牛，而是抬出几个問題來：“這樣一來，是不是要影響黨國威信呀？”“哎呀，這樣可是不好向工人交代呀。”“以後的事情很難辦了。”

幾個黨棍子不好說話，周榮光却擺出市長的威風，指着張廣興橫眉立目地問道：“今天怠工第幾天了？”

“第十六天。”

“你們老這樣鬧下去還行呀！”周榮光緊接着把帽子扣下來，“當初我跟你有言在先，叫你們必須團結一致，不擾亂治安，一切合理合法，我才能幫忙，可是現在……”

張廣興忍不住了，緊盯一句：“現在又怎么样？”

“現在，現在你們裏面出了共產黨，撒傳單，煽動工人，破壞治安，你知道不知道？”

“沒有的事。我們十五天，一點事儿也沒出。”

沒料想，張廣興居然敢頂撞他市長兩句。正好借這機會冒火兒。張開他那血盆大口，狼一樣叫起來：

“張廣興，我命令你通知他們。今天午后三点以前，全體必須復工。誰不服從，就按共產黨分子煽動罷工論罪。有一個斃一個，有一對斃一對！”

有去黑臉的，也有去白臉的。那幾個便一口一个“廣興”叫着。說道：“大家都要從大局着想，正是國難當頭，剿‘匪’緊急的時候，我們一定要顧全邦交，別讓共產黨利用了。現在從很多迹象看，有共產黨操縱的可能。廣興，我們要注意啊。廣興，據說還發現了一些小冊子。”

張廣興一口回絕：“那有这么一回事。”

“可是不能不防止喲！”几个党棍子抓住这顶红帽子了，就说：“马上复工，一定要马上复工！”

几个小时之后，天边刚刚挂出半堵阳光，电厂车厂的工人便三三两两的向南市庆云戏院走来。今天召开临时大会。许多工人还蒙在鼓里，以为是比国佬斗不过，低头讲条件了呢。瞧会场上这个热闹劲儿呀。

人声忽然静止。原来是张广兴站到台上来了。他声音不大自然，连连喊了几声：“工友们，工友们！”话梗住。底下是一阵唧唧喳喳。“怎么啦，张广兴！”大家都眼巴巴地望着他。

张广兴下决心了，就把晚上交涉的话，一五一十端了个底掉。工人一听，这还了得！像火山崩开了口子，像热水煮开了锅，正这儿人声鼎沸，喊喝成一片呢。张广兴却两手大张，急忙叫大家静住。他说：“我和兄弟们一样，真是不愿意复工啊，可是逼到这儿，不复工不行啦。再不复工，我们就不单是和比国资本家斗，也是和市党部，和公安局保安队斗了。咱们工人赤手空拳，劲头再大，心气再齐，却总不能这样对付政府的枪啊，炮啊。咱们为了把眼光放远，把力量保存得足足的，不在刺刀眼前做没价值的牺牲，我们只好先复工了。复工并不算是咱们的失败，咱们团结得很好呀，咱们到底狠狠教训了一下比国资本家呀，到底明白了谁才是真正帮助咱们工人的呀……”

张广兴越说越激动，激动得他话都讲不下去了，嗓音哽咽

了，終於放声大哭起来。

會場上是死一样的寂靜。個個把眼睛瞪得鼓鼓的，像是一團炸藥，簡直的就要炸呀，這時刻，看到情勢不妙，周榮光手下的一員大將，市府第三科科長穆道厚晃着腦袋走到前邊來。他張開尿盆似的大嘴，嚷道：“我告訴你們，你們聽真了！市長有命令，命令你們今天下午立即復工，免受共產黨分子的利用；你們不就是想多要錢嗎？市長已經給你們辦妥，你們要求買兩袋牌價面，多剩倆錢，已經辦到啦。人家比國人已經答應了。你們要官衣，人家看周市長的面子，也答應了，給二百件冬季皮衣。行啦，要求差不多啦；你們要立即復工，不復工就是破壞社會治安，破壞社會治安就是共產黨，是共產黨就得槍斃！”

大伙聽得几乎氣炸了肺，誰都是頭暈腦漲的。有人想出去。噓呀；不行！保安隊已經堵上門了，大伙都低下頭來。有人喊着：“我們聽張廣興的。我們信得過張廣興。”罷工終於又被壓下去了。

下午，各部門的工人低着腦袋進廠來了。剛一到電廠門口，不由得人們一怔，門口上把滿了保安隊，個個槍上插着刺刀，把母狗眼瞪了个賊圓，就差用槍刺子戳人了。進廠一看，裏面還貼着布告。工人們一邊看一邊叨咕：“怎麼？罷工十七天的工資一概不發！來年年終雙薪取消！三年不漲薪！”好啊，比國佬是倒打一耙，喰上火兒

了。这还不算，还把工人包汉文等五个名列黑榜，宣布开除！

大伙一看，这是骑在脑袋上拉屎，故意跟工人們做对。你說我講的，誰也不再往里迈步了。吵嚷着：“这样不行！这样不行！”

“大家放明白点，可別再鬧事呀！保安队是真槍实弹，闹哄着要抓共产党哪！”工会里的这批工賊、流氓打手就是这么一煽風，把大伙說的沒了主張。

“不要緊！不要緊！”劉治倫他們又出头了，从另一面攻。說道：“已經請示过市党部了。大家还是先复工呀！市党部保証包汉文他們可以复工。由党部办交涉。”

花說柳說的，工人只好低头走进车间。车间里怎么多了这么些人啊，好啊，一个人屁股后面跟着一个保安队，他們拿着槍，刺刀也就离后背尺来长。工人們簡直和罪犯一个样！

包汉文他們五个人就連忙跑到国民党市党部。在門口等了半天，这才有个小职员出來講話，說道：“你們不是被开革，是停职。停职嘛是公司的权利，市党部也不便过多干涉。你們先忍耐一下，等着复职吧。”

“那我們肚子餓了朝誰說去呢？”包汉文他們就問。

“忍耐嘛！自己想想法子嘛！”这位小职员把臉子一摔，走进去了。

这几个人整天隨在张广兴的身后，到处交涉，到处沒有結果。于是乘这机会，借这几个人做幌子，大工賊錢伯

驥、王彩南派人下到各車間，到處宣傳：“張廣興惹了比國總辦，讓咱們大家跟着倒霉。咱們大伙齊心哪，把張廣興趕走哪！”

聽說是要把張廣興趕走，大伙喊喝連聲，誰聽這一套的，硬把狗腿子給擰出來了。

一計未成，又生一計。偏也湊巧，有個電車車守胡寶山賣車票的當兒，誤將車票畫錯了一張。被稽查查出，于是硬把芝麻大的事儿當成黃豆，報告給公司了。公司里的工賊錢伯驥、王彩南正抓碴兒要破壞工會里的這批斗争人物呢，覺着是個坎兒，就把胡寶山找到日租界鴻義樓里來。指着他說：“姓胡的，摆在你眼前頭兩條路，你走哪一條吧！”

胡寶山說：“我犯了什麼錯？要你給我擺路。”

“你畫錯了車票，這事不小呀。一條道，你承認這是張廣興教你們搞的，說是要一律吃票營私，自己到公司自首，隨後到法院告張廣興去。告下來，你明白吧，比國人在職位上，薪金上還要照顧照顧你哪。算你命里該着，要走洋運，我姓錢的幫你這個忙，哈哈。”

胡寶山冷眼問：“另外那一条呢？”

“怎麼，你還問那一条？那一条路，你想也想得明白，犯了這麼大的錯誤，洋人來一張黃條，就把你開革了。這碗飯你就吃不成了。你想想，心里怕不怕？”

胡寶山反倒嘿嘿一笑：“不就是開革么？我姓胡的領着。張廣興是好人，為工人大伙辦事，我姓胡的不能陷害

好人。你小子借刀杀人，放心吧，你沒个好！”錢伯驥抹了一鼻子灰不說，而且這事嚷嚷開去，工人們團結的心氣更足了。胡寶山雖然被開革了，但是倒更使工賊們難以下手了。

二計不成，又生三計。這一計可毒辣。林三林子香又去找市長去了，他問：“張廣興味兒不对，他這人到底是怎麼一個國民黨員呢？你們保險么？”

周榮光是做官來的，凡事不擔肩兒，於是連忙和黨部的幾個頭目人叨咕。原本，這幾個黨棍子就有些照影子，張廣興年輕輕的，這麼聯繫群眾，這麼任勞任怨，到底為了什麼啊？明擺着給他白花花四萬塊現洋，他都不眼暈，不伸手啊！察其言觀其行，也覺着不大對味兒，莫不是張廣興別有什么來路？不過疑心歸疑心，証據歸証據，張廣興明明是國民黨員嘛！再一說，如果在國民黨員里查出一個潛伏的共產黨員，這事情不小，而且對他們頭目人都有些不大方便，抓住小辮子就許讓人家給來一下子。兩下子一碰頭，還是周榮光出了個主意，他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不好下手，爽性把人情送給比國佬，請比國資本家看着辦，辦對了自是很好，辦錯了也沒什麼自己的責任，真是再妙沒有了。无声无息地干掉。來個悄悄地失蹤，也就算了。

比國佬把這項任務交給了林三。林三在日租界开着大烟館，吃八方的買辦，和地痞流氓一向勾勾搭搭，就花錢買通了幾個人。有天，乘張廣興他們過老鐵橋的時候，从

暗中打了一槍。幸好沒有打中。

張廣興早就提防這一手了，出出進進，他向來不落單。特地找一些工人保護他。包漢文他們不是不能復職嗎？這五個人整天輪班跟着他。這樣，地痞流氓也就更下心了，而且另有內線幫忙他們。後來又有一天，正好是十月一日，廣興他們要到偽社會局去辦交涉，走到××路口上，忽拉一下子從看報牌子後邊，街道的角落里涌來了幾個打手，他們直奔廣興來了，有的動拳，有的動腳，還有一個从小腿肚子上拔出一把匕首，照廣興的腿膀骨就是一下子！雖然有人護着廣興，可是架不住那邊的人多，廣興挨了這一刀子，立時倒了下來。可他能沉得住氣，他喊：

“抓住流氓，他們是凶殺！抓住他們！”

過路的人從前後左右一齊擁過來。流氓們一看事兒不妙，呼嘯一聲，扭頭便跑。廣興他們看準那個動刀的了，把那小子按住。連凶器帶人，算是抓住一個活口。這事情可就好辦了。

忍着鑽心痛的刀傷，張廣興和凶手一齊歸警局了。警局里的人認識這些流氓，官面兒不惹地頭蛇，光說和了事兒。廣興他們一看是剃頭挑子一头熱，這還成，就要求轉解法院打官司。

法官坐在上面，指着凶手問張廣興：“你認識他嗎？”

“不認識。”張廣興捂着伤口，血又順褲角流了一大片。

法官又指着張廣興問凶手：“你認識他嗎？”



流氓橫眉豎目，脖子一歪，胸脯一挺，咧着个大嘴就喊：“認識！我他娘的認識他不少日子了，刺手貨；今天可讓我逮上了。他欠我錢不還。”

法官倒是沉得住氣，就又指着凶手問張廣興：“你是該他的錢嗎？”

張廣興痛得順腦門子滴落汗珠，臉色都變了。但是話却說得有條有理。“咳，這是謀殺。我不跟他說，他是裏人花錢雇的，我跟林子香打官司。請法院傳他吧。他在比商電燈電車公司呢。他是實辦。”

法官一听，心里明白這是和發動全市的電車電燈工人大罷工有關。不是朗依路劫；這里還有外國人的事。吓得他暗自叫奶奶，“我這是碰了那股子邪霉了，这么難逢金的事讓我碰上了。”法官便也要了个三推六拖，烏云遮月的办法。指着張廣興的大腿說：“哎呀呀，你這傷口不淺，流血過多，你看臉白成什么了。趕快送醫院吧，養傷要緊。傷好了再過堂。”話說完，他退堂了。

走出審訊室，廣興一看，車廠、電廠和公司的工人，都有人趕來了。而且叫了汽車來。廣興被人們連扶帶抱地送上車去。

汽車開到大街上。廣興痛得眼前直發黑。這時候，同車的于世清便喚他：“廣興，廣興，你睜眼看看！”

張廣興把眼睛強睜开来。唔呀，街上的電車排成隊，一個挨一個的停了下來。原來是電車工人聽說張廣興遇刺了，准知道這是比國佬下的毒手，馬上來了個全線停車

罢工。看到这光景，张广兴激动得两行眼泪滚了下来。斩钉截铁的吐了几句話：“大家真对的起我，我张广兴死了也甘心！我是坚决干到底呀，决不能辜负大家。”

工人们对他也是关心到极点了。把他送到馬大夫医院。这个医院是外国人办的买卖，病多重先搁一边，拿錢来。同去的工人就拍胸脯，把医藥費都攬在自己身上。张广兴这才被抬进急救室去。

张广兴年紀很輕，又是外伤，养了些日子，病也就逐渐好了。这天，大夫查过病房，看过他的伤口，忽然又回来了。瞪着眼睛和他说：“我看你是个好人。”

张广兴不免有些奇怪，就说：“大夫，您怎么說这话呀？我看您也是个好人。”

没想到大夫紧接着来了这么一句：“我几乎成了坏人。成了犯罪的人！”

张广兴再一打量大夫的臉色，心里一动，便盯着問：“是不是有人要逮我，害我，我为什么被刺，这事情您也全知道？”

大夫唔了一声，望着广兴：“我要不是看你这人朝气勃勃，敢說敢干，我也就不說給你了。告訴你，你千万不要声张。声张出去，你沒有好，我也沒有好。你可不能連累我呀！”

张广兴笑笑，指着自己的鼻子：“我們土人，赤胆紅心，无牽无挂。你放心吧，有什么尽管說。”

大夫是眼珠子轉了兩轉，嘴巴扁了几扁，含糊地說

着：“有人打算买，买通我，用毒藥，你知道，或是用錯了藥把你害死。我不能干這事。告訴你，你也別再問了，你趕快偷偷地走吧。”

“好，我明白了。謝謝大夫你呀。”張廣興的腦袋里登時閃過林子香的影子。他明白這又是林三的毒計。

張廣興不敢怠慢，悄悄從醫院里搬出來。他沒有回家，躲到他姨的家里。連一般的工人也找不着他到那兒去了。但是，張廣興並沒有停止工作，經常叫一些人到他姨家去。

去的人很多。如今還能找到的一個是丁××。他被廣興叫去，進屋一看，病床上放着書報雜志，這不算新鮮，新鮮的是還有幾本油印的小冊子。弄得老丁一怔，這不都是共產黨的小冊子嗎？

廣興便說：“老丁，咱們要干到底，這樣斗不行。咱們必須革命。要革命就得有革命的黨領導咱們。你願意參加革命的黨嗎？”

老丁明白了八成，這是讓他參加共產黨呀。怪不得廣興這樣積極呢，這樣善于聯繫群眾呢；敢情他是地下共產黨員呀！他光顧楞神兒了，沒有馬上答腔。張廣興是話裏留話，十分謹慎，也就把這一段話遮过去了。

另外一個便是張廣興的本家叔叔張巨明了。他去看他。張廣興就直接和他說：“咱們要搞革命，叔，你決心怎么样？”

張巨明指着鼻子說：“別人信不過，你本家叔叔總信

的过吧。”

沉思片刻，张广兴照直問：“那么，你願意加入共产党嗎？”

“願意！你怎么干，我就跟你怎么干。”

“叔，你写个入党申請書吧。”

张巨明回来以后，馬上便考慮寫入党申請書的事儿。当然，写这么一份申請書并不简单，张巨明总得准备准备，于是自然而然的便过了几天。就这几天的工夫，张巨明的机会便錯过了，他再也看不到张广兴了。畢竟他沒有逃开敌人的魔掌，被捕了！

被捕的情况，据广兴的爱人回忆，当时情况是这样：

深夜，他家突然有一陣紧急的敲門声音。广兴的爱人早有預料，算計到禍事要来了，好在张广兴并不在家里住，已經从他姨家移到別处去了。

这时张广兴的本家大爷在院里問：“找誰呀？”

“找人！”

“找誰？”

“开门吧，你！”

門打开。一群特务闖了进来。手电光乱射一陣，屋里屋外翻了个过。只是并沒有张广兴的踪影。只有他老娘和他老婆，有人就喝問：“张广兴藏到哪儿去了？”

“他輕易不回家住。”

“我問你他躲到哪儿啦？”

娘俩吓得說不上話来了，光是哭。广兴的本家大爷看

不过，就說：“我們确实不知道他在那儿啊。老总！”

“好，那你跟我們辛苦一趟吧。”这几个家伙話到手到，竟給老人家上了手铐带走！

等到天光破曉。广兴的老婆急忙閃了出来。到扶輪中学一位严姓教員家里找他。那曉得半路上正碰上姓严的老婆。她也是一臉失神的顏色。

“喂，嫂子。我們广兴在你家不？”

她也問她：“晚上到我們家抓他們來啦。我还以为在你家里呢。”

兩头都落了空。那么他們都藏到那里去了？这个謎沒有等多久，到中午就揭开了。因为特务机关把张家大爷放回来了。他告訴了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广兴和姓严的躲在陶子明的家里。夜間国民党特务是几处一齐下手，他們同时被捕了去！……

七七事变前一兩個月，张广兴这才从北平的陆军监狱被释放了出来。他回来以后，馬上又取得联系，在铁路工会工作起来。七七事变一起，他和几十个铁路工人一起到蚌埠去。后来又回來，把家眷也接走。在蚌埠落戶。不过，他却没有在蚌埠呆住，連他老婆也不知道他又跑到那里去了。一年多以后，他回来了，腿部受了槍伤。只有这件事他沒瞒着他老婆，說是在新四軍的游击戰役中，他們那部份游击队被日寇全部堵击，同志們全都牺牲了。他伤在腿上，当时也暈迷过去。等鬼子兵撤走，他这才醒了逃出来。他也告訴了老婆，自己是共产党员。

其实，他并不是逃回来的。随后便在明光县开了一家魚粮店，經常人来人往的，成为地下工作的一个据点。这个点坚持了好几年，一直到1948年解放前夕。他在监狱中染下的肺病，这时候再也拖不住了，竟悄悄地死在魚店中。他斗争了一生，遗憾的是畢竟沒有看到解放！

## 从西洋鬼子手里轉到 东洋鬼子手里

日寇發动蘆溝橋事變，侵占天津之後。他們首先下力量來抓工業的原動力——電力。自然，“比國電燈房”這塊肥肉就成了日本鬼子饑涎欲滴的東西了。一年有千幾百萬的現大洋可賺，凭什么讓比利時資本家弄走喲。但要拿過來得有借口，得抓碴找毛病。好在毛病是好找的，隨便安排一個戲法就可以了。

戲法出在1939年。六月天氣，正是最熱的時候，鍋爐房正值夜班呢，午夜剛過，突然撞進兩個人來。要說也怪，怎麼會有生人進廠了呢？當時比國鬼子吃得腦滿腸肥，什麼管理制度也沒認真執行，大門敞着，任人出入，附近過路的人，為了貪圖近道，有時還從電廠的前門進，後門出，抄近道兒呢。所以這兩人晃晃悠悠，人不知鬼不覺地就進來了。這兩個大漢，一個手里提着一把明晃晃的板斧，一個手拿着把左輪手槍，一进门就邪着噪門問：“電閘在哪？快快拉閘。慢了要你們冤枉子的命！”

值班的正是安头。他用眼一瞅，这两个大汉是“杂霸地”的打扮，歪戴马尾扁帽，上身穿一件漂白长袖短褂，下身穿条蓝毛料单裤，腰里系着四寸来宽的硬皮带。一脸横肉，眼睛瞪得肉包子那么大。安头心说不好，摇头便跑。

这两个家伙喊了一声：“你往哪儿跑？”拍；拍就是两枪。安头应声栽倒下去。

枪一响，司炉工谁肯守在这儿玩命啊？早跑得一个不剩。

这两个“杂霸地”一看找不着人，顺楼梯走上了电台。电台上是范厂才师付值班，他守在配电盘旁边，听见枪响，要躲还没来得及躲呢，让这两个家伙看見了，搶前几步，一把就把范师付的衣领抓住。直眉瞪眼的喊：“快拉闸，拉闸！”

“是是，我拉闸。你得放开我呀！”

他们自己不会拉闸，非得靠工人的手不可。那个家伙把手松开，用枪顶住范师付的后心，喊喝着：“快去，快去！”

范师付也有心眼。只听刷的一声，他把车间里的照明电闸拉下来。立时车间里黑成一片，对面不见人。乘这黑劲，范师付一溜就溜下楼来。把这两个“杂霸地”甩在配电盘的小桌上，两人摸不着东南西北了，一个劲地乱喊乱骂：“他妈的，往哪儿跑？外边怎么还有灯呢？”

这两家伙喊了一阵，一看没答腔的。黑得这样厉害，

敵情做賊的心虛，這兩家伙便也摸下來了。沒敢再找人，溜出車間，順后門跑走。

車間的燈又亮了，大伙涌出來一看，安頭倒在鍋爐旁邊，哼哼唧唧的，子彈在大腿根上穿了个洞。幸好沒有傷了腸子，大家趕緊把他抬回家去。

轉天天一亮，日本宪兵坐着卡車，直奔電廠來了。戲法做的都露假，鬼子官兒帶着刀，一進門就說：“你們這里昨天事故大大的有！八路破壞的有！”要接管廠子。

比國佬的牛氣還不小，曉得他是綠眼珠，白臉皮，那裏肯交這廠子。說是：“這裡比國的財產，你的，法國領事館的說話。”

產權，日本鬼子沒有接過來。好在題目已經找到了。由這天起，日本鬼子搞了一個“臨時軍管理”。日本鬼子兵一排人卡在這裡，把住大門，說的可好，是为了“確保電廠安全”。

假戲還要真做。當天，宪兵隊還把兩個特務抓來，讓工人們認，是不是這兩個人？還說：“他們八路的干活，破壞的有。”硬說是八路軍的地工作員來破壞電廠。誰不明白這一套呀？大伙都不言語，望着日本宪兵又把這兩人帶走。

為了搶這家電廠，日本鬼子跟比國鬼子在桌面上談判了，拉來扯去的，一拖就拖到1941年。到日本帝國主義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鬼子這回不用題目了，照直派兵武裝接管廠子。接管的頭目人叫富根。他這人又

高又胖，一对耗子眼，挎着一把大洋刀，他是日本军队的团长。这家伙祖孙三代都是靠杀人吃饭的，祖父是海盗，在攻打台湾时受过伤，他父亲是个下级军官，武士道精神十足。他自幼生在台湾，也是一小就当兵。“九一八”事变时到了中国。平型关大战时，挨了八路军一手榴弹，大脑受了震荡，以后就到天津来了。这回又受了重用。富根是败将犹荣，威风还挺不小的，把大家叫到一起，他嘎哩呱啦一阵，立刻派鬼子兵分兵把守，把电厂的要塞地点都守住。勒令比国佬办交代。这些绿眼珠子都吓傻了，办完交代，连口袋里的钱也被掏光，随后低着头走进卡车，被日本鬼子送进海光寺集中营去了。

当天，日本鬼子颁布了他们奴役工人的制度，建立了上下班的搜腰制度。

## 跟日本鬼子斗

日本鬼子代替比国佬坐在办公室里了。工人們誰沒有抗日的情緒呀，不用誰說，也不用誰講，反正沒有一个肯給小日本干活的。發電厂的哥儿們和別的厂子一样，跟鬼子施展开磨洋工、睡大覺、偷器材、毀家伙这四大絕活。給鬼子在生产上的打击，可是大哩。

在无数次偷盜活动中，要數吳万發偷电滾的事情最突出了。楞把日本鬼偷的心服口服。

有天，小吳推灰的時候，發現大厂的后邊，冷水柜旁，有个攬水用的电滾。当时心說：“把这东西拿走可解氣，非給鬼子招点儿麻煩不結。”再一思量，这家伙足有五百多斤重，三兩個人甭打算弄動他。小吳就和李鴻儒他們一商量，找了五個人，大家合伙干。有了人，怎麼拿出去呀？出大門不行，这东西又大又笨重。越牆而過嘛，這牆又有兩丈來高，上面安着一層電線網。怎麼办？有道是，人多智謀廣，哥几个一合計，只要決心干，反正難不倒活人。找出办法来了。

入夜，电厂里一片黝黑。鬼子为了防空，个个灯罩上都穿衣戴帽，讓一塊黑布遮住，鬼影綽綽，办事很得手哩。特別是下半夜，鬼子不巡邏了，狗腿子也去睡大覺了。看这架电滾的小狗子也躲到一边打盹儿去了。趁这工夫，李鴻儒連忙上去拉電門，吳万發跟手就卸电滾的地脚螺絲，几分鐘的工夫，电滾子就卸下来了。五百來斤的玩艺抬起来就走。走几步歇一下，歇了几回，他們把它弄到圓水池的梯子底下。又喘了一口气，李鴻儒把电滾子架到小吳的肩膀上。他先順梯子爬到圓水池的頂上，拉着結在电滾上的繩子，小吳駛着电滾，拱一下，上一个梯蹬，拱一下，又上一个梯蹬。眼看快拱上去了，小吳力气再大，架不住这样重的分量，他吃不住劲了，头發暈，身上的汗像水撈过的一样。手拚命的抓住鐵梯，咬着牙，这一剎那間，他想到掉下去就完啦！這一輩子做牛做馬，不能这样完呀！他沒勁了，使足勁儿向上拱也沒有拱动。圓水池頂上風很大。这时候，隨着風勢傳来小狗子的叫喊声：“电滾子沒了，快抓賊呀！”

他倆一听这叫喊，急坏了，楞逼出一股急劲，拱上圓水池頂。他倆連忙抬着电滾，跨到另一座房頂，沿着通天窗的洋灰板，往房子的那一头走，一口气走到牆跟前，李鴻儒急忙把鐵絲往電網上一拋，電門的保險絲斷了，于是順着牆把电滾系下去。下面有三个人接着，他們抬起来就走了。吳万發和李鴻儒連忙从房上下来，推灰工一身是土，連攢土也不用攢，扎进入群，也跟着起哄喊叫：“快

抓賊呀！賊把電滾子偷走了！”

電滾子楞會不翼而飛，這事太邪行了，而且沒了電滾子影響水柜上水，造成的事故不小呀！早八點，一上班，鬼子廠長就把“吊死鬼”，“蛤蟆殃子”還有其它狗腿子都叫進辦公室里來，他拍着桌子，八嘎八嘎的一陣海罵。跟着，廠里貼出布告來了，有誰知情檢舉偷盜電滾子的，許臨時工改為長工，另外嘉獎一百元。

全廠轟動起來了，大伙對着布告噠牙樂。你說說，楞把攬水用的電滾子偷走了，這得多大的力氣，多壯的膽子，多巧的手藝啊，大伙直咂嘴，吳萬發他們也肩膀碰肩膀的，跟着湊熱鬧，到處問人：“你說這是誰呢？多大的本事啊。要是我，吓也得吓暈了。瞧人家，噃，噃！”

紙里包不住火。再說狗腿子吃了主子的一通“八嘎”，也真賣力氣了。蛛絲馬迹，找来找去，找到吳萬發的頭上了。

這天夜晚，吳萬發剛睡下，就聽咚咚地有人敲門。聽那敲門的聲音，小吳心里一驚，料出個六七成來，裝着沒事人兒似的問了聲：“誰呀？”

“快開門吧！”

小吳偏慢騰騰的。又問：“嘛事？”

“查戶口的，快開門。”

小吳逼到這兒，不開不行了，硬着头皮拉开了個門縫。原來好幾個警察呢，他們一窩蜂似的闖進來，指着小吳說：“你昨天夜里打人了！”

到这份上，小吳倒不慌不忙了，反正該怎么回事就怎  
么回事吧。把腦袋稍稍一揚，他說：“嗨，何必說我打人  
呢，你哥几个不就是为電滾子来的嗎？”

“說开了鬧个脆声，不錯，是这么回事。你走一趟  
吧！”說着，警察把手銬掏出来了。

小吳把手往前一伸：“走一趟就走一趟。”但是，他  
腦袋却一偏，不忍看他老婆那惊吓的样子。五个孩子这时  
都哇哇地哭起来，那聲音就像小刀子似的，尖尖的在他心  
口上来回划着。

一进警察局，先給來个下馬威，打了五十大板。吳万  
雙手肿的像似發面包子。問他什么，他說什么，把事情都  
攬在自己头上，只是把那哥四个完全甩开了，對他們是只  
字未提。

因为偷電滾影响了發電，不是一般的盜竊，事關重大，  
所以緊跟着便把小吳押解到日本宪兵队来了。到这里；把  
他打了多少个死。都招了还不成，还要問他是不是八路。  
小吳原来不是八路，又怎么招呢？就这样，把他折磨得成  
了只剩一口气的人灯。

飄雪的那天，小吳的老婆領着孩子来看他了。吳万發  
知道这机会可一不可再，也許竟是最后的一面。强撐着力  
气，忍着疼痛爬了兩次，那里站得起来。看獄的看他快要  
死的样，开恩的說：“你有那些要說的話，讓別人替你說  
去吧！”

有个同獄的，就說：“見一面是一面。來吧，我背你

去。”

見了面，小吳的老婆哭得泪人儿似的。吳万發連哭都哭不出来了，只是說：“我完啦。回去領着孩子，好好過吧！”他想着他活不成了。

事情出人意外。定案時，要厂里的鬼子來對質。鬼子山田帶着翻譯來了。他問：“你为什么要偷電滾子？”

“餓呀，不够吃呀！”

山田又問：“你怎么偷的，是一个人么？”

“是我一个人呀！”小吳就把前前后后一說。小吳勁大，在厂子里是有名的。山說海說，竟把山田說得張口結舌，連聲兒哦哦。

哦哦了一陣，山田終于嘆了一口气，把大拇指一挑：“你大大好。中國人的你的有，亡國的沒有！”隨後，翻譯就說：“山田先生很佩服你的胆量，你的本事。他認為你是個人材，他不願再深究這事了。還給你一百元養傷。”說着，還當真的拿出一百塊錢來。

小吳怔住了。不知山田葫蘆里賣的什么藥。其實，山田是真讓小吳的本事膽量給鎮住了。結果，判了四個月徒刑，小吳就出獄了。不過，从此小吳也就離開了天津。

小吳沒有回廠，為這樁電滾子的事兒，倒是一連進來了三個狗腿子特務。为首的叫張七，在小吳他們五個人偷走了電滾子以後，這三個人在牆外摸着了半個底，向鬼子跟前告了密。鬼子相上這三個人了，一來是酬謝，二來叫

他們帮着整治工人。鬼子这一着还真辣！这些小子吃中國飯，說中國話，对付起中国工人来，真是处处有門道。工人很受他們的治。

光受他們的治嗎，哼，当然不是！工人是兩肩膀扛着一个腦袋，怕誰呀？反过来，工人也治他們。于是这就出了有名的“巧耍張七”的事儿。

侯德富那时候是推灰工。每天尽吃些山芋干、杂合面，飽不了肚子，还得死命的干活，所以瘦得皮包着骨头，跟猴子似的。又因为他姓侯，以音訛音，于是大家就管他叫起猴子来了。既然叫猴子嘛，也是說他有点机灵、調皮的意思。他經常沒事就出些主意要弄工头，叫穷哥們出出气，开开心，逗逗乐。

这天晚上，一上夜班，大伙一个个无精打采地打着哈欠。侯德富就对大伙說：“咱們睡个覺歇歇吧。”

有的人胆小，就講：“別糟改了，要叫張七看見，你还想吃这碗飯不？”

有的人准知道他有高招，就說：“你有什么絕活，快給大伙說說。這兩天哥兒們也得痛快痛快。”

“你們附耳过来！”他就朝大伙如此这般的一咬耳朵。

当下，郭大个到地窖南口去巡風。因为张七每天來巡查都是打南口进来。大伙便躲在北头，玩的玩，睡的睡，那个美劲儿就甭提了。

不大一会儿，果然不出所料，张七鼻子里哼着小調，手

里拿着文明棍（工人給起名叫哭喪棒）晃里晃蕩，搖着他那胖身子來了。郭大个老远便看見他那禿腦門在电灯底下閃着亮光。郭大个故意跟他走个对臉，笑着招呼：“七爺，您來啦。”

张七爱答不理的，眼皮子也沒抬一抬，嗯了一声，走过去了。等他走不远，郭大个連忙閃身到黑影里，用手捂嘴，变了嗓音，破口大罵：“你他媽的张七，往后小心着点，別仗着你是特务走狗就欺侮人。老子揍你个混蛋的。”

这是誰，敢这么罵他！张七立刻往回找人。郭大个連忙擰开汽管，水汽扑嗤扑嗤地直往外噴，像迷霧一样，噴滿了整个地窖。嗆得张七直打噴嚏。偏不湊巧，他是个近視眼，看东西本来就不大清楚，这回又是从亮处往黑处看，結果是任嘛也看不見。挨了罵竟找不着人，氣得他跺脚大罵，可一張嘴又讓水汽噴得够嗆。真是活受

趁着张七叫罵的时候，郭大个一溜就溜回来了。他把大伙叫醒。“快起来，张七来了！”

大伙一骨碌爬起来，用手指蘸点水往臉上一抹，裝着流汗的样儿，然后又喘着气，跑到张七跟前。大家七一言八一語的問他：“七爺这是跟誰生这么大的气呀？”“七爺怎么弄得滿身水呀？”

张七心里明白，就朝大伙嚇打着：“他媽的，臭小子放明白着点，別在太岁头前动土。罵你老子，小心什么罪过。”

侯德富最会接这碴儿，故意问他：“七爷，那家伙罵您什么了？”

张七又吃了个哑叭亏。哦呀了半天也没把話說出来。  
敢情当特务狗腿子，他也知道这不是好話。說不出口来。

郭大个还特別卖乖，还訂問：“到底他罵您什么了？”

侯德富就又損他：“还是七爷想得开。誰罵人誰心里明白。”

张七映着一对耗子眼，夹着哭丧棒，只好一走了事。  
看他背影消逝，这里哥儿們哄起一陣哈哈大笑。……

巧要张七的事，立时全厂子都知道了。真是大快人心啊！誰知强中还有强中手。电台巡邏工周胖子也来了个巧要张七。

张七这条狗，別瞧夜里拿着鞭子繞車間里轉，专打那困得乏得不行的工人，不許人們睡覺。其实，他自己可是最爱睡觉，每天都是那样，巡邏完車間，回到办公室里來，蹣起二郎腿睡起覺來。那时候总是在后半夜三点来鐘左右，几乎成了規律。周胖子抓住这一点了，这天晚上他通知各个車間的哥儿們：“今天后半夜可別睡覺呀，瞧我治治张七的。”

大伙一听說能治张七，晚上半夜覺划得来。都說：“胖子，今晚上看你的了。”

晚上，张七跟往常一样，到三点来鐘的当儿，迈着四方步儿，胖身子累得稍稍带喘，回到办公室来。身子往沙發上一倒，假装看报，就打起呼噜来了。等了等，周胖子就

在他門口一陣兒乒乓亂敲。吓得張七從睡夢中惊醒過來，連聲罵道：“有嘛事這麼着急吓人的。”

周胖子偏偏用着急吓人的調子說道：“不好了，七爺，我方才上廁所，瞧見幾個車間的人都睡大覺呢。茅房里淨是人！”

張七一听说工人睡大覺了，這還了得？抄起哭喪棒就往外跑。他跑進車間一看，工人們干的正歡哪，哪有一個睡覺的？張七往常沒这么下心過，這回眼睛瞪得肉包子那麼大，從電台直跑到鍋爐房，跑到修配廠，跑到推灰的地窖，甚至連廁所他都跑遍了，哪有一個泡湯睡覺的！越找不着睡覺的人，張七越要找。這一折騰不吃緊，把張七累得一身臭汗，呼呼直喘。張七越想越氣，回到辦公室就找周胖子，問他：“你小子怎麼編瘋造魔，哪有睡大覺的嘛？”

“那一定是他們得了訓，不睡了。我告訴七爺，是為你好呀。”

張七一琢磨，這理由也對。只好勉強笑笑。說道：“周胖子，你這樣對。以後再遇着睡大覺的人，記住他是誰。這回別瞧我沒逮着這群壞小子們，可我知你的情。”

哈哈，巧要張七的事成了大伙的笑柄。

## 血 債

日本鬼子的侵略战争使他自己越陷越深，所以他采取的統治剥削手段也就越野蛮，用了无法想像的奴役手段。

鬼子进厂不久，比国技术人員还没有撤退干净呢，电厂里便發生了一樁血案：一个老老实实的人失踪了。这人是誰？这人就是現在的修配机床組長楊才元的父亲。

事情是这样：正是楊才元十四岁那年，有一天中午，他父亲沒有回来吃飯。他們就想：也許是他今天活忙，不回來了。等到晚半晌，下班的时间全过去了，還沒見回來。这天外面刮着大風，冷氣从破屋子的四面嗚嗚地灌进来。才元和媽媽、弟弟、兩岁的小妹妹挤成了一团，冻得渾身直哆嗦。等啊，等啊，夜都深了，还是不見爸爸回来。他父亲是个老实巴脚的工人，他从来不到处去的。媽媽像是預感到有什么意外的事儿，睜着一双帶紅絲的大眼，连忙跑到舅舅家去打听，舅舅也在电厂里工作。不大一会儿，她頂着西北風回來了。呆呆地坐在破炕上，臉上罩着一層冰霜，一句話也不吭。从这以后，他們再也沒有見

过爸爸，連点消息也沒找到，人就这样沒了！

他爸爸那儿去了呢？他逃跑了。为什么逃跑了？为了一个螺栓。一个小小的螺栓呀！

那年月，楊才元的父亲在修配車間干活，一家五口人，生活很困难。再搭上物价飞漲，虽然表面上原薪不动，但是錢票贬值，有那些錢买不出那些东西来了。为了糊口，才元的父亲下班的时候，掖了一个螺栓在腰里，打算带出来卖点錢。走到二道門时，把头于长有跟在后面就喊，“你拿什么了？”才元的父亲一慌，螺栓掉在地上了。他是头一回，大伙围上来，好說歹說，“他老实人，饒他这一回吧！”事情算是揭过去了。那曉得，于长有要巴結日本人，給他報告了。轉天一進厂，他就喊：“你來了正好，日本人叫你哪！”

才元的父亲不知是怎么回事，吓得扭头就跑，这一跑，就跑沒了影儿。……

才元的父亲失踪了。他們家里立時断了糧。連冻带餓，兩岁的小妹妹先經受不住了，病倒在媽媽怀里，連眼都睜不开，哭又沒有勁哭，媽媽眼睜睜地看着这孩子断了气。死了一个，还有兩個，光这两个也养不活。媽媽忍着心疼把弟弟送了人。过些日子，又把才元拉到跟前。摸着他的腦袋，抽抽搭搭地說了半截話：“跟你舅去吧！……”

第二天，楊才元随着舅舅到了电厂，当学徒了。什么叫学徒呀。純粹是給把头当使唤小子，跑跑颠颠，連案子也够不着。挨打受气，回來还不敢說，因为他媽媽正坐在

窗口，望着无语的蒼天，悄悄流眼泪呢。眼泪流的太多了，后来媽媽連星星都看不清了，眼睛几乎全瞎了。

这一家人的遭遇多惨啊。为什么，只为一个螺塗呀。

为了生活，为了能够少餓一些肚子。漸漸，什么样的慘事都發生了。鍋爐房的赵二竟為兩個窩头送了命。

赵二四十多岁，长得十分魁梧。干起活来，就跟玩命一样，一点歪道不走。又不会說不会道的。有什么委屈，含着吐沫也就咽了。可这样的老实人偏偏混不上吃，混不上喝的，家里老婆孩子一大堆，七八口人张着嘴，都等他一个人給賺吃的。物价越来越漲，拼命干上一天，不过掙上一斤半斤的棒子面，拿什么养活这一家子人呢？愁得剛進中年的赵二，活像个老头儿。怎样才能多掙口吃的呢？腦袋里光轉窩头問題了。

工人們不好好給鬼子干活，到时候，接班的人总是来不齐，一空一大片。工作簡直沒法繼續下去。鬼子出了坏招儿，接班的不来，上班的人不許走。富根凶神似的把住大門，他讓工人加班。赵二是个直心眼的老实人，不会瞞、磨、泡、蹭，不讓出去，他就不敢出去。又一想也好，多干一班，爽性多賺兩塊窩头，这是鬼子給的加班費。为了这两塊窩头，赵二又干了一班。等这班下来，你猜怎么着，因为上班的人少，鬼子还是不讓出去，把头們还是跟着喊：“干吧，多給倆窩头呀！”爽性再賺兩塊窩头吧，咬咬牙，赵二又回去了。就这样，一連七天沒出鍋爐房，披着麻袋片，

沒黑夜沒白天的干。多硬棒的小伙子也經不起这么熬啊？

这天晚上，赵二实在熬不住了，依着水管子，呼呼地睡着了。鍋爐房里是多大的响动啊？机器轟隆轟隆地叫着，任誰也甭想在这儿打个盹儿，他却呼呼地睡得甜香，太乏了，七天七夜啊，太乏了。那曉得把头来了，可逮着一个偷懶的；朝他狠命地踹了一脚，逼着赵二接着干，赵二揉了揉眼，老实人也說話了：“我实在干不了啦。我好几天沒出去了。”

“不干？哈哈，你喘气不？只要喘气你就得干！”把头又要揍他。赵二不敢吭声，又接着干起来。好不容易熬到換班，一出門，涼風一拍，登時得了過力受風病，一躺下就沒起來。那年月醫院是給人家有錢人开的，有病沒錢別进来，赵二哪有办法治病呢？沒过几天，赵二就斷了氣。他这一死不要紧啊，拉家帶口的七八口人可怎么办呢？孩子們朝誰要吃的去呀？……

下班的汽笛响了。司水工也是一样得繼續干。鬼子硬不讓下班。說的好，加班給兩塊窩头吃，可是光動嘴皮子，到时候，鬼子連這兩塊窩头也不給。大伙一合計，这不是空着肚子玩命嘛！不能干了，決定轉天到“一善堂”去，給鬼子來個拆台，擋車。

“一善堂”离电灯房不远，是个講戒酒戒烟的“在理”的公所，就一間房。因为同院住的都是“电灯房”的工人，大伙平素就把这地方当做变相俱乐部了。这天清早，

“一善堂”可热闹了。該班的司水工沒有上班，都到这儿来了。

热闹了一阵，有人說：“要是狗腿子帶警察包围咱们，那怎么办？”

“咱们大家抱起团来。法不责众，他不敢怎么样！”

“要是說咱们是共产党八路军，破坏發电厂呢？”

这一句話問得大伙鴉雀无声。那年月只要一沾这名詞，就是槍斃罪过！想来想去，大家商議定了，別老这么擰着，叫看水泵的胡师付先上班去，看看动静。

胡师付进厂一看，好啊，鍋爐房里像一窩蜂似的乱做一团。有的喊：“快加水，十四号鍋爐要爆炸。”这儿話音刚落，那边十号鍋爐又喊起来了：“水加多了啊！”把头于长有腦門子直冒汗，跑来跑去，打罵着从别的車間赶来的，不会操作的工人。他們心越慌，手越乱，越出錯。无可奈何，官銀号地区停电了。

急得于长有直打轉。老停电这还行？正跺脚的功夫，他一眼看見胡师付来上班了。他过去，伸手打了胡师付一个滿臉花。嚷道：“他們都在那儿？”

胡师付手捂着臉說：“我不知道。”

于长有上去踹了一脚，把胡师付带到厂長办公室去了。到了那儿，山田坐在正座上，小胡子一翹多高。胡师付光着脚站在那划好的圓圈里。这是从比国佬那时起，一直留下来的規矩，工人到这儿只許站在圓圈里不許出圈一步，鬼子們嫌髒。

山田發凶的喊：“你們通統那里的有，”

“我不知道！”

果然，山田把這頂帽子扣下來了，“你們八路的手活的有！”

“我不明白！”

山田過來掄了一個嘴巴子。胡師付順嘴角直流血。這時，富根過來了，他扮着打一巴掌揉一揉的角色，說：“他們上班的有，你的關係大大的沒有。”

哥兒們講義氣，還能賣大伙呀？胡師付還是那句話：“我不知道。”

這一下子惹火了鬼子。登時就上刑罰，把個胡師付收拾得死去活來。敢情不用到憲兵隊，憲兵隊的刑法這兒都有。長室變做審訊室了。

胡師付受刑的事傳到“一善堂”來了。大伙再也坐不安生，不能讓胡師付上憲兵隊呀，只好肩并肩的又走進廠去。兩個窩頭沒有要成，胡師付狠狠挨了一頓苦刑。

鬼子把胡師付放出來。于長有還給叫了去訓一頓，他說：“你們不干活行不行吧？這回便宜了你！”

提起封建把頭于長有，人稱吊死鬼，又叫活閻王，白臉曹操。在電廠里稱得起是一跺腳全廠亂顛的一霸，再沒有他惡的了。廠里的工人，沒挨過他的打罵的，可以說是百不挑一。他看誰不順眼，那是早晚得下手把人收拾了。誰不順眼呢，那些有技術的老工人最不順眼，這小子最嫉

娘人了，他是生怕有人盖过他去。所以姜順便成了他眼中钉。于是他就勾結他手下的軍师蛤蟆秧子赵恩元，在工作中找碴挑刺儿，专门和姜师付刁难。

这天早上，姜师付把饭盒放到墙脚，就去拿工具准备干活。打开箱子，他怔住了，“嗯，我的工具哪去了？”

“到点啦，干活呀，快干活呀！”吊死鬼伸长脖子嚎叫。他身边跟着两个爪牙，一个叫歪眼狗，一个叫斜嘴鹤，也随着吆喝：“干哪，俐俐梭梭的干哪！”

姜順知道这又是故意跟他为难。心想胳膊擰不过大腿去，忍气吞声挨下去吧。便央告他：“于先生，您高抬手吧，沒有工具能干什么活儿呢？”

“媽的。誰他媽的給你看着工具？你存心跟我泡蘑菇呀！”說着話，吊死鬼把三角眼一立，抄起木棍，照姜师付迎头盖臉打下来。

姜师付闪开这一木棍，受欺侮不是一天了，心头怒火再也克制不住了。老实人逼急了也要拼命。他指着吊死鬼說：“姓于的，你們待我姓姜的太狠毒了。我跟你們拼了！”话到手到，抄起一根沒車过的鋼軸胚，他就要打吊死鬼。

吊死鬼手下的人多。这时候，赵恩元和王世昌进来了。从后面把姜順的棍子揪住。歪眼狗上去把姜順的胳膊擰住。姜順要动劲，那里动的了。

蛤蟆秧子朝吊死鬼一乐：“于头，跟他一般見識干什

么？哎，这何必呢！”随后把臉一整，指着姜順罵：“你这小子尽假裝瘋魔，不想干活呀。讓你尝尝老子們的厉害。以毒攻毒，來呀，給他去去火氣。”

立時一群惡狗蜂擁而上，七手八脚地按住姜師付。他們的毒計早安排好了。腿子預備了一壺开水，整個都澆在他腦袋上。姜順被燙得滿頭燎泡，喊了幾聲，便迷迷糊糊不省人事了。工人們放下活兒圍了上來，敢怒不敢言，还得和把頭說好的，這才算是許可把姜師付搭出去。湊了幾個錢，好不容易才把他送進醫院。

打這兒起，姜順這口冤氣窩成了大病。肚子鼓脹得吓人。一天比一天不是人的顏色了。這天，他把他兒子姜起鳴叫到眼前。囑咐他道：“你要是我的兒子，可一定要替我報仇哇！于長有把我害死啦。”沒過幾天，姜順咽了氣。

天下是人家的。老子死了，欺侮兒子。以後，姜起鳴在廠子里干活，和他父親一樣，時常遭到狗腿子、把頭的排擠，刁難。要不是解放，哪兒報仇去！

## 又是一个朝代

畢竟大家盼星星，盼月亮盼着的那一天到來了。1945年的秋天，日本鬼子宣布投降了！

工人們乐得合不上嘴，厂內厂外折騰得可欢。和其他工厂一样，把鬼子們揪住，一頓好揍。日本鬼子打慣人了，等他們挨打，敢情个个是松包，那才叫狗現原形呢。富根連國籍都变了，竟說他是台灣人，他的祖先也是中国人，求大家別揍他。

誰也沒想到，前門去虎，后門进狼，哈巴着腿的鬼子還沒走呢，一批“劫”收大員，開“五子登科”的土匪又坐着美国飞机，天上来的，地下冒的，七拼八湊地來接收發電厂了。

請看看国民党接收大員的整个班底吧。

为首的一員大將叫張景泰，他是从重庆飞来的。是名牌貨。一进厂，从小轎車里鑽出来，一身洋气，鼻孔朝天，高鼻梁上架着金絲眼鏡，嘴里叼着一枝雪茄烟。开初是美式配备的制服，后来錢摟得多了，便換上考究的西裝。據

說他父亲是开电料行的，有把子剥削錢，又是个基督徒，所以从小就培养张景泰一套洋奴思想，进的是教会学校，以后公費留美，在那个紙醉金迷的国度里混了几年，镀金归来，于是被捧做宝贝蛋儿。这家伙說話里头加洋字，虽然臉皮是黃的，但腦子里想事儿却和洋鬼子一模一样，主观、蛮横、专权、自负、臭气冲天。

光这么个少爷秧子自然管治不了这个發电厂，必得找几个坐地虎来做左膀右臂，好騎在工人头上。于是起用了發电厂的兩条恶狗大特务，一个叫張俊臣，一个便是那个于长有了。

說起張俊臣来，在比国佬和日本鬼的朝代里，似乎都不甚显眼，其实啊，他一直是和主子一鼻孔出气的“薦坏”。这小子也是天主教徒，他爸爸是法国教堂扫院子的，借这个方便，他进了专门培养洋奴的“法汉中学”。中学畢業以后，他就攀教会的門子，1932年进电灯房当职员来了。善于奉承比国佬，很得到藍眼珠子的器重。这小子洋奴思想很重，西洋人統治中国，他认为是天經地义，东洋人統治中国，他却有些信心不足，心里的話，“你們也是黃种人。行嗎？”所以1940年他就和国民党挂上鉤了，参加了反动組織，领导他的人是天津有名的把头巴延庆。到日本鬼子进厂，他有时交个情报，八一五以后，这小子逮着机会了，立时冒了上来，口口声声国民党地下，拉攏把头、特务腿子，培植个人势力。先投靠的傅秀山（傅死以后，这派由苏硯田领头），組織起电厂的黃色工会，他做

了工会理事长，和张景泰平分江山，在电厂里横行了好几年。見着工人，因为搞的是工会，有时也不得不露个笑脸，乐嘿嘿的說：“兄弟我代表你們工人，为工人办事。”且看他怎样为工人办事吧：1946年他竟选伪“国大代表”，用大卡车把工人接到老站，围着柜台转了一圈。这就是他的德行事。落选以后，又强效工人圖章，选他作參議員、立法委員。拿工人交的会費來給自己鋪向上爬的道路。随后又花錢請客，和大特务朱雨田勾結一起，参加了国民党中央統局工运組，专门做鎮压工人的活动和搜索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員的活动。在电厂里布下了一个特务网。还結了个18盟。这18个人明着是把兄弟，暗着是特务諜报网。当时他們把全厂职工都列表排队，几乎四分之一的人都被他們当做“共匪”嫌疑分子来看待。

說起于长有来，我們都已領教过了。这里再交代兩句。这小子自幼喜欢舞棍弄棒，不务正业，靠耍胳膊根吃饭，以后拜在青帮大头子的門下，很受賞識。1914年，因为比国佬特地要找几个打手，把他找进了电厂。致伪时代，跟日本鬼子办事也是尽忠尽孝，不知出了多少坏点子，害过多少人。到八一五日寇投降，这小子居然也搖身一变，自称是地下“三青团员”，其实他是三个青年年龄加在一起的那么大的团员。随后他也参加了匪中統局的“勦奸小組”。专在工人里面用鼻子嗅。

这些人合在一起，在电厂組織起新的統治王朝，剝削、压榨、陷害、排挤、折磨，真是使尽了各种伎倆！工

人們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1946年初春的一个深夜，推煤車的車道上，有个花籃煤車掉道了。推灰临时工温道泉和另外两个工人没办法就想把煤車抬上道去，可是推煤班长朱云和却离开职守，睡觉去了。人力少，怎么也抬不动煤車，温道泉只好冒着危险，在右边花籃下用木头頂着掉道的一头。抬呀，抬的，也还没能把煤車抬上道去。温道泉累出了一身汗，正想再繼續抬呢，忽然一声震耳的轟响，人們抬头一看，上边吊煤的高車，練子折断，帶着一輛花籃鐵車由上面直砸下来。几眨眼的工夫，花籃已經掉下来了，把温道泉的整个身子压在下面。

“不好了，砸死人啦！”人們七手八脚地把花籃鐵車抬起来，連忙把温道泉搭到鍋爐房，用手一摸他胸口，这个壮小伙子的心臟早已停止了跳动！

“人都砸死了，嘆，他媽的班长呢？”

到这时候，朱云和揉着两只惺忪的睡眼，跟着別人来到尸首旁边。不慌不忙地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不留神点上边呢！唉，怎么办啊？”

“怎么办！你說怎么办吧。他是你班的人，死了你要負責任！”

又一个說：“怎么办，找厂长，找工会呀。工会不是說給工人办事的嗎？”

把头王庆堂走过来了。讓他一說，更是稀松平常，

“人已經死啦，着急也不頂事，不如等到天亮再去找工会吧。”

深更半夜，找人也找不着。只好等到天亮，等到太阳都老高的了，厂长張景泰这才到厂子来。

一听死了个人。張景泰一不惋惜，二不难过，只是赶紧抓住这几句话：“温道泉是临时工，砸死了厂方不负任何责任，不负担任何善后费用。”

“那么人就白白砸死了嗎？”温道泉的本家爷爷在厂里工作，他的眼睛瞪得溜圆。“他是干活砸死的！”

張景泰一看不掏兩錢，尸首搭不出去。只好說：“厂方念他生前干活很好，按他本人工資發給九个月的，作埋葬費吧！”

“厂长，他才挣几个錢啊？再说，他家中上有父母，下有孩子老婆，一家七口，这怎么办呢？……”

“好啦，好啦，这已经是特殊照顾了。”

“我們想問一問，这吊車凭空砸下来，算是怎么回事？设备有检查、维修沒有？铁练习子楞给用折了。他这人死的多冤，他……”

“好啦，好啦，这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事故嘛。走吧！”張景泰扫了勤务一眼，自有人把温道泉的族爷连劝带架，连说带撑，给弄出厂长办公室去了。

温道泉的死尸抬走了。临时推灰工又换了一个新人。事情便这样无声无臭地过去了。

国民党統治時代的最大特色是什么？是事故多。

这年秋末的一天，太阳偏西了，灰暗的天空布滿了烟云，工厂里傳出有节奏的轟响。！

史恩貴师付剛搗完火，放下鐵鉤向章技師說：“剛才接班的時候，八号爐漏汽漏的很厉害。”跟着，付班长楊長祿也擔心地說：“許是出了嘛毛病吧！”

章技師看了看八号爐，那年月，干起活来都是搪塞事，誰也不下心，再說鍋爐漏汽也是常事，毫不在意地說了聲：“沒關係，有什么問題找你們頭兒去吧！”說罢，他大大咧咧地到二楼办公室休息去了。

守着三、四号爐干活的是苑四和段汉臣。这哥倆一听说沒关系就說：“咱們先吃飯吧。”那年月吃飯沒食堂，都是就地啃干窩头，为了湊熱鬧，連史恩貴、張師付都一塊湊過来了。他們剛坐下来，就听爐里刷刷地發响。

“坏了！爐子轉音了！”史師付猛古丁地站起來，赶紧找着把头陈金山策報：“陳头，爐子有毛病啦，……”

沒等話完，陈金山就指着史恩貴厭煩地說：“就你事儿多。哪有那么胆小的。一会儿住爐，先就合着点吧！”他屁股一扭，登上樓梯，向那边去了。

爐子繼續燒着。干哑得嘶嘶地怪叫。不对劲了！張師付想招呼苑四和段汉臣过来，他剛直起腰儿，還沒等开口呢，轟的一声，鍋爐房頓時蒸汽弥漫；热騰騰地像是在蒸籠里似的，人們拼命地向外奔，但是蒸汽却噴得更快，一股滾燙的熱汽把人們纏住。

当时，史师付守在爐門前邊，听到鍋爐爆起巨响，赶紧往爐門底下一趴。爐門被蹦开了，門上的鐵鎖全被冲斷，嗚嗚的火苗子把他的头髮眉毛全都燒光。兩只破鞋也不知蹦到那兒去了。

当时，苑四一看白嘩嘩的一片，任嘛也瞧不見，覺着渾身發漲，急中生智，連忙向門口的方向冲，跑了几步，剛剛冲到門口，再也忍不住了，渾身上下像是有上千上万的尖針扎着戳着似的，他哎喲一声，暈倒在地上。

当时，張師付一把拉住段漢臣，鑽进八号爐旁邊的防空洞，蒙头捂臉地趴在地上。只覺得背上發漲，像是有塊石头压在他們脊背上面，憋得喘不過氣來。

幸亏楊長祿凭自己多年的经验，冒着蒸汽，爬上爐頂，把主汽門关上，截斷別的鍋爐汽管，这才沒有影响汽机运行。避免了造成重大的停电事故。鍋爐房的蒸汽漸漸消散了，人們跑进来，連忙用力一拉練子門，水嘩嘩地砸下來

张師付和段漢臣躲避得很好，但他們原沒有想到顧自己，一看蒸汽散了，工人阶级愛集体，愛机器的本能迫使着他們立刻爬了起来，打算出来搶救。剛走到八号爐子前头，出其不意，冷水从爆裂的汽管里冲出，砸在正燒得旺盛的爐火上，一下子濺起一股火花和濃煙。他倆一看不好，轉身又往回跑。可惜人的腿脚沒有火、水、汽来得快，它們一并扑过来。段漢臣跑到半路被它們扑住，渾身是火，一下子摔倒。

张师付来得快些，忍着烧伤，顺着上公事房的楼梯往上爬。恰好把头陈金山由公事房楼梯上面下来，张师付朝他伸手喊道：“救救我！救救我！”

陈金山一看他烧得浑身浮肿，肉皮紫黑，生怕碰着他自己，不光没伸手，还把身子往后一退。张师付紧跟着又迈上一步，朝着陈金山倒过来，“扶我一把！”陈金山吓得什么似的，不光见死不救，没去扶他，相反的，倒用手指住张师付的脖子，挡住他。乘这空儿，他一闪身，顺楼梯跑下去。张师付死命扶住铁栏杆，鼓起余力又迈了几步，两腿一软，倒在地上……

近六点钟的时候，工人们抬着担架，把苑四、段汉臣和张师付送到医院。大夫已经下班了，好不容易才找来一位，他嘴上带着厚厚的口罩，还用一只手捂着，探着身子，用镊子掀开被子看了一下，吃惊地摇了摇脑袋，说道：“太严重了！哎呀，不能治了！”

“不能见死不救啊。大夫您修修好吧。”

大夫又出了新点子：“现在没有床位了呀！”

真亏有人会出主意，抬担架的工人张锡龙也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张张伯苓（当时南开大学校长，伪国大代表）的名片。这张名片能唬人，这才算把病人收下。

到八点钟的时候，三个人全换好药了。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进了病房，哥儿们刚要走，就听着也不知是苑四呀，还是段汉臣喊了一声“快逃命呀！”又哼哼了两声，这两人便先后断了气。……

事后，把头陈金山不光推卸了自己的责任，还謊說是他不顧危險跑去关上了主汽門，避免造成重大事故。厂長張景泰不問青紅皂白，不但沒有追究責任，好像事故責任都怪那死了的苑四和段汉臣了，反夸他陈金山处理及时，奖給他五万元金元券。陈金山領了这笔賞金，和工会的几个理事大吃大喝，足足鬧了一个星期。

张师付的伤漸漸好了，但他的脖子上却十分鮮明的留下了兩個手指的指印，这是讓陈金山当时抹的。

还有，那就是苑四和段汉臣的兩家家屬了，妻子失去了丈夫，孩子失去了父亲，生活全无着落，只有对着墮入的秋風哭泣吧！难道他們沒有領到工伤撫卹費嗎？領到了，但很有限。而且，就这笔死人的錢，經张俊臣和陈金山兩人手里一过，居然被吞吃了一大半。

## 包 身 工

国民党接收大臣“五子登科”唱的这么热闹，难道工人們眼巴巴的光瞧着嗎？把头工賊任意橫行，难道工人們驚搭搭的就任他們摆布嗎？沒那个事！工人們有話，“就凭你們這群腦袋呀！你們这些料貨呀！哼，瞧着吧！”偷、磨、泡、蹭几乎絕活都照样來着。跟他們斗！

斗得最复杂，最綿长的要屬包身工这档子事了。

提起包身工来，电厂里流行着一首歌謡：“推煤推灰活像鬼，烟熏火燎趟着水，餓着肚皮跑細腿；”就說推煤推灰工人有多苦吧。原先，灰煤部的工人也是长工居多。到日本鬼子来了，因为大伙不給鬼子干，光見人不見活。鬼子沒辙了，于是想出了一个絕招，把活儿能包的全包出去，就这么錢办这么多事，越省工越多拿錢，赔賺是包活的。推煤推灰的便也包出来，倒了几次手，最后這事儿，讓于棚匠包活的易恩元悄悄花錢买动到手上。这小子可逮住發財的机会了。騎在推煤推灰的哥儿們头上，这小子里吃外拐，心黑手辣，又扣工錢，又放高利貸，真是比狼都

狠。包工大柜才干了几年哪，到国民党統治时期，这小子家里雇着老媽子，使唤着听差的，交結了一帮狐群狗友，吃吃喝喝，居然也是个財主了。就說他剝削了工人多少錢吧。恨得工人們直搓牙，管他叫“棚楊”。

可巧，这天“棚楊”来监工的时候發生了一件事。有个穿破袄的工人不小心，叫倒下来的幾火苗儿給燒伤了，不能干活。少一个人不行啊，一个蘿卜一个坑。“棚楊”沒法儿，把袖口一挽，大爷也玩一宵票，跟着推了一夜的轎轆馬。这一夜不吃緊，他是酒色掏空了的身子，架不住这点劳累，回家就倒在炕头，爬不起来了。包身工是現錢現卖，干一天領一天的工錢，他一連兩天沒露面儿，大伙可吃不住劲了，一合計，讓班长赵志清上他家里要錢去。

老赵到了“棚楊”家里，由使喚老媽把他領进正屋。他还歪在炕上，哼唧着腰酸腿痛呢。赵志清道了來意，說是：“你得給錢，我們包身工沒錢吃飯啦。”“棚楊”心里直嘀咕，生怕包子露了餡，可他又病的起不来，只好硬着头皮写了个便条，讓赵志清拿了他的圖章到厂里取錢。临完，他千囑咐万囑咐的說：“你就凭條領錢，領多少是多少，任嘛事不用問。你明白嘛嗎？”

赵志清兩眼一碼儿黑，認不得半个大字。可他心里豁亮，准知道“棚楊”这里头有鬼。你不是不讓問么，他偏要找个識字的問問。拿回来，讓哥儿們里喝过一点墨水的孙志欽看着。老孙綽号“算天星”，他就朝大伙念叨：“看啊；‘棚楊’吃咱們吃的太狠啦！”大伙一听那个数，火苗儿



一窜老高。真是，狼吃人还得剩堆骨头呢，他这小子吃人，居然连骨头渣子也一塊吞哪！包工錢是三七分，白袖口一卷，先剥三成去，这且不提，怎么大伙一天干十二小时的活，只領八个鐘点的錢呢？那四个小時都讓他昧起來了。这还行，大伙决定告他去。

头一状告到厂長張景泰那里去。張景泰倒干脆，說了一句話：“胡鬧！”

哥兒們里头還有一位會出主意的魯克恭，就由他煩人寫了一個呈子，遞到偽社會局去。厂里不管，咱們是厂外折騰。偽社會局派一個戴金絲眼鏡，穿洋服的人見的魯克恭，一臉不耐煩的神氣，不等魯克恭話說完，這小子就截住問：“你們到底要干什么吧？”

“我們要求取消包工制！”

想不到他倒應承下來，叫過三兩天來听信儿。过了三兩天，魯克恭又去了，這位戴眼鏡的又叫再過三兩天，一來二去的跑了十几趟。他們的事情沒有办出眉目，倒是社會局这儿和張景泰，和“棚楊”把事儿办好。戴眼鏡的拿到了他能拿到的那一份儿，也就不再照面了。連再過三兩天的話也沒了。魯克恭他們明白，這是給人家做飯吃，他們白跑這冤枉路了。

可是，他們還不知道，“棚楊”朝他們領頭的下毒手了。這天，村班長肖景泉領班，垫手的破麻袋片沒有了。一推車，手上就得燙幾個大燎泡。肖景泉就找“棚楊”要麻袋片，“棚楊”正抓碴儿呢，一看送上门来了，張口就

罵：“你他媽的拿麻袋片當飯吃呀！三天兩頭的要。沒有，沒有！”

肖景泉也窩着火呢，就嚷：“你不給不行！”

“我就不給，你敢怎么样？”說着兩人支巴起來了。

这时候，特務狗腿子張七來了。這小子在日本鬼子統治的時候，拿棍子抽人，到了國民黨派兒，他還是拿棍子抽人，還是交報告，轄制工人。他當然和“棚楊”是一頭的，喊喝一聲，叫腿子們一拥而上，把老肖，還有跟老肖一塊兒來的老王給按住，往大門外面一推。倒也干脆，開除了！

這能完嗎，當然不能完。老肖和老王就去告“棚楊”。俗話說的好，“有錢能使鬼推磨”。告來告去，他們不光沒告了“棚楊”，反倒被偽法院給他倆扣了个扰乱廠方的罪名，白白壓了好幾天監獄才放出來。案子就這樣算完啦。哥兒們在裏面使不上勁，只好嘆口氣，先忍着。眼睜睜地看他們到別處去找飯路。

包身工的哥兒們里，有一位叫劉少波的，他是城里住家。這天下午剛過大門，要去廠里接班。就見斜對門的閻大律師正往外送客。他眼睛尖，看那客人坐的三輪有点兒像“棚楊”的，連忙閃到一旁。從門縫里往外偷看，可不嗎，閻律師送的正是“棚楊”這小子。老劉登時心里犯了嘀咕，“夜貓子進宅，無事不來。官司不是已經打完了嗎，干嘛還找律師呢，這小子還安着什麼毒計喲？”

隨後，他踱到律師的院里，喊了一聲，“四爺在家

嗎？”

“里邊坐，里邊坐。”閻律師和老劉是十多年的鄰居，再搭上他這律師沒有干起來，所以對鄰居有個面。

進屋以後，老劉不用客氣照直就問。閻律師也就實話實說。好呀，原來肖景泉他們官司打不過，低頭算完啦；他“棚楊”可不算完，斬草要除根，互通律師想把趙志清也給咬進去，也給押上一陣子，來個一脚踢。

是这么一計啊！劉少波連忙央告律師：“您可不能这么办呀！‘棚楊’这小子可不是东西。我們班长趙志清可是好人，人家‘扛着刀’，給我們大伙儿办事。您要这么一来，不把我們都毀了嗎？”

閻律師一想也对。一來是“棚楊”手緊，只攏了几盒烟錢，值不當的去缺德，二來是和劉少波十多年相識，知道他們這伙賣苦力氣的哥兒們火氣大，犯不上惹人，再給自己捅了大包。就說：“好吧，瞧咱們老街坊的面子，依你。我明天不給他出庭。”事情揭过去了。

劉少波一口氣跑到廠子。趕緊給大伙送信。大伙一听，這份氣大啦。索性一不作，二不休，大伙抱团，跟他干到底啦。七嘴八舌的說：“給他挂队！罷工！”

有人就擺手不贊成。說道：“這是什麼年月？找着讓‘棚楊’把咱們當成共產黨八路送終啊！再說，他正巴不得把咱們踢開，另換一撥新人好使喚呢。”

有人就提：“咱們給他來個明着不攏暗里攏。土市政府找杜建時請願去。”

又有人摆手：“杜建时是哪一头的？能向着咱们吗？”

又有人赞成：“嗨，杜建时跟他一鼻孔出气也好，兩鼻孔出气也好，反正这小子得花钱买动！”

“对！”大伙劲头都上来了，“請願不准，咱們不掉肉，‘棚楊’可把錢包去光了。对，对，哥兒們折騰光这小子！”

要請願就得有說辭，于是頑人寫了八項條件。主要的条件是：从比商直至現在，灰煤部工人一向在厂內工作，且为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份。因之灰煤部工人应改为长工；取消一切包工制；每天十二小時的工作時間应改为每天八小時；不許把头虐待、打罵工人。

遞上請願書，沒多久，国民党市政府批下来了，含含糊糊的一句話：“候飭查核办。”以后便石沉大海，渺无音信。大家等得怪悶氣的，不办不离奇，准知道他們不給办；可是“棚楊”究竟花多少錢，出多大的血呢，怎么連这个动静也沒有。

沒有不透風的箇笆，事情讓經常向电厂运煤的把头，張秃張亭善知道了。他說：“我給你們大伙出个主意吧，你們找安青帮的头目人張逸之，拜师入帮，靠他的勢力，国民党不說，連軍統中統也都有个面儿，准把‘棚楊’給拱下去。”

狗拿耗子，怎么他多管起閑事来了呢？把头擰把头，其实这小子也沒安好心眼，他是眼紅嘴饞，想夺“棚楊”的

食，挤下“棚場”，他好当包工头儿。

大伙一研究，跟“棚場”斗到这份上，没路可走了。要是靠安青帮的势力压下“棚場”倒也不错。死馬当作活馬医，每人凑了几个钱，给张逊之送礼，摆香堂，認师付，求他帮忙斗“棚場”。

一晃，十天半拉月过去了。“棚場”还是那股子牛劲，斜眼看人，恨不得把谁盯死。大伙儿一想，这不成啊，香堂白摆了是怎么的？哥儿们凑了三十多个人找张逊之去了。别提有多巧，正碰上张逊之要出门。一见大伙，他在台阶上一站，撇着京腔，倒数叨了大伙一顿：“你们请回吧，原来你们是运焦子的。我这儿也是你们来的地方！”

说完走下台阶，扬着脖子，鑽进汽车里，开路了。大伙罵咧咧地不知怎么出这口恶气才好。

这时候，张逊之的办事人，穿着长袍、綵鞋踱了过来，朝大伙伸出四个手指，說道：“人家‘棚場’使钱，买死啦，你们要想把事扭过来，得这个数。”

这四个手指头就是四十袋面錢的意思。大伙一听，唧唧喳喳地嚷开了锅：“要是有四十袋面，谁来你这儿啊！”“这不是拿我们穷哥儿们炸肉酱玩嘛！”……

大伙没有搬动“棚場”，“棚場”可不饒大伙啊。事情全是班长赵志清出的头。他成了“棚場”眼中的毒刺了。

这天晚上，赵志清刚进锅爐房，就见一个叫李文杰的拿着油壶，劈头朝他砸下来。赵志清闪过去，这小子还抓住赵志清要打。人们上来，把李文杰吆喝住：“喂，你这是

要干什么。”

“我看他不順眼！”李文杰还逞能耍横。

“是你看着不順眼啊，还是‘棚楊’看着他不順眼，你小子喝他几兩酒，抽了他几支烟哪？”

这一揭底不吃緊，李文杰夹尾巴狗，赶紧溜号了。

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沒過几天，老赵下班回家，正走着呢，猛然間从金家窑包子鋪里跳出几个人来，攔住老赵就要撲架；但剛喊了一声，立刻又把拳头縮了回去，原来大家彼此都認識，全是家門口摔跤，練把式的熟人。哥儿几个一甩手。說道：“我們當是誰哪，原来是趙大哥。算他‘棚楊’倒霉，白吃他小子一頓包子。老赵，往后要加小心啊，你走吧！”

赵志清几次险遭暗算，不能不想个对策。大伙一商量，哥儿們里头，屬魯克恭來得机靈，就讓他假裝投降，到“棚楊”那儿臥底去。

当天晚上，魯克恭晃晃悠悠的到“棚楊”家来了。一张嘴，先借錢：“掌柜的，費您心吧，接濟我几个。”

“不借。你們有本事，到处告我去吧。倒瞧我姓楊的行，還是你們穷小子行。青天白日旗挂着，大太阳晒着，你們要造反哪？”

“瞧您說的。我跟他們不一道啦。我过您这边来了。胳膊擰不过大腿去。我是吃飯要緊。”

“你這是真話，假話？”

还没等魯克恭回答，坐在“棚楊”身边的狗头軍師閻

同生开腔了：

“咳，掌柜的，您問这个干嘛。来，开柜子拿錢。”

这小子是个机灵鬼，想买动魯克恭，就塞了一把錢給他。

其实呀，这也正中了魯克恭的計。

魯克恭回來了，就把錢交給大伙。大伙就拿這錢墊補了菜錢。以后，魯克恭不斷的到“棚楊”家送消息去，編方造謠，淨是讓他听了心跳的話。一回來，准帶一把鈔票回来。就这样，一晃过了兩个月。

日子长了，“棚楊”以为魯克恭可靠了，就出坏招儿說：“克恭，既然你过我这边来了，你就得給我办点事。这事嘛，你要是办好了。嘿嘿，我給你新打的三輪一輛，三季衣裳都是里表新的。”

“头儿，您說办嘛吧。办得到的一定办。”

“你扒哪个爐子？”

“11号爐子呀。”

“好，你这么办，明天黑夜，你偷偷把爐条扒了，造成事故。嘿嘿，东西可就全到手了。”

“头儿，行是行，可是得緩几天，找着下手的机会，要是讓大伙瞧見，我吃不了兜着走啊。”

“这样吧，七天，一言为定。”

別說七天了，十天也沒信儿。魯克恭还是到“棚楊”家去要錢，“棚楊”琢磨着不大是味儿。手指縫繃緊，不大相信小魯了。他另憋了新招子。

有天晚上，算天皇孙志欽去胡同口买烟卷儿，正好有

个人拿着張紙條問擺糖攤的彭老头（你還記得最初爭雙月搞罢工的那位彭頭嗎？）：「我打听一声，有个叫苏德林的在哪儿住？」

彭老头一看这人有点邪行，要胳膊根的派头，就問：「你找他干什麼？」

苏德林是外面的包工头儿，經常做电厂的外活。孙志欽就留上心眼了。就說：「苏德林哪，他就住这塊。」隨后把紙條要过来扫了兩眼。好啊，正是為他們包身工的事。又是「棚楊」的主意，由苏德林另招了一批工人，打算今天乘他們下班，全换了！

孙志欽沒动声色，告訴他門牌地址以后，一扭身跑回厂子来了。

大伙一听，反倒心平气和。說是「棚楊」朝大伙來，棍打一片这倒好，省得他算計这个那个的，大伙悬着心。

赵志清出了个主意：「哥兒們，下了班，咱們別走，預備家伙，干哪！」

天一亮，他們就把队伍拉到門口来了，有拿通條的，有拿鐵銛的，全是鐵器，淨等着苏德林帶人来了。

苏德林沒来，特務張俊臣却来了。一看这架勢，吓了他一跳：「喂喂，你們這是怎麼啦？」

赵志清还有这股机灵劲，馬上給他戴高帽子，說道：「理事长，你們工会管這事不管吧，「棚楊」找苏德林另招新人，要把我們都下了！」

张俊臣一乐，說道：「不是你們工会，是咱們工会。工

“会是給大家办事的嘛，怎么不管，这事交我啦！”

“交你怎么样？”大伙嚷道，“你有嘛保証？”

张俊臣是笑面虎，专去拉拢人的角色。这是买好的事，他还能放过，眉毛一揚，鼻子一翹，給看門房的下了命令：“今天生人一概不准进厂。有嘛事先通过我。”

随后，张俊臣把“棚楊”叫来，板着面孔，一通好熊。

过去見面总是乐嘿嘿的，今天这是怎么啦，“棚楊”呆在张俊臣面前，像掉在烤爐里一样，燒得臉紅筋粗，嘴皮子不停。一連声儿“是的，是的！”他心里却暗暗罵道：“沒給你这道衙門口使錢，你小子給我来这一套的！”

其实，张俊臣倒还不是錢不錢的。他是看上这几十号人了。要是能改长工，这就都可以加入他的工会了。那会給他增加多大势力呀。包身工斗争的事儿，可是复杂透了，八下子都使劲儿……

这时节，厂里来了一位新的工程师，这人名姓都特別，叫来杰。他是从昆明来的。一进厂，大伙就知道了，都罵罵咧咧的說：“又飞来了一个！”

不过，这位工程师可有些不同，穿着一件藍布半截大褂，一来就下地窖了。到了地窖就和大伙招呼，大伙給他个爱答不理的。这还不算，給他来了个外号，叫来大樹！暗含着这是損他的意思，穿大樹的，不勞而食，是光会指手动嘴的一塊廢料。不，来杰还真有兩下子，推煤部有个机器坏了，誰也收拾不上。他給出主意，找着老工人一齐对付上了。工人們傳出来了，說道：“来大樹，好家伙

呀，有把刷子。”

来杰看地窖里的工人光用斜眼飞他，问什么总是哼哼唧唧的，腔儿不亮。碴儿不对。他就扯着赵志清说：“你们别这样对我呀。我是好人，你们有什么困难朝我说。瞧你们这个工作条件太差啦。”

大伙围上来了。一听来杰说的是人话，敢情飞来的也不一样，有好有坏，这比先前那位钱串子工程师强太多了。于是大伙就把“棚杨”剥削的事儿，如此这般的一说。

来杰一听，满臉同情的颜色。自己个往身上揽。就说：“居然还有这样的事。你们听信吧。我给办。”

没过几天，来杰搭拉着脑袋捎回信来：“咳，我办不了呀，厂长不同意，说这是公司的制度。你们好好干吧，我很同情你们。”

要说同情，来杰倒的确是同情。有回，他瞧见工人推着火苗冒着老高的爐灰，连个麻袋片也没有。这要是溅上火星，登时就是一身燎泡。就问：“麻袋片呢？”

“用坏啦。新的不给呀。说这是制度。”

“老赵，跟我来，我给要两块去。”

等着赵志清到了厂长办公室，好啊，来杰跟张景泰吵起来了。一看他进来，两个人赶紧改用南边话吵。好让老赵听不出来。可是老赵两只眼睛看出来了，张景泰这小子真狠，连两块麻袋片也不给。那意思是，不能把工人宠坏了。他们没有麻袋，怎么你做工程师的也管这事！最后，来

杰气哼哼的把赵志清扯出来，和他說：“以后要东西的事別找我。我办不了。这又是公司的制度。”

其实，按制度的規定，到日期，也該領麻袋了，这是张景泰故意刁难大伙。过不几天，赵志清直接找厂長去了，話挺硬：“你还是得給麻袋呀。有日子口管着呢。”

朝他要，这倒可以。张景泰一声不哼，蓋了圖章。就說他这里下了多大心計吧！

別瞧兩条麻袋片，事儿不大，風可吹出去了。都說來大褂为包身工的事跟厂長干了一架。你傳我，我傳你的，加油加醋，傳到“棚場”耳朵里，这小子一泡坏水，多了好几个心眼，未免心里發凉。“怎么这群穷小子，卖苦力的跟工程师搭合上了？还能少給我上眼藥啊？”折腾来，折腾去的，“棚場”倒开窍了。反正怎么也是花錢，何必花了錢还怄气呢，干脆輸这口气吧。于是他派狗头軍师閻同生到赵志清家来。

正是吃饭的当口。老赵把狗头軍师迎进屋去。这小子瞟了一眼桌子上摆的窝头咸菜，故意找話：“吃了嗎？”

老赵說話嗆喳的。“这不是正吃着哪嗎？”

“沒福氣嘛！吃这麼难咽的玩艺儿，人活着为嘛呀！志清，你是明白人，一轉腦筋，別說不吃这么苦的东西，唔，少不得还要弄个三掌柜的干干。”

老赵准知道他是为嘛来的。就压住气說：“有什么事，你直說吧！”

“老兄弟，楊头很器重你，想和你交个朋友，磕头拜

一把子。往后是，伙燒一爐香，伙坐一只船，有福同享，有患同当。都是自家哥們弟兄。嘿嘿，你这回可是一步登天啦。”

老赵也嘿嘿了兩声，眼珠子一瞪，大喇叭嗓子嚷开了：“你回去告訴‘棚揚’，咱是工人，穷光蛋一个，为大伙儿办事。姓赵的不卖朋友！”

“老兄弟，凡事三思而行。干飯燉肉，窝头咸菜；掌柜的，推灰的；这个分量，一天一地，你可掂掂！”

“你給我滾！”赵志清“砰”的一声把門推开。

閻同生的圓臉變長臉。臉上罩上一層冰霜，冷冷地說道：“好，好呀！姓趙的，你也太不識抬舉了，把道都走絕了。走着瞧吧，看我拿錢買不了你這條小命！”

赵志清把袖子一挽，也說：“好，咱們走着瞧吧。”

這一鬧，等於是硬弓又拉上一扣。包身工的哥兒們都格外加了小心，有今個沒明個的，走着瞧吧。

瞧着，瞧着，“棚揚”的毒計還沒容使出來，倒是大時代已經來到。海河岸邊响起隱隱約約的炮聲，這些聲音在人們心弦上激起了莫大的震動。哥兒們都暗地使勁，悄悄念叨着：“國民黨要完蛋了！”

越來越緊了，緊到輪船不通，飛機不飛，天津像一口大龕似的，被解放軍包圍了个水泄不通。張景泰表面上還根據國民黨的布置，安排了工廠職工五人聯保，保證不是共產黨。可是心里却直打鼓，渾身毛毛噓噓，屁股像坐在針毡上一樣。走吧，沒法走；不走吧，共產黨來了，要怎麼整他呢？這小子心神不定，倒經常把來杰找到屋裡來聊



天，讓來杰唇癙他。

來杰是共產黨嗎？不是。張景泰很知道他。找他談的原因是這樣：來杰的老婆前些時候坐船到南邊去，走到山東半島地面，船觸礁了，停在海面上。一船上好几百人，都是行裝累累，滿是金銀珠寶的有錢的人們，大部份都是從天津走的。這事當時很轟動，謠言很多，都說讓解放軍給他們浮了，杀了，東西都搶光了。事實却是當地的民兵駕着小船，把一船的人都接走，把他們的行李都搬到海灘上，等船修好，又把他們送走了。來杰老婆聽當地的工作人員給他們講過話，對政策有些理解，又亲眼看見過解放軍，所以回來以後，就把所聞所見全說給來杰了，來杰把這事當做海外奇談，到處去講，到處去說。張景泰也灌了一耳朵。因此他就來打聽來杰：“你說万一……如果，假設他們進城以後，對咱們怎麼個看法呢？咱們是技術人員，他們連工商業都保護，自然咱們更沒什麼問題了吧？他們一定要用電，要用電就得靠我們。是不是，你說呀。”

來杰偏不給他打保票，不給他吃舒心丸，倒說：“廠長，有些事，廠長，我覺得嘛……”

聽着“廠長”這兩個字兒忌諱，張景泰連忙攔住他說：“來工程師，你就不必繞彎子吧，有話直說吧！”

“地窖子包身工鬧得很厲害。現在他們還到處告狀，罷工，打架呢。將來局面一變，那還了得？依我看，應該取消包工制。”

“這是公司制度，不光天津一處這樣。”

“到那时候，恐怕很难这样說了。他們几次請求，都說厂長很不同情他們呢。”

张景泰的臉上一陣發青發白。这小子吓傻眼了。只是拼命吐烟圈儿。

事情决定得很快。轉天，赵志清被叫进厂长办公室。张景泰决心要买好。可是一瞧老赵那清瘦的臉儿，由不得的气往上撞，劈头竟說了这么一句：“你們呀，給我找的麻煩太多了！头一个就是你呀。我真該不要你。”

老赵勉强舌头打弯，說兩句好的：“得啦，您多維持吧。我們穷人总得吃飯，不活反正不行。”

来杰連忙擺手，对赵志清說：“少說兩句吧；給你們办好事，提升长工啦。”

赵志清連忙說：“那太好了，我先謝謝吧！”

沒等他乐出来，张景泰却念了个名单，魯克恭他們八个人不留。“調皮搗蛋，厂里不能留。”

“他們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啊！”

张景泰还挺嘴硬，咬定这三个字儿了，“不能留！”

赵志清从厂长办公室回来，大伙一听，都炸了。“这不是拆大伙的台嗎？要好都好，要賴都賴，哥兒們不能有甜有辣呀！”

还是那老招子，給他攔車，罢工；为了罢出点眉目来，讓张景泰一概全收，赵志清找张俊臣去了。他不是暗送秋波，想拉攏大家嗎？这回大伙正利用得着他。那曉得张俊臣因为上回那事，后来挨了特务头子一顿申斥。在当

时那么紧张的情况下，电厂是很重要的地方。又不同于一般工厂，在特务的工运组，防奸组控制之下是绝对不许有丝毫罢工活动的。张俊臣拉拢工人，想扩张他的势力，那叫因小失大，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是引火烧身。把张俊臣罵的够嗆。現在怎么个碴，要罢工！张俊臣一听，气不打一处来，伸手从腰里掏出一把手槍，乓的一声，放在桌子上。这小子母狗眼一立，嚷起来了：“你們敢罢工！你們誰罢工，誰就是共产党八路，破坏电厂，我就槍斃誰！”

这手儿很厉害，国民党正抓人呢，讓张俊臣他們特务咬上，槍斃倒未必；可是裝在麻袋里扔下海河这可是寻常的事。何必找这个牺牲呢，赵志清就赶紧溜回来了。倒是魯克恭他們哥几个把大伙攔住。劝道：“哥儿們，咱們只要斗了‘棚楊’，不再受他剥皮，这就是大胜利。現在炮都响了，有今天沒明天的日子，留着腦袋，以后跟他們斗吧！走我們几个沒嘛，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哥儿們，咱們后会有期呀！”

人們一尋思，這話有理。已經到了这份上了，还跟他們硬拼什么啊。

停了几天，张景泰在院里召集全体工人开了个会，說了几句刷油涂色的門面話，随后念了个名单，果然是魯克恭他們八个都下了。可是“棚楊”却沒踢开，他也补了个職員，还是負責推煤推灰部的工作；哥們儿里有位石宝林，忍不住气，当时冷笑一声，插了一句：“哼，这他媽的是相着‘棚楊’，給他解套，穿一条褲子！”就这一句話不大

累，张景泰听见了，眼睛一斜，这小子所有的工人都認識，立刻找补一句：“还有石宝林，厂子也不留！”

大伙乱哄哄的，这算怎么回事呀。张俊臣把工会的一张布告贴出来了。字眼用的跟枪弹差不多。“如有工人聚众闹事者，斟酌情况，或开除，或送警备司令部……”有道是奸汉不吃眼前亏，大伙只好罵罵咧咧地走开。包身工的斗争，到此也就告一结束。

## 解放之歌

隆隆的炮声越来越紧了。在炮声中，电厂应当值勤的工人全部到厂里来了。他們个个紧张着，因为槍炮不长眼，碰上誰是誰，誰也不願意在这黎明前夕再遇到什么不幸。但是，从来没有过的，四十多年来头一遭，工人們这样細心地守着电盤，守着鍋爐，守着汽机，守着厂房在时时准备着，准备着迎接解放，也在准备着那突然發生意外事件的时刻，那时候，他們就要拚命护厂，急救了。

到了后半夜。炮声漸漸稀了，近处傳来一陣陣炒豆似的槍声。听着槍声，守在电台上的几个工人还交换了一下意見，“怎么样，炮声稀了，大概是轟开了。”“唔，听这槍声，大概是打巷战吧。”“我的天，什么时候才完哪！”說着，他們还看了看表。表針剛剛指过一点。嘆了口气，一扭头，隔着玻璃，就見有兩個人一前一后，朝电台走來。走在前边的一个，上身穿一件黃布棉袄，里边套着一个大青夹袄，因为外边的棉袄小，那个青夹袄露在外边，足有二寸来长，背后还挎着一个背包。后边一个，穿着一身青棉褲。

棉袄。电台上的工人一看，不用人說，早就猜透，这准是“八路軍”派来接管电厂的人員了。只是未免有点儿納悶，他們怎么进来的这么快呀！难道已經解放了？

他們怔神的工夫，這兩人已經大踏步走進了电台。弄得这哥几个呆在那儿，不敢动一动。誰也沒想到，他們兩人滿面笑容，过来就打招呼。握着工人們的手說：“同志們，你們受惊了吧。”

真笑假笑，一望便知。工人們由不得也笑了，这哥几个吐出了一句話：“同志，你們受惊了！”

接着那穿黃布棉袄的就自我介紹：“我們是接管电厂的軍事代表。我叫曹化一，以后咱們就在一起工作了。”那个穿青棉褲棉袄的也指着自己說：“我叫劉國权！”

就这样，大家聊起来了。聊着聊着，工人們竟把“監盤”的事儿丟在腦后。曹化一同志馬上發現這問題了，就說：“咱們一面工作一面聊，你們可注意电盤哪！”大家这才又扭过臉來，一边看表盤，一边說話。老曹他們光想問工人們的生活，电厂的情况，可是工人們却想知道一下什么叫共产党，共产主义，进城以后，都要做些什么。越聊越熱鬧，一說就說了一個多鐘头。亲热地像是朋友了。

工人們弄了一壺茶來。喝过了茶，老曹這才問：“你們厂長張景泰呢？”

唉，敢情他們事先都摸底呀。工人就說：“厂长在后樓睡覺呢。”立時，勤杂老崔跑去找厂长去了。

这时候，电台外邊圍滿了人。大伙說：“請同志先到

厂長審訊會兒吧！”

他們倆走出来了，還和大伙說：“同志們，你們工作吧！咱們呆會再談！”

可是，這兩人有一種吸力，人們拖拖拉拉的一直跟到廠長辦公室。剛剛坐下，人們就見廠長張景泰從樓底下，一溜煙兒跑上來。臉色有些發白，手足無措，又要笑又不敢笑，又要招呼又不敢招呼的樣兒。

這兩位都站起來，把手伸過去：“張廠長嗎？”……

談了一個來鐘頭，張景泰走出辦公室來了，臉上浮着一層松心的笑容，才剛那副緊張樣兒一點也瞧不見了。這兩位同志還把他送出來。

發電廠的電機依舊轟轟地响着。但伴着机器的人的聲音却不一样了。從樓上到樓下，從里到外，工人們都是一邊工作一邊談着共產黨，共產主義，有些人還不時的跑到廠長辦公室外偷聽，一回一個消息，“他們沒有睡覺，兩個人在商量事情呢。”“他們在整理筆記呢。”“他們在看材料呢。”

天亮了。那間屋子一直亮着燈，他們一直在工作，一毫沒有睡覺。

## 电厂年青了

解放了，这座最老的发电厂开始返老还童，年青了！

在国民党时期，这座发电厂已經老得不像样子。那些从美国镀金回来的工程师說：“这些发电机都老掉牙了，只能拆开做廢铁卖。沒法不出事故，沒法不停电！”

同样是这个厂子，这些破旧的机器，看看到工人手里是个什么样子吧！从解放的那天起，天津的电灯發光再也不是黃涂涂的了；而且那被譏笑为老掉牙的发电机，也生产出了更多的电。比国佬在的时候，最高發电量是每小时13,000瓩；日本鬼子統治时期，最高發电量是每小时11,000瓩。国民党的“劫”收大員們搞的电量是每小时12,000瓩；而现在却是每小时最高24,800瓩。这是鬼子，党棍子們做梦也梦不到的事。

我們再看看工人的政治热情吧：

自然，中国人民站起来，这是帝国主义最不甘心的一樁事。1950年美帝国主义竟派飞机侵入东北地区，瘋狂进行扫射。杀害了我們不少同胞。消息傳到了天津第三发电

厂，站起来的电力工人們，立刻握紧拳头，向战争販子進行了回击！

消息傳來的第二天，發電三厂全体职工联合署名給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保証安全供电，用哥儿們自己的手，自己的汗水为国家增添一分力量。信这样写着：——

亲爱的毛主席：

我們看到報載美帝国主义的飞机數次侵入我国东北上空，扫射杀害我們同胞的罪行。这种无耻的挑衅行为，使我全厂职工非常憤慨，我們要把这种憤慨变成力量，加紧生产。現在向您提出保証安全供电，不停电一秒鐘，并堅決保証在1950年下半年消灭在生产中的一切事故。同时我們并願与全天津市的职工兄弟們携起手来，努力生产，壮大我們的力量，巩固我們的胜利果实，支援中国人民解放軍迅速解放台湾，徹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勢力，并声援朝鮮人民的斗争，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軍赶到海里去。最后讓我們高呼我們亲爱的领袖

毛主席万岁！

天津電業局第三發電厂全体职工

9月5日

过了几天，工会主席一头大汗的跑进車間来了，他喊道：“毛主席来信了，毛主席給咱們来回信了！”隨后从这个車間跑到另一个車間。立时，車間里激起一片沸騰的声音。下班以后，在临时全厂大会上，工会主席用他那激动得發沙發哑的嗓音一个字一个字的念着：

陳郁同志：

轉來石家庄電業局全體职工給我的信及天津電業局第三發电厂全體职工給我的簽名信，均已收到。請你轉告兩處電業职工同志們，我謝他們的好意，希望他們團結一致，努力工作，為完成國家任務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奮鬥。

毛澤東

1950年9月11日

工会主席的激昂聲音剛剛停歇下來。全場頓時响起雷一般的掌聲。這個掌聲最後化成一種動力，它經常響在工人們的腦海里。黨委會抓住這個鼓舞人心的事件，把發電廠帶到一個更新的、更向上的境地中去。在工人們一直干得熱火朝天的基礎上，健全了負責制、交班制，提高大修質量，提高供電度數，節約用煤，最後在1952年贏得了天津市第二模範廠的稱號。

電廠最苦的莫過於地窖子的推灰工了，所以解放以後也以推灰部的變化為最大。

那還是剛解放呢，劉國權廠長（就是解放那天穿青布棉祆進廠的那個同志）便下到地窖來了，他一看哥兒們干活煙熏火燎嗆得慌，就說：“这么干活還行，給咱們工人發口罩。”看見哥兒們光着腳板，就說：“腳底下趟水還行，發膠皮鞋呀！”以後，夏天推灰不怕雨淋了，一人一

件雨衣；冬天推灰不怕風寒了，一人一件里外新的棉猴。凡是工作中需要的，像手套啦，毛巾啦，肥皂啦，工作服啦，样样齐备。虽然穿着膠鞋，可是另外还有水泵嘩嘩地向外抽水。工人們干着活，不覺感动地說道：“想想当初，看看現在，簡直到了天堂啦！”是的，有人已經心滿意足，到了头啦。

但是，党却不这样看。地窖子里的出紅灰問題還沒有根本解决呢，还在影响工人們的身体健康呢。于是把除紅灰，和另外的兩項急待要做的事情，除塵、除氯并列，說这是电厂的三害。京戏里不是有一出“除三害”么？电厂的工人們也要唱这一出新的除三害。不过，除这三害呀，里面可牽扯着很多科学技术問題。

还是从地窖子說起吧：1956年实行了“密閉式出灰”法。办法很不錯，就是在灰斗四周壘成小屋，里边裝上水管，灰下来了，水管把灰噴湿，再推出来。这样一来，紅灰是好多了，唯有一样，工作起来不大方便，因此影响出灰任务，大伙都不願意用。领导同志就动员說：“用吧，这样衛生一些，对健康有好处。”大伙也能体会这是党关心工人們的身体健康，改善劳动条件，用吧。

小屋式的不好使，是不是改个样式就好些。后来又在十一、十二号爐子裝了船形出灰机。效果是半斤对八兩，都差不多。不过，这事說明，为了除紅灰，大家还在一步一步的琢磨着。

1957年冬天，电厂的院子里开始了一項不算小的建筑

工程，要入地十来米，修一座水冲灰的圓水池，搭了大暖棚，冒着風寒冰冻，把工程火速赶完。工人們个个高兴，这一下子要徹底解决出灰的問題了。大伙儿分批地參加劳动，快馬加鞭，爭取時間。到了1958年8月，水冲灰全部实现。好啊，五十年来又苦又累的推灰工人的笨重劳动，完全讓机器代替了。看看这份麻煩勁儿吧，鍋爐燒下来的爐灰，放到冲灰溝里，用高压水冲得烟消灰灭，它乖乖地順水溜进冲灰池。冲灰池上邊吊着“撈灰机”，这玩艺儿工人們給它起了个外号叫“老雕”，它把灰抓上来，裝到汽車上，运走了。过去得多少人干活！得費多大的勁儿啊？現在只消一个人开开水門，搬搬电扭，問題全都解决。如果有誰到水冲灰泵房的屋里看看，潔白的屋里，寬寬綽綽的伏着兩台冲灰泵，也許会打趣地說：“要沒有地上的台泵，跟迎面的操作盤，这屋子真比娶媳妇的新房还漂亮！”

守在这間泵房里的，五十开外年紀的赵志清师付（記得嗎，他在領头和“棚楊”斗争的时候，几次遭受暗害，险遭不测；）常常和年輕的徒工們講：“現在要跟解放以前比，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呀！”随后带些教訓的口吻說：“要还是从先那吃人的世道，我这把年紀不是累死，也讓人家当一头掉牙的老駒，一脚踢开了。你們这些年青人，沒吃过旧社会的苦，沒受过大累。生活这么美，有些人还不知足，遇見这号人，你們讓他找我来！”

不过，工人們真的并不知足。因为在技术改进，挖掘潜力上，确是无尽无休的。比着水冲灰的办法，現在正在



搞运煤的自动化、机械化。另外，从1959年春天起，哥儿们又在冲灰池周围种下了各式各样的花籽，经花绿叶，打扮得小花园似的，冲灰泵房的墙上葫蘆架上满是黄花。再过几年，谁晓得这里还要变得多么美？

在除红灰的战场上高奏凯歌的同时，在除氧战场上也有新的发现。工会生产委员张树强，这人是个技术员，是学化学的，他协助工人李英，这人1952年才进厂，不过高小程度，很肯钻研，两人合作创造了凝结器除氧罐，降低回水含氧量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这样一来，就解决了电厂历史上一直不得解决的锅炉水管汽鼓结垢问题，省出一台八吨锅炉烧“生水”，大大提高了锅炉效率，还可以节省不少高级工业用煤。发电厂的潜力一下子增了好多。而在除氧的同时，叫市民们皱眉苦脸，最腻味的电厂的尘烟问题基本上也解决了。现在只有袅袅上升的轻烟了，尘粉已经通过特别的吸尘装置，被当做贵重的、特殊的原料来加以处置了；电厂变得更加有本事了，它为国家建设提供了更多的力量。

虽然这个最老的电厂由于地形条件的限制，没有扩建的前途，但它在挖掘潜力、支援新厂上却做了不少的工作，把多余的锅炉调出去，技工调出去，甚至连锅炉的废热汽也顺管道调出去，支援了一家染厂。这还不算，这个发电厂的检修分场修配车间在十年国庆的前夕制造了一座发电机。多大的发电机呢，6800瓩的。发电厂也能生产发电机，这简直是奇迹，但是奇迹却就出在工人們的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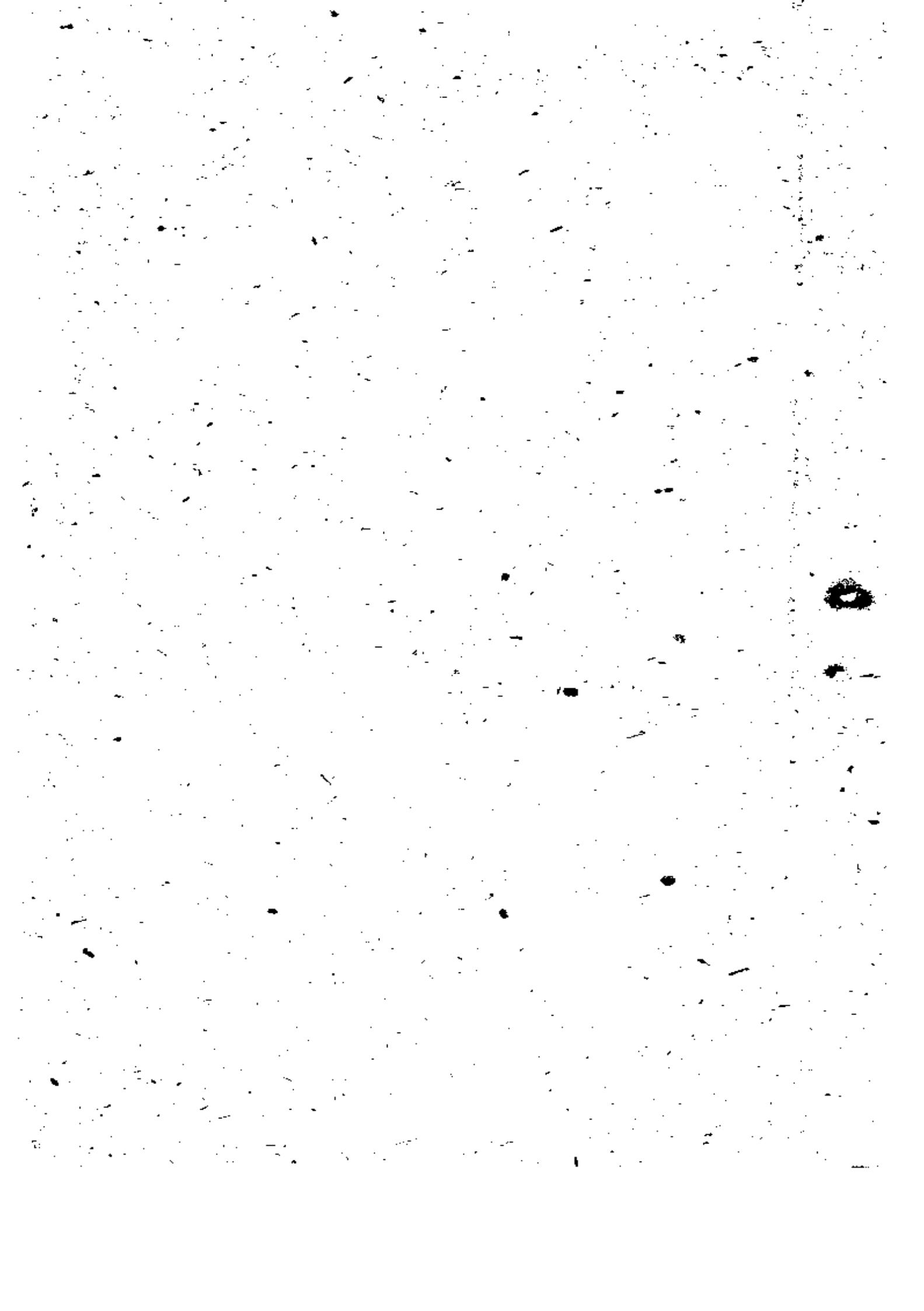
里。电厂的工人本来是創造奇迹的人嘛。

(本文初稿由老工人于庆云、宋治国、张恩元、赵忠清等口述，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发电三厂厂史编写小组片断纪录。二稿由工厂厂史写作组重新修訂补充并执笔改写纂总。)



下卷

人物志



## 溫兆賓

溫兆賓口述

十四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家貧如洗，靠哥哥給人家种地，无法生活下去。我就偷偷跟着跑大棚卖唱的，到处流浪。十八岁那年，才离开大棚，跟乡亲們下天津衛來。投靠了族家的一个哥哥找事做。

沒多久，我被荐到金湯橋同發号花場子当伙計。干了些日子，掌柜的嫌我个小力气小，又不会养花的技术，但又碍着族家哥哥的面子，不好辞我，就出了个主意，給我算了半年的工資，花場子不用我了，只是可以在他这儿白吃白住，多咱找着事多咱走。我已經十八岁了，人家看着不中用，自己偏还賴在这儿吃白飯，这滋味实在难受呀。真不比伸手要飯好过一些。

經常到花場子来的有个游手好閑的王三棍。这小子穿着长袖筒的大漂白褂子，双道臉的洒鞋，月白单褲还在褲下腿拴着小漂帶，他不断的来花場子，轉一轉，拿点花走。掌柜的見着也不敢說什么，老花匠更是裝着看不見。可是等

他一走，老花匠就指着他的后背罵：“真正是臭狗屎。”

我也覺得这小子像个流氓，二流子。

这天，他把我叫出花場子，跟我念叨：“掌柜的不用你啦，我給你找个事由干，你乐意不？”

一听這話，喜的我把他当成亲人。那年月找碗飯吃有多難呀？我就連聲托附他。這話不是冒泡，果然他有路，說：“我介紹你去担河土吧。那儿有窩鋪，管吃管住，到月头还發工錢。”

先不說錢不錢的。有个地方管飯，我就得念佛呀。轉天，王三棍找我来了。叫我跟他走，可临走以前，他問我：“你都帶什么去呀？掌柜的算給你的工錢，你也帶着去呀，那儿可是人多手杂，你可当心別讓人扒了走呀！”

我为难了，“那我存哪呢？”

王三棍胸脯一挺：“兄弟，你信得过我王三棍不？要信的过你哥哥，你把錢交我吧，多咱用，多咱到我这儿取来。”

他說的那样恳切，再搭上人家給我找的事由，这面子怎好駁呀？我就把錢通統交給他了。

在河坝上担土，那份苦罪我不提，因为想受苦还受不长呢。又是嫌我个小力气小，把我下了。天津地面这么大，我可投靠誰去呀？万般无奈，我又硬着头皮回了花場子，心想找着王三棍，我先吃那一百五十个銅子儿吧。那曉得这二流子一听說我找他要錢，避不見面，不到这塊來了。这一来可把我坑苦了！幸亏掌柜的瞧我族家哥哥的面

子，还讓我在他那儿白吃白住。

过了几天。这晚上，大掌柜的把我叫进柜房。指着一位穿制服，袖口上配着“稽察”两个大白字紅袖章的人說：“小温，你过来見見，这是刘稽察。”說过，又朝这位刘稽察說：“稽察，您总得帮我这个忙，他老在我这儿吃呀住呀的总不是个事。”說过，又一扭头朝我說：“小温，你这叫福星高照，刘稽察介紹你到河北电灯房当小工去，你还不快謝謝。”

架弄得这位刘稽察哈哈一乐，說：“这好办，只要我一句话。”

真的，凭他诓道刘一句話，我当真进了“电灯房”。有这么个事由不容易，我干起活来就特別卖力气。后来就由短工补了长工，挂圓牌了。

光阴过的飞快，一晃我在电灯房也干了十多年了。一个月的工資由七元五角，升到二十二元五角。我成了頂呱呱的燒鍋爐工。当小工子，怎么一来二去居然調进鍋爐房来了呢？那是1920年，彭头領着鍋爐房的人爭双月搞罢工，后来讓比国佬給开除了，鍋爐房沒人，就把我搬过来，为了救急。我这人呢，一向腦子不活，单凭劳动卖力气賺錢吃饭，不会給把头、洋奴送礼。所以把头、洋奴也把我当成派系以外的人，总在工作上抓碴找錯，給穿小鞋。平常是哪儿工作困难，把我往那儿調，做好了沒好，做坏了那就吃不了兜着走。那时候，鍋爐房的把头号称八盟，有八个洋奴把头結拜了盟兄弟，气焰老高，誰敢惹这帮地头蛇

啊。我那时信服这一条：自己干活多加小心，讓你們抓不住我的碴儿。

想不到这天中午，电力負荷漸漸下降了，我們鍋爐房跟着回負荷的情况，把爐子一个跟一个的停下来。爐子一停，当然啦，大伙的活儿也輕松了。把头的盟兄弟大李头吃完了饭，和几个司爐工人圍在桌子边，你爭我夺，也不知道搶着看什么东西。好奇心誰都有呀！我也挤进去看，原来是大李头拿着一卷子“春点画”正看呢。那年月，工厂里这玩艺很流行，都是为了麻醉工人的。一股好奇心迫使，冷不防，我一把将春画夺过来，扭头便跑。大李头就在后边紧追。一边追一边嚷：“温繼善，你別找倒霉，快还給我画！叫外国人看見就都倒霉了。”

我一听他怕外国人，就成心向后院外国人那儿跑。我寻思着正吃午饭的时候，外国人不会出来，就连大管家李麻子也不会出来，他睡晌午覺呢。那曉得大李头穷追不舍，嗓門也越来越大。等跑到洋人院里，他和我搶画的时候，忽然間有个女人叫了一声：“干嘛你們不去干活，跑这儿打架来嘛！”

这女人叫柳丽华，是比国总办王士賴斯的媳妇，她这一嚷不要紧。我們倆全驚了。春画也不搶了，耷拉着腦袋，赶忙溜了回来。

把头陳金山可抓住碴了，把我們倆叫住：“喂，李大头，温繼善，你們倆干嘛去啦？”看我們毛毛咕咕，他一双贼眼盯住那副春画了，“这是嘛呀？”

我这人实性子，不会編謊，实話实說。大李头可口口声声的叫着：“二哥，我剛要放起来，溫繼善一把搶走了。他非往后院跑不可，叫柳丽华看見了。二哥，您看怎么办呀！”

我一听這話不对呀，都扣在我身上了，就說：“大李头，你要是不追不嚷呢，你什么时候要收春画呀？”

陈金山那容我分辯。就說：“你們闖了禍，你們自己負責。不要光知道錢是好的。好时候也要給不好的时候下点保險費。我跟外国人報告了再說！”这小子眼睛不瞧我，可我明白，他這話全是甩給我聽的。心想禍是惹上了，脫也脫不掉啦，跟他把头沒什么說的啦。我扭头回了鍋爐房。

轉天一上班，洋奴李毓子就派人把我和大李头叫到总办室里去了。翻譯告訴我們說：“李大头溫繼善你們兩個人在班上打架不干活。特別是溫繼善不老实，竟敢对着总管太太撒尿，太野蠻了。这里有总管下的条子。大李头是黃條罰錢兩元，發薪扣清；溫繼善是白条开除出厂！”

又气又恨，当时我好似掉在万丈深井里了。有心反駁一句，又一想，打架也沒用，反正是小鞋讓人家給穿上了。一賭氣，又是二句話沒費，我出厂了。

在外东奔西跑，晃了小三年，別瞧我是好体面的鍋爐工，却是几个厂子都沒呆住。这都是些中国資本家干的小厂子，經不起折腾，动不动就欠工資，就歇业。

有天，遇上老伙伴吳師付了。他說：“老溫哪，咱們

电厂又盖新房子，添爐子了，正上人呢；你还不煩人說說，回厂子燒火来。”

我說：“外国人把我开除了，我回的去嘛。”

老吳給开了条道儿。“沒关系，現在王士賴斯調走了。你改个名字，那查号去。”

这可好，我馬上托他跟头說說。第二天，吳師付陪着安头和几位过去的伙伴到我家来了。見面他們就給我道喜，还說，“多少年的哥兒們又湊在一起了。”

安头安起順是个老好人。是鍋爐房最老实的燒火头子。和他一班工作的人沒有受外国鬼子气的，他也不压迫工人送礼，也不給大伙說坏話。鍋爐房的工人都希望和安头一班工作。跟大伙好，自然他也得受大把头陳金山的气。后来日本鬼子在的时候，14号爐的鍋爐發生干鍋事故，陳金山抓住这个碴儿，一脚把安头踢开，換上他的表妹夫王一灰堂。安头當了修水位計玻璃管的鉗工。这都是后話了。

从这儿起，我一直在电厂干下去。几十年过眼云烟，要說生活最苦，莫苦于日本鬼子統治时期了。那时候电厂改称为华北電業第三發電所，物价飞漲，每月發給的工資一家生活不了三天，發給七八十斤豆餅面，杂粮面，又苦又辣，里面还帶着許多老鼠糞、麻袋毛。給穷哥們預備的乾食摊也少了，卖的大半是黑食糕，高粱面摻杂粮面做的，吃一口粘的拉不出舌头来，就这样，人們还得赶半夜去排队，才能买上一斤半斤的。粮食还分人种，大米只許日本人吃，中国人要是吃了大米，那就犯了罪，抓走以后，

打不死，也得送日本当劳工去。早晨，七点来鐘，从金鋼橋过，到电厂上班来。瞧吧，見天价都能看見扒得淨光淨光的餓死的流浪汉，一地排子車接一地排子車的拉到鐵道外小王庄、小王庄一帶野地里掩埋。那还有工人們的活路呢？厂子里的工人也紅眼啦，能偷的就偷呀。可是，一个燒鍋爐的能偷什么呢？沒法子，拿命拚吧。下了班，別瞧累成那样，我还得找外活去，当兩条腿的畜生，拉“膠皮”草。跑上一天，兩腿發直，兩腳發漲，交車回来，好的时候，能剩个八九毛錢。孩子們堵着門迎接我，一瞧賺回錢来了，个个喜笑顏开，接过錢去，再赶快去排队挤着买山芋面，杂合而去。我倒在炕上歇一会儿，呆不会儿，又該到电厂上班去了。一个人当兩个人使喚，就这么沒黑天沒白日的折腾。

即使这样苦卖劳力，还是顧不上吃喝。还是飢一顿，餓一顿的。我那几个孩子个个瘦的賽过干柴枯棒。怎么办？还是活不了啊！

我們同厂的，又是住同院，同在一起拉“膠皮”的胡玉清和我說：“咱們都是拉家带口的，老是这么‘抗刀’还行呀？”

“那怎么办呢？树挪死，人挪活，我真恨不得逃荒啊！”

老胡就出了个主意，他有个舅舅在东北开荒种地，他一个人，也需要帮助，要不，下一趟关东，在那儿混碗饭吃。誰去过关东啊？又是这么兵慌馬乱的年代。可是不走又沒活路。我老婆就和胡大弟妹，拉扯着孩子們泪眼汪汪

地到东北去了。这些年呀，我沒和孩子們分开过呀。送她們走，我的心都裂了，这都是讓生活逼的呀，一家人全拆散了。在东北，也沒有落住脚，他們又回來了，到头來还是一起苦熬。

熬到解放，你說，我們这些老工人該是多么幸福吧！从一打解放起，我就有这么一个思想：要是不好好干，不加把力气，实在太对不住党了；太对不住那些为了解放我們而牺牲的那些先烈了。

其实啊，我也沒干出什么来，可是大伙却都說：“溫師付能帮助人，什么活儿他都做！”咳，我一小就卖力气，劳动是正理，閑着我不習慣呀。我哪有什么供獻呀？

1953年的时候，我們电厂煤种复杂，大量使用的是烟台煤。这种煤可难歪歪，着火点特低。可我們这个电厂又是个尖負荷的厂子。前夜發电量大，鍋爐都是旺火，一进后半夜，就得压火，压火的时间特別长。非好煤頂不住。偏偏我們使的是这种次煤，压得时间长了，干脆火就灭了！年輕人就着急了，这怎么弄啊！跟燒鍋爐打了一輩子的交道，我什么煤沒燒过，还能讓他死煤難住我們大活人嘛？我就出了主意，琢磨出一套办法来，几点几分压火，压多厚；几点几分升，升几道風。咳，說起来也不是什么學問，就凭这几十年的經驗吧！这一来，倒是有点供獻，解决了烟台煤着火点低的这个討厭問題，在供电上沒受到拿捏。誰能想到呢，就凭这点供獻，居然評我做1953年的天津市劳动模范了。党給我的荣誉太大了，不过，要說最

大的榮譽的話，那還該說是我1953年被批准為一個共產黨員的事。

一個共產黨員應當為黨的事業一直工作到底，現在，我已經退休了，但我還在工人新村裏面辦些街道服務的事。我的心還不老呀，而且時時的想着干了一輩子的電工，打了那麼多年交道那些大鍋爐。……

(王庭芳 整理)

# 裴树林

裴树林口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我已离开父亲摆了十多年的茶摊，后又自謀生路，在作坊里織布带子了。蹲在囚籠似的小屋里，从早干到夜晚，一个月才拿四塊錢。真是憋气。那年我是廿六岁，正在壯年，年輕人誰沒有点儿理想啊，有道是树挪死，人挪活，于是自己心窝子里老想着飞出去闖蕩闖蕩。可是，究竟往哪儿闖啊，沒个路数。

有天，我們一位伙伴得了个訓，說是下邊租界里的法国洋行招募华工去法国。一个月給22塊錢。其中10塊錢由洋行直接交給家里，算做养家費用，其余12塊錢在法国發，做零用錢。我一听，這事儿不賴，到法国比光守在木机子旁边强啊。于是四个人一塊儿报了名。报了名还得驗身体。驗下来，想不到他們三个人都不及格，就剩下我孤另另一个了。一个人举目无亲的，干什么去呀！我又犹豫了。他們三个就俏皮我。讓几句玩笑話一激，走就走啊！走的时候，父亲不知道，怕他舍不得我走。我是悄悄

溜的。穿着一身衣裳，一个熟人没有，就这样上了路。

我們先到的威海衛。到这儿一住三个月，受軍事訓練。这时候，大家才知道受了騙，并不是去做华工的。訓練了些日子，从我們这里挑出班长和棚头来，当时是十二个人一棚，一棚有个棚头。大伙为了互相團結照应，于是三棚三十六个人合伙拜了把子，結为三十六盟。大伙对天起了誓，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三个月后，我們坐船到了法国，在××登陆。这一船裝了两千来人。到了那儿，有一个英国軍官講話，那几句話由翻譯翻过来，我还記得很清楚。他說：“你們东方人来西方，不是叫你到登金厂發財來啦，是叫你們打瘋狗來啦。你們和我們訂的有合同，三年回去……”

正說着呢，忽然一陣警笛响，德国飞机来了。大伙乱窜一阵，把会攏散。第二天，这位英国人又接着說：“打胜了，我們把你們送回去。打不胜，五年、十年、十五年也要帮助我們！”這話把大伙說的一楞。真有那抹不开弯的人，竟有急瘋了的。

我們住在野地里，临时搭的帳篷。那些帳篷一望沒个边，光这片地里，大概住着有上万人。据傳說，前前后后去法国的有十三万中国弟兄。随后，便發軍裝了，从腦瓜頂直到脚后跟，全是法国軍队配备，滿講究的。所不同的是不發槍。不發槍，大伙倒是心里一乐，准知道不讓我們当炮灰去了。只是还提着心，怕發橡皮褥子。有了这家伙就得上前綫当担架队了。據說有些华工做了担架队，牺牲

了好多。我們却幸运，撥到后勤队伍里，專門做裝卸工作。分人的时候，法国人可狡猾，兩人一排，他从中間一撥，左边去一个地方，右边去另一个地方。他主要是怕中国工人抱团，不好对付。

幸运中最幸运的要屬我們五个人了。不知怎么一眼，湊巧讓一个挂四道的中国官儿瞧見了。他把我們五个叫住，說是你們別去工兵裝卸队了，把我們撥到了医院去当衛生員。那时候，我正年轻，虽然瞎字不識，但是記憶力满好，外国人說話，如果不太长，听上兩三遍，我就能接音模仿，会学舌。讓我办个什么事的，准能完成。干了几个月，医院里的大夫保举我，給我写了封信，硬說我会說法国話，可以去应試。这都是哪儿的事？叫我去，我就去吧。到了那里，湊巧碰上厨房的厨师付了，他也是天津人，也是織帶子的。异国遇故知，好啊，我們倆別提多亲近了。他說考試及格就可以給一道，做官儿。于是又教給我兩句英文，順声音死記硬記。第二天就考試了，第三个考的便是我，一問正問的是这几句话。那有这么巧的事，胡七八糟的，我竟当了一个道的棚头，做小官儿了。

干了一年棚头。有回，遇上挂三道的法国官儿，他叫火車門碰破了头皮，硬叫我給他包扎伤口。我那会呀，非叫我来不可。一來沒来好，这小子火儿了，要揍人！你揍人，我一赌气，棚头不干了，衛生員也不做了。那时候，中国人都有这种思想，不伺候你法国人，不受你“小老法”的欺侮，惹我們华工，我們华工有十三万人哪。高低我不

了。他們只好調我到倉庫去。

剛一到法國的時候，法國的軍官可瞧不起中國人了，不是罵就是打。剛一去，唬着洋氣，我們還是真不敢動手。

後來，我們工人們摸出門道來了，一個是他們認不准中國人的面孔，二個是法國兵不多。我們就不放鬆他們，再聽到他們罵中國人，我們是伸手就打。而且打的越狠越沒事。

這些法國軍官只要頭破血出，你放心吧，登時吓得他們就老實了。有回，我們八個人一齊出去，路上見着幾個法國挂四道的軍官，按軍隊的規矩，我們給他們行禮。他們却連瞧也不瞧一眼，楞沒還禮。沒還禮，我們一商量，這可得教訓教訓他們，頭一個我上去了，給了一拳。跟着我們拳腳齊下，把幾個軍官打的爬不起來。然後呼嘯一声，一走了事。後來，法國軍官不曉這事，在各隊里查尋，人太多了，到底沒把我們查出來。以後打鬼子官兒竟成了風氣。

但是，也有些人忍受不住這種單調生活，走了另外一條道。私自逃走。這些人下落不明，不知淪落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們是整整熬了三年，終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帶着滿身的病痛又回到祖國大陸上來。

回來以後，父親的茶攤還擺着。倒是我的織布帶子的手藝却拾不起來了，那就干苦力活吧。因為在法國做過華工，比國佬另眼看待，經人一說，便進了發電廠。

我在電廠里度過了大半生。這半生成天為吃喝犯愁。而且是歲數越大，生活越難熬。特別是父親，六十九歲了，

身子抵当不住，得了伤寒病，倒在茶摊的木板上，呻吟了几夜，随后断了气。我們眼睁睁地看他断了气，也沒錢請医生給他治。他死了以后，茶摊沒人摆了；一根維持大伙活命的繩子斷了，日子就更难过了。后来，逼得我下班回來以后，还要带着几个孩子拾煤檢去，卖破爛去。……

这些話都过去了。解放以后，党給了我一个愉快、安逸的晚年。我从1953年起，开始退休了，現在拿着养老金，住在新蓋的工人新村里。几个在旧社会拾煤檢的孩子，現在都长大成人。有三个當了国家的干部：一个在包头發电厂当科长，一个在洛阳發电厂当領班，一个在南京电厂当技术員。还有一个儿子在农村，一个儿子在讀高中。他們都过的很好呀。

不光青年人生活得很好，我老伴儿生活的也很好。旧社会里一个又穷又瞎的老婆子，現在也識字了，而且被选为人民代表，街道委员会主任。每天起早赶晚的為群众做些事情。去年还到北京去参加了职工家屬代表大会。真是一個过儿，有时候她出去忙了一天，倒是我留在家里給她做飯吃了。咳，說起来我也不单是为她做飯呀，我是劳动慣了，做点家务劳动，自己心里也安然一些啊。

(馬鳴丁 整理)

## 焦登潤

焦登潤 口述

我是大城县生人。在农村长大，从小儿就拾柴捡粪，给财主家放羊，成年价累的死去活来，还是混不上吃混不上喝的。随后便投乡亲到了天津。经人介绍，到“电灯房”来了，跑外线，做电工。做外线电工，受的那份苦就不用提了。

我要提的是，日本鬼子统治时期，听乡亲们从家乡来说，老家成了“解放区”，闹穷人翻身，打日本鬼子的事。咱一听，从心眼儿里信服。你想想，咱穷人让财主逼得做牛做马，一听到翻身的消息能不高兴吗？再有打日本鬼子的事，更是可心。乡亲们来来去去，其中，我们老表弟来的最勤，总是定期来，定期走。常了，我就问他：“你光是这么来来去去，干什么呀？”

“做点小买卖呗！”

不错，那年月跑单帮，干小买卖的不少。只是日久天长，每次来，每次谈，谈来谈去，我摸出我们老表来了。

有他这么做买卖，跑单帮的嗎？一談就是抗日，再談就是共产主义。我心里照影子，这年轻小伙子腦袋里裝的都是什么呀？这人有思想，不是为俩錢跑跑顛的人啊。

我琢磨他。其实他也琢磨我。因为我特別关心家乡的事，也爱談个革命，談个翻身什么的。他也看出我在这方面有發展，有基础。于是，有回他就照直和我說：“是某不如老表亲。咱们俩摊牌吧。表哥，你說我是跑单帮的嗎？”

我笑笑。“老表，你总信得过你这个表哥吧，我一辈子就凭手上这点儿汗吃饭！”

点点头，他照直和我講了。原来他是共产党员，每次来都是負責来做采买的。說开以后，他倒方便啦，找个人啊，买个东西啊，經常叫我帮忙。我这人是个架線的电工，成天长在外头，东游西轉，办起这事来，有时比老表来的还自然，还方便。讓我办什么，我就办，从来没有駁过，也从来没有怕过。只是，我心里也沒多想别的，我沒有文化，做不了大事，也就是帮帮忙唄。

直到1945年的春天，表弟这才和我說：“表哥，难道你老是这样嗎？有沒有要求？”

“我还有什么要求？”我挺不明白的。

“这样吧，跟我回家去一趟，你乐意不？”

嗨，这可摸着我的心坎儿了。我說，“我可乐意愿回去看看啦。”

“这可是秘密。連表嫂也不能知道呀。”

我說：“你放心吧。我跟她叨叨不上这些。”商量好了，我撒了个慌，說是要跑一趟单帮，發点小洋財。我們“內掌柜”一点也沒多心，点了点头。电厂里的假期也批下来了。我便和老表上了路。

出天津城圈不老远，我們走进一个小庄子。究竟什么庄子，老表不說，我也不多問。隨后由他領我进了一个院子。給我找了間小屋，住下来。第二天一早，有个人来跟我說話，一見我就喊：“焦同志，你來啦。”我应了一声“來啦！”可他姓甚叫甚，他不說，我也不多問。就这样，我們聊了一天，从我家里情況一直聊到天津市面，我是邊說帶評。为什么这样呢，我也有个心思，讓他看看我怎么样。

第三天，我們轉移了，又往里去。坐船到了王家沽搭，在那儿，另有人跟我談話。講了許多党的綱領，党的政策。一連給我上了几天課。

隨后，那位同志問我：“願意不願意抗日呀老焦？”

我說：“当然啦！”

他跟着又問：“你願意參加共产党不？”

这倒把我怔住。我吞吞吐吐的問：“我够嗎？我配嗎？我行嗎？”

“老焦，你是老工人啦。看你自己決心啦！”

我这才結束那种自卑的思想。决心入党了。……

在第七天头上，他們用一只漁船把我送回來了。我和划船的人也沒過話。入党了，我更懂得机密的重要性了。

船驶进天津边沿地界，被几个兵不兵，匪不匪的人把船喊住。这几个家伙到船上乱搜一通，任什么也没有，就把鱼给扣了。看起来，划船的同志早知道他们这点道行，那鱼正是给他们预备的。就这样，我安安稳稳坐船直到了天津。

从那以后，老表不再来了。另有人和我联系，主要是做采买工作，采买工作里，最主要的是买药品，这工作我干的是得心应手；这买点，那弄点，一点不引人注意。只是另一个任务可开展得不够快，活动周围的一些人，都有那些是可以发展的人呢？

凡事只怕有心人。一来二去的，我发现比国副总办家里，那个女佣人叫楊青卿的有点儿意思。她一连打听我几次：“你老家是哪儿，是解放区嘛？”

“是呀！”

她又试探着问：“解放区到底怎么样啊？”

我也就试探着给她来点眼药，做点宣传，说：“我不明白。可是听到这儿来的老乡说，八路搞的可好啦！”

她还是真爱听。谈来谈去，我们俩的话说深了。有道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彼此都信得过，彼此都有点思想相投了。

有一天，她悄悄拉我到一边儿说道：“焦大爷，我有一封信，要捎到你们老家去。你给办办行吧。”

“也许行，也许不行。这么办，你说说你是怎么回事吧！”

她和我說了實話，原來她是个赤色外围群众。在上海的时候，南汉宸等同志在她家住过。后来事机不密，他們轉移到解放区去，她也就离开了上海，东跑西顛，辗转来到天津，不知怎么托人，干了这么一份侍候洋人的差事。現在她很想和南汉宸同志取得联系，或是去解放区，或是留下来工作。

这封信捎过去，不到兩個月，南汉宸同志的信来了。从这儿起，我也和她摊开牌；在一起做了一些工作。楊青卿識字，搞起来买来，比我强多了。

1948年的下半年，天津的街面上，誰也看得出那緊張氣色。国民党鬧了一次法幣改金元券，物价暴漲，搶購一空。鋪子里面貨架是空的，鋪子外面傷兵是多的。国民党就要垮台了。这时节，党派人来傳达布置迎接天津解放的任务。要多做宣傳工作，保护工厂机器，穩定人心。

宣傳工作很好做，只要这儿沒有特务，你放心吧！十堆人里有九堆談的是解放了怎么办，八路軍到底怎么样，我就利用一切机会尽量說起来，“我是沒見過，可我們老家常有人來，要是听他們來的人說嘛……”

天津臨解放的前一天，我的宣傳工作也告一段落了。只差河西还有家亲戚沒去說過。我一想，西头轉電站是我做工的地方，我还該到那儿看看。炮已經打得很紧了。到那儿一看，好呀，国民党扯了多少根電線，灯光賊亮賊亮地，照得四外像白天一样。在灯光下，一道道電網攔得严实实。咱們解放軍攻城的时候，这玩艺可就太碍事了。

能够讓他們点着电灯打仗，电網子电人嗎？我腦子一轉，赶快跑到轉电站，掏出鑰匙，打开鐵門，蹬上小樓梯，双手握住閘柄，往下一拉。唰的一声，总閘就讓我拉开了。西头馬上黑成一片。我这个高兴啊，彷彿我眼睜睜地看見解放軍冲上来了，进吧，沒挡头啦，電網全沒电了！这真是我有生头一遭这么高兴。不过，只呆了一会，我馬上就把門鎖上，乘黑溜走了。

第二天天一亮，天津解放了，滿街都是市民，大家都从隐蔽的地方出来看解放軍。我也露面了。

消息馬上傳到了工厂。工人們都奇怪，大伙嚷着說：“真人不露相啊。看不出你倒是地下工作呀。”

我說什么呢，只好呲牙咧嘴算了。

連我老伴也斜眼睛了，白我几眼，一連喊了几声。說道：“真沒想到，你这么个一扁担压不出个响声来的蔫貨，还是个老八路呢！怪不得从老家一来人，你就朝外面哄我們呢！你怎么不早告訴我呢？”

瞧她这大惊小怪的劲儿怪有气。我說：“好嘛，早告訴給你們，还有我嗎？那还算什么地下工作呀。”……

(曉霖整理)

## 于 庆 云

于庆云 口述

我們是道地的天津人。而且就是电厂左近，獅子林一帶的老住戶，我父亲是眼瞅着电厂盖起来的人。他是油匠，后来經人介紹便到電車厂做长工了。我小的时候，順着河堦找生活之路，撿馬鬃，打“小闊”。后来大些了，便由父亲煩人，也把我带进電車厂来了。子傳父业，也是干油匠，靜着擦車。我由小儿就爱惜父亲的那几把油刷子；刷出来，要紅便紅，要白就白，任怎么髒啊，旧啊，破啊的东西都能变得漂漂亮亮，看着心里痛快，特別喜欢。干起活來真入迷。要是干得“草鷄”一些，不用人說，自己先憋得慌。又受我父亲的影响，懂得做活的不怕出汗这个道理，凡是上岁数的师付們，有个登梯爬高的地方，我总是搶着来。大伙也說：“这孩子是好样的。”那年月，咱們工人是給比国佬干，誰肯卖力气啊，都是比划比划，点到即止。特別是打夜班，有几个睜眼干到底的。我那年才十四岁，熬一宵也够嗆。有天，擦着擦着車，我在上面打瞌

儿子了。偏也巧，讓工头瞧見。这小子心里早憋着碴儿呢，嫌我楞头楞腦，不懂得巴結他，不給他送礼。于是悄悄跑到洋人那里，給我上了个报告，借刀杀人，竟把我开革出厂。大伙一听我被革了，都和工头鬧騰起来，說他：“这么好的孩子，你这么办，太缺了！”工头也会裝蒜，說是原来不过是想吓唬吓唬我，那曉得真給开革了呢！鬧也白鬧，再搭上那年月腦子里有这么一种思想，凭手艺吃饭，不低头不求人。走就走吧。

可是，过了一年，我又回来了。是大伙說的，“活重，叫老大回来吧；那是个好孩子。”我父亲当然乐意，我就又来擦車了。見天見擦車完了，一下班，年輕輕的工人們，专有一帮子坏人勾引，出电車厂不远就是六合市場，那儿有下等娼窑，有人就到那里打茶圍，寻欢逐乐。有些才十七八、二十上下来岁的工人，居然鬧上花柳病，把一生都糟蹋了，旧社会那真是到处安排陷阱，除了剥削、压榨工人之外，还給开这么一条腐爛人們的坏道。来来去去的熟了，有住在厂子里修閘瓦的孙师傅，他就嘱咐我：“可別跟他們一道混。一走那条道，这一輩子就完啦。要爱惜身体。来，跟我侄子練武吧！”他侄子練杠子很有名，还出过国。从这儿起，我也跟着練上了，那时候还真不含糊，十八般武艺，那样都能來兩下子。可惜，沒有練长。这倒不是我沒恒心，是生活条件不允许。要鍛煉身体，在那年月，沒錢沒閑功夫怎么能行？

不过，就凭这点不到家的拳脚，居然給咱們工人做了

点事。1929年闹罢工的时候，领着一撮纠察队，截住围城电車的便是我。我那时的名字叫于世清。二一次，1932年闹罢工，复工以后，我們工人里，选了一撮人保护张广兴，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可惜那次我沒遇上暗害广兴的那撮子地痞流氓，要不的話，可是有热闹瞧了，兴許出了人命。

給大伙出气的是这么一回事。张广兴不是遇刺了么？好哇，工賊刘治倫就派他手下的那些腿子們，車厂电厂到处吹風，說张广兴是蛤蟆伸腿强撑劲儿，不行啦。說要搞工会得跟着他們。乘这机会，要倒我們的工会。我們就和他們理論开了。大伙支持我們，不支持他們。这些小子們有官面势力，有买办林子香給撐腰，于是就买通了門口的警察注意我們，刁难我們。

这天，我們正擦車呢，警察上来了，繞处检查。我心里納悶，这怎么啦，就問：“你上車找什么？”

“說你們藏着刀子，要打群架。”

“誰報告的，你翻吧！”

沒翻着。警察下車了，斜眼和我們說：“你們可老实点。”

我們一寻思，这准是工賊刘治倫他們給使的坏。倒提我們个醒儿，我們就留神了。晌午在喝茶的地方，这些小子們又在吹風：“张广兴完蛋了，誰跟着他，誰倒霉呀。”

我們十八个人一忽拉子把他們十二个人圍上了。我揪住一个問：“你說什么，誰要倒霉！”

这小子喊了一声，“你要倒霉！”过来就撲架。

打架他們不是個。我一冒火，抄起一个斧把，照那小子就砍。砍起来的时候，我心里一动，这一斧子下去还有他的命哪？临时换膀子，斧把改做刃背了。就这一下也够嗆，这小子腦袋开花，鮮血直冒，立时晕倒在地上。

吓得这些工賊狗腿子們就要跑。跑，跑哪去？我們抄起火筷子，抄起什么合手就抄什么。砍来砍去的，直到有个穿黃衣服的來拉架。我也沒看清他是誰，伸手摑了一个嘴巴子，竟从这边把他摑到那头去。他这才喊：“你們怎麼連我也打，我是巡長，我是拉架的。”

一怔神的工夫，兩個警察把我揪住。我說，“你揪什麼？跑的了和尚，跑不了廟。打官司咱們走。”

厂里厂外，好哇，称得起是人山人海、到底官面儿相着他們，把我們十八个人用繩牽着，他們十二个人空着手，到派出所去了。捆也白捆，那些家伙們头破血出，反正是吃了亏。

在派出所里，那个狗官更是买卖人的秤砣，一头沉。和我瞪眼珠拍桌子嚷：“你們要造反哪！我要重办你們！”想唬着我們，把事了啦。

我說：“去你一边的吧！办不办，你管不着！我們打官司去。”

“你們犯大罪了，你知道不知道？”

我說：“犯多大罪，你尽管写。你越写得狠越好。我們不在乎。事情你管不了，你別吹胡子瞪眼的，少給我們來这一套！”

巡長吃了一個大窩脖，這家伙把我們送公安局了。用卡車裝我們走的，五個警察拿盒子槍押車。到公安局里却變了个樣，把他們幾個頭破血出的傷口倒擱在外邊了，我們却到屋裡坐着歇涼。看監的警察還直說，“吓，这么大熱天，小哥幾個怎麼干這事呀？你們為嘛呀？”

我們就怎麼長怎麼短的，從打電車罷工那兒一直說到今天的事兒。一提電車罷工，那是全天津市沒人不知道的事兒。連警察也挑大拇指，說：“你們哥幾個是好樣的，喝水不，我給你們弄點去。”他還出主意，“要是喝水，就得吃東西，吃足喝飽了，好頂足勁打官司呀！”我們也說對。可是那來的錢呢，這倒不用操心，我們工會早把錢使過了。一布袋子的燒餅跟着就送過來。怪不得警察偏向著我們呢。

那幾個工賊狗腿子倒是搗禿癟了。事情鬧到這份上，比國佬跟林子香不肯大把兒使錢，沒有我們來得快。看著我們又吃又喝，他們在外面晒太陽，又是頭破血出的，格外口渴，就湊到自來水管子底下，喝涼水。喝涼水也不行，警察就罵他們：“他媽的，那水是給你們喝的。”順手就抽了孫××兩鞭子。這條狗當時嘆了口氣，和那幾個人說：“咱們這是何苦來呢，到處挨罵，受這份洋罪，劉治倫跟林子香也不管不問了。”哈哈，這小子也後悔了呢！

從公安局又把我們解到法院。臨上車的時候，司機也說：“你們哥幾個是好樣的，我給你們開快車，五分鐘准

到法院。那几个小子，讓他們坐悶子車，大熱天的，烤着这些兔崽子們。”我們明白，連司机这儿，錢也花到了。

到了法院，法官問了几句，來个當場取保釋放。司法警跟我們出來，扯着大嗓門就喊：“你們可找保呀，找不着，押監！”

我們就悄悄和他們說：“辛苦一趟吧，你們老兩位。取了保，我們得謝謝您。不能讓您白跑道。”

司法警一看我們這些工人懂行，也就不嚷了，只是說：“快走，快走。”

那年月，全天津市干電料行，做修理電燈電線業務的，沒有一家不和電車電燈公司職工勾着。而且有不少職員、工頭在外面就开着小電料行。他們都干偷電的業務。所以我們找電料行打保，一找一個准。我們坐車奔南市了。就在我們一位同事開的電料行里取了鋪保，又借了四塊錢，一個法警兩塊，算是把事情了啦。

从這起，我們可失業了。公司以聚眾斗毆為名，把我們兩邊三十多号人全開革了。这是我二一次被開除。其實，開除事小，比國佬跟林子香搗鬼，那才是大事呢。他們暗含着把那十二個打手養起來了，還叫他們出頭告我們，打算用這個办法，連張廣興在內，一起都咬進去。我們也不含糊，工會暗中支持我們，也和他們沒完沒散，到法院傳訊的時候，我們就找了个开业的大夫，开个有病的證明；這次他們幾個有病，下回我們幾個又不舒坦，泡來泡去，官司也就不了了之。旧社會的事就是这样。

买办林子香一看咬我們咬不住，他就另出花招，叫那十二个工賊打手上班复工。事机不密，早有人給我們送信来了。預先商量好，工人們在裏面往外打，我們由外面向里打。反正他們不能上工。這些小子們讓我們打怕了。瞧見我們在廠子外面等他們，扭頭就跑，复工沒復成。後來在電廠、公司都讓我們堵過。這些小子想換個地方复工，也不行。我們只咬定一句，只要他們复工，我們就得复工。

這節骨眼上，國民黨市黨部又出頭了。調解的人是國民黨市黨部委員邵華（這人在1946年做過天津國民黨市黨部主委），由他出名，由林子香付賬，在聳瀛樓飯莊大擺筵席，給我們兩方調解。有道是會無好會，宴無好宴，我們十八個人為了防備一手，特地坐膠皮車去的。進這麼大的飯館子是頭一遭。連站崗的法租界巡捕都看着扎眼，竟問：“你們是干什么來的？”倒是飯莊子人摸底，說道：“是給他們了事的。有市黨部的人。”這才算沒干涉我們。

坐在飯桌前面，又是清蒸白鴨，又是紅燒魚翅，可我們兩只眼却盡着搜索，生怕他們有埋伏，到時候再給我們下了手。這工夫，邵華站起來了，把酒杯一舉，開言道：“看我邵華的面子，得啦，你們都是工人，自家兄弟嘛；也別說誰挨了打，誰打了人，我給雙方調解。我喝你們大家一杯喜酒吧。”說罷，腦袋一揚，一飲而盡。

跟着，林三林子香也站起來，假門假氏的，他也舉着酒杯，說道：“邵委員，我不能駁你的面子。都聽你的

啦。”也是咕嘟一口，一饮而尽。

那边也說了話，他們有人養着，自然乐意和解。我們十八個人一看，這是硬打鴨子上架。不哼聲，光在下面用手你撻我，我撻你的。

邵華以為这么大的飯庄子，这么豪华的酒席，特別是他这么个人物在这儿一摆，把我們唬住了呢。就說：“要是听我的，我給出个主意，你們兩邊都不要爭競，讓公司盡量准許你們复工，挑誰就是誰。”

我二虎頭的脾氣，这时候忍不住了。霍地一下子站起來。原来也想說几句客气的話，可是舌头不受使，一說話就倔他老大一塊的。“要是这样，你調解不調解不吃緊。要复工都复工。由公司挑，他們一个也不挑我們。我們还是法院解決。”

气得邵华把桌子一拍。嚷道：“到法院你們就能解決嗎，你們有罪，你們明白不明白？”

“有罪法院治罪，你不用操这份心！”

这时候，我們又有一位站起來說話了，就講：“我們都是工人，粗魯人，不会說話。你別生气。今天承邵委員出來和我們出面調解，你这么大的面子……”

我嫌他這話太軟，登时插了几句，“別忘啦，有句老話，露多大的臉，現多大的眼！”

气的邵华又一拍桌子。他叫起来：“我不管你們的事了！”小臉兒鐵青，酒沒再喝，菜也沒吃。

活該。我們哥几个是魚啦，肉啦，風卷殘云，吃完了

趕緊都溜了。

不過，跟他們干到底，我們就不行了。刀把攥在人家手里，我們那兒講理，那兒說話去呢？張廣興被捕的當天，一早晨，我們見天見碰頭的那个工会秘密所在也讓警察和便衣抄了！恰巧我守在那兒。在網的難逃，本来也要帶我們走的，有个便衣說了这么句話：“他們大字不識，共产党不够資格；都他媽的穷光棍，逮他們干嘛呀！”算是網开一面，只把我們趕出來，把房子封了。

沒了頭兒，沒了工會，也不好斂會費了，我們算工會那倆錢活不下去了。大伙兒就說：“咱們也各奔西東，找自己的飯路去吧！”

飯路哪那麼好找？我一想，找公司去，跟卖办林三要养老金去。林子香聽說是我來啦。居然把我叫進他屋，請我在沙發上坐下，笑嘻嘻的說：“你要回來，還可以呀。你要早聽我的，够多好。”

我懂得他話里有話，就說：“我是个工人，拉大伙的肉貼在我一個人身上，我討愧呀。我不能那么办。你給我养老金吧！”

看收買不了我。他还嘆口氣：“你是傻子。我留不住你啦。這倆养老金够你吃几天的。”

我吃养老金干什么？我还是耍手艺啊。在外边干零活，干来干去的，瓦匠头王四把我找到电厂来了，在这几千包工活。一进厂，大伙都認識我：“这不是糾察隊的于世清嗎？这不是斧劈工賊的于老大嗎？”都說：“你在这兒

干不长。”

可不，馬上讓比國佬知道了，把包工的王四找了去，說：“他要是在廠里鬧事，你可得負責任。”

王四一拍胸脯，“我使喚的人，你放心，不好的我不要。”

我又不是在廠里做長工和短工，是跟王四來做包活。比國佬也管不了。也就不問了。

由這開的頭，電廠里有什么油活，漿活，經常的王四就派我去，我里頭淨是熟人，干起活來方便。有回，是給新來的總辦家油葡萄架，我一個人連踢帶打。那個總辦看我干活認真，又叫我到公司去刷房子，刷漿的時候，他經常去看，哪時看哪時我都在工作。這天他竟在下面喊：“木須趙！”<sup>①</sup>吓我一跳，還以為是那兒活做的不稱洋鬼子的心了呢。後來趙翻譯進來把總辦的話和我說了：“看你很眼熟。你工作做的不錯，你在那里做过活兒。”我連忙順梯子下來，實話實說。

剛說了兩句，趙翻譯便把話接過去了。他給圓了几句謊。還說：“外國人想補你長工，你得改個名字。”人家這是給我開道。我當然連忙點頭。從這兒起，我改名叫于慶云了。

一晃在電廠里干了小三十年。這三十年，說起來慚愧，我沒做什么事。只是因為干油漆活，和木廠子熟，遇

① 法文趙先生的意思。

上电厂里的工人有办白事的，我就热情地去给他们张罗。也就因为做这些事做多了，解放后，成立我们工人的自己的工会时，居然把我选做了工会劳保委员。我一听，头大了，党委副书记曹化一和我说：“老子，你给大家办点福利事吧。这不比先前好办多了嘛？”是呀，好办自然是好办多了。不过，我常想一个老工人对国家难道就只这么点贡献么？说起来，我实在觉着讨愧呀！

(苏 务 整 理)

# 于文富

于文富 口述

拾煤檢，打“小鬧”；  
沒有事，上河堤，扛大木！

這是一首兒歌，六七歲的時候，我們成天唱着去干活，這正是我們童年生活的寫照。我六歲的時候就已經懂得拾煤檢了。打“小鬧”是怎么回事呢？是給有錢人家辦紅白事，去那個打旗的，拿雪柳的小孩。穿一件紅衣或白衣，腦袋上系個髮結，拖拉着一双破鞋走上一趟，有時可以對付一兩斤棒子面。

七歲的時候，我父親拉膠皮，拉上了“灰兵”，拉到地方他不給錢，朝他要，他解下皮帶把我父親抽了一頓。父親的胳膊被抽得脫了環，連車也拉不上，便提着洋鐵罐，用一只手抱着我弟弟要飯吃。媽媽總是一夜一夜地出去擰面子。當然，擰的不是白面，而是一些發了霉的使人難以下咽的穀子面，草籽面什么的……人們吃下去迎風一

次，就觉得身子打晃，而且是吃多少拉多少！

別瞧我岁数很小，却是出人意外的懂事儿。那么小的心眼里，光想着給爹媽分憂，想法子賺錢养家，別挨餓。

看胡同里的孩子們上学很眼热，爹媽也巴不得我念兩年書，将来好多点儿做事的本錢。于是在我九岁的时候就上了学。那是一座貧民小学，是有錢人家办的慈善事業，連課本都不花錢。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不花錢的学校我也上不了。仅仅几个月，我就不能上了。为什么？因为不能餓着肚子上学呀。沒法子，我还是捡煤核，打“小閑”去。

上河坝扛大个那年，我是十二岁。个儿小，那时，扣洋面口袋每人得扛兩袋，合88斤，我个儿小，一个人背不了，就拉着我弟弟一塊儿去，一人背一袋。說起来，我弟弟比我还苦，他上碼头背面的那一年才八岁呀！一袋面压在他肩膀上的时候，真是从心口里挤出来的声音，“哎哟，哎哟！”我們哥倆伙背兩袋面，算一趟。一趟賺多少錢呢？賺一个小銅子。我們干一天才賺十五六个小子，合七八个大枚。苦哇，真是苦得不能再苦了。

但这还不是頂苦的！我們的房东是个在法租界当巡捕的，这家伙不好惹，因為我們住房子交不起租錢，他立逼着讓我們搬家。正大冬天的，搬出去，連第二宵都不用熬，全得冻死。亏了鄰居們好說歹說，房东算是积德修好，把那間女厕所租給我們了。这間小棚有大桌子那么寬，那么大。我們鋪些稻草，六口人挤在里边打“通腿”。那真是难受，誰也不能翻身，而且一個人的嘴緊对着另一个

人的脚鴨子。也不用說被怎麼破怎麼薄了，因為我們根本就沒有被，蓋的是稻草。有个破棉袄，誰冷的最厉害就給誰蓋蓋。

穷到这光景，有人見了老远就躲。我还記得清清楚楚，有个同院喝破爛的小販，他看着我們特別不順眼，說是我們的穷气能伤人。在院子里罵大街：“你們还活个嘛呀！死了埋地里都不生芽！”人穷嘴短，我們听了也不敢回声。我父亲是个老实人，有話只会往肚里咽。母亲更不敢講什么了。但是越罵她越硬气，經常跟我們說：“咱們人穷志不穷。”要不就說：“还能总穷嗎？还能把穷人都餓死嗎？別說人了，連大糞不是还翻翻身嗎？”母亲說的对呀，她一直这么乐观，我們要活下去的意志可是强哩。

不过，那样吃人的社会居然逼得母亲也尋了一回死！那是我二十岁的时候，剛剛被同院鄰居范师付荐进电厂做推煤工，一天，我父亲出去了一天一宵，沒見回来。那年月日本鬼子到处抓人当劳工。急得我們一家人坐臥不宁。我連忙到賈家大桥左近去打听，那儿有个人市，我父亲是到那儿卖短去的。碰上熟人了，他是和我父亲在一邊的。說是那天剛到賈家大桥，沒留神开来一輛卡車，日本鬼子带着“杂霸地”下来，見人就抓，我父亲五十多岁的人了，跑迟了一步，眼睜睜地讓他們抓走了！這話像一桶涼水，澆了我个渾身發涼。我竟忘記我是怎么走回家來的了。

到了家，我赶紧把眼泪抹干，硬着嗓子和我母亲說：

“人家雇他做工去了，得呆些日子才能回来呢！”說完了，我又坐不住，站不住地，跑出家門口，見着他那么大岁数的我就紧盯几眼，恨不得一下子把他找回来。但是找不着，似乎也并不意外，因为我早明白讓日本鬼子抓了劳工，那还能回来？回不来了！

瞞到第六天上，母亲已經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了。就是不猜，她也会看我的臉色啊。她問我：“你爹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忍心瞞你娘嗎？”

等她知道了，急得賽过瘋子，拉扯着弟弟們往外跑。足足在外面找了一天一夜，最后，她来到東馬路，心一窄，扔下弟弟們，竟一个人往電車軌上扎。幸亏当时行人很多，還沒等她跑出去，被一位要飯的老大爷手急眼快地揪住了。她这才算是沒有死。

大伙都劝說我母亲：“不管怎么样，你也得把这几个孩子拉扯大呀！”

我們一家人哭哭啼啼的回到家。在家里呆了几天，一个穿大褂的，臉皮白晰晰的先生到家来找我母亲了。他說：“我是新民会的，听说你男人被抓走了。不要紧；他大概是在滿洲國。我們現在正招人，跟我們去吧，做几个月的工再回来，好賺錢养家呀。我是可憐你。”

“那我孩子怎么办呢？”

“讓鄰居們照顧照顧，几个月不就回來了嗎？”

母亲更沒主意了，留下来沒活路，走吧，又怎么放得下这几个孩子呢？我說：“新民会还有好人？咱們不听那

一套的，死也死在一塊。”

母亲也說：“对呀，死也死在一塊。”

“大樹”一看我母亲不活心，后来也就不再来了。如今想起来，我还后怕呢。他是打算把我母亲騙走，卖了。那年我母亲才三十多岁的年紀。那真是人吃人的社会呀！

从这以后，一家重担都压在我們哥几个身上了。苦熬活熬一直熬到解放。解放以后，真是应了母亲那句話，我們算是翻身了。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們不再住厕所了，我們也住上坐北朝南，有玻璃窗，阳光充足的大瓦房了。而且，解放一年的光景，1950年我竟然結婚了。說起結婚，年輕人覺得这还不是理所当然的事，还值得一提嗎，在旧社会，电厂里七十多号推煤灰的工人，除了班长赵志清有家小，一律都是穷光棍。一提是推灰的，誰肯嫁过来挨餓呀！要不是解放，我們能結婚嗎？

畢竟婚姻事小，我們学本事是大。从1953年起，連我这笨手笨脚的工人也調进鍋爐房来了。过去推灰的要进这門口，摸一点技术，不花錢送礼，不爬門子窗戶，怎么能进得来呀？这都是党培养我們哪！我現在不光是一个司爐工，而且司水，吹灰，哪儿缺人哪儿去。我真感激党呀！

对于一个工人來說，当然不光是感激党就完了！更重要的还是要不断提高觉悟。說实在的，我是在通过党課學習之后，心里才豁亮的，才懂得了党的偉大。到这时候，我才觉得真正翻身了，不光是生活翻身，技术翻身，而且

在思想上也翻了身。使我有了奋斗的目标。

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就是在1953年年底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愿意终生忠心耿耿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江成贵 整理)

# 馬增惠

馬增惠 口述

我生在天津市滄縣東關村一家佃戶家內。爸爸和三個哥哥給當村的大地主馬閻王種着三十畝水淹老碱地。這那裏是人種的地喲，十年九不收，倒是碱棚棵長的很好！不管收成好壞，馬閻王收租子可是決不含糊，有的交，沒有的也要交！我們一家七口人，終日吃不飽肚子。夏天，媽媽、姐姐帶着我往東南洼地里去打碱棚菜，拿回家來和米糠高粱面摻在一起蒸着吃。冬天更苦，一家伙蓋着兩床破被，穿不上一件不露肉的棉褲袄，吃的是山芋葉子高粱面粥，我們一家人養的都有一个特點；渾身沒有一點胖肉。

村里人管我們叫“瘦馬”。可不嗎，我和三個哥哥都餓的粗干柴棒式的，一層薄薄的黃肉皮包着干硬的骨头，凹着腮，顴骨露在外面。刮大風的時候，人家都替我們擔心，生怕被風刮上天去，再掉下來摔死。

儘管生活這麼苦，爸爸還餓着肚子讓我上了兩年學，在村里的私塾念了一本三字經，十歲的時候因為實在上不

起學，只好放下書本，到大地主馬闖王家去放牛。一个十岁的孩子，成天价沒黑夜沒白天的，一个人陪着几头母牛和小牛犢子在荒野里过活。看着那些小牛犢子偎着母牛在草地里吃草，我真眼热啊。它們在吃的时候，我还得孤零零的打草，晚上捎回来好給牛准备冬季糧。活的真是淒涼透了。

到我十五岁那一年，碰上了少有的大旱，一場雨沒下，沒收成。一进秋，又瓢潑似的大雨連澆數場。秋苗被大水淹沒，庄稼地是一片汪洋。乡亲們都逃荒出外了。我們家也是一样，地不能种了，牛沒处放了，一天吃不上半碗粥，逼得非找出路不可了，于是就由父亲煩人寫了个信，叫我到天津来找我們一位本家族叔。由他介紹我到振兴成鐵工厂当学徒。

振兴成鐵工厂的买卖还不小，是专包修建工程的包工大柜，鋼筋、鐵梁、水暖汽管、白鐵活、瓦、木、油漆，能承裝全活，养着六十多名各种工种的长工和四十多名徒弟。大部份都在柜上吃住，到月底拿一点薪金，干活不計時間，也沒准地方，說走就走，到处做活，沒有带家眷的。經理姓黃叫黃振华，矮胖子，皮膚很黑。手里拿着个粗藤子做的棍子，看誰不順眼就抽誰兩下。手下还养着兩個打手，專門欺侮工人，抓礮打架。不过，最厉害的还是黃福榮黃大監工，他是經理的侄少爷，这爷倆長的都一样矮，一样黑。見了我，問过几句話，打了个鋪保，在一张写着“不守規則打死无论，因故投井、跳河、丢失，厂方概不

“負責”的合同保証書上按了手印。隨後由“侄少爷”把我撥到管子匠那一組里去。而且給我起個名兒叫“四馬”，是根據我姓馬行四這樣起的。那年月，當學徒的不許起名字，都是這麼個類似貨物標號的稱呼。

先還以為在工廠學徒，不管怎麼說，也得比放牛強。其實啊，做佃農是苦，做工人還是苦，無冬無夏的，白天在加工現場干活，夜晚我們四十多個學徒睡在洋灰地上，一床薄被連鋪帶蓋，朝身上一纏，真是越睡越涼越硬。天不亮就睜眼，一睜眼就起床，一起床就得給師付買點心，倒尿壺，稍微不如意，師付們就連說帶罵，連踢帶打。那年月師付們有氣沒處發，淨拿徒弟當受氣包了。受這份折磨的時候，我想，如其侍候人，還不如侍候牛呢。但這還只是小磨難，要是挨上黃家爺倆的藤棍子，那真是把徒弟們打的鬼哭狼嚎，真恨不得有个地縫能躲躲才好。

記得有一年開春了，忽然天一反復，刮起嗖嗖的寒風，又下起鵝毛似的大雪來了，海河的水也上凍了，足有二尺來厚！這麼冷的天，我爬到東亞毛呢廠三層樓頂上的腳手架上干活。光穿着一件空心破棉祆，吹的我透心涼，手腳全凍麻木了，鉗釘子的錘子拿不住，一個勁兒往下掉。我就兩手往袖口里一塞，想暖和一会儿再干，誰知道就這工夫，被“侄少爷”看見了。他喊道：“四馬，你他媽的又要滑不干活，兩手抱肩膀，干什么？”

我並不是偷懶不干活兒，就解釋了一句：“我總得暖和暖和手啊！”

“好小子。四馬，你下来！”

“上邊活還沒干完呢，我下去干嘛？”我兩眼緊盯住他的藤棍子，提防他揍我！

“你他媽的敢叫勁不下来！”这家伙氣壞了，拿着鞭子就往三層樓上來。

他從那邊上來，我却從另一面下來了。氣的這黑豬在腳手架上大喊：“四馬，站住！不許你動！”

我不敢再跑了，可我也沒有老老实實等着挨打。我就往瓦匠師付那邊靠。等他下來，拿着哭喪棒，氣呼呼的，那真是往死里頭打啊，揪住我的一只手，一棍子抽在大腿上，打了我一個坐墩。

冷不防，有人出來說話了。那是做瓦匠活的謝師付。他說：“大冷的天，少先生，可不能這樣打他呀！”

他才不聽這一套呢，掄起藤棍，照我又打。他們這瓦匠組是包活，另一碼子事，不屬他櫃上管。師付們看他蛮不講理，就跟他吵起來了。由說到罵，由罵到打，倒沒我的事了。瓦匠師付全出來了。一個人拿着一把瓦刀，把黃福榮圍在當中。他們嚷：“你別仗勢欺侮人，我們瓦匠不服你的管。來吧！”

這工夫，黃振華坐着包月車，兩個打手，一個推着車背，一個拉着車把，正好趕來了。姜是老的辣，這老小子一看引起了公憤，他黑臉上泛笑，立刻說道：“誤會，誤會，都看我了。干活要緊。”他也是怕包工誤了期限，好說歹說，总算把事情揭過去了。

我廿岁那一年，几个师兄弟和我都該出师了。掌柜的想賴着不讓我們出师当然办不到。可是，他会耍花招。挨了他这么多年的打，又給他当了这么多年的牛馬，他却說，你們出师得謝师，要大摆酒筵，請請大家。这是历来的規矩，我們也不能例外。請那些客，吃什么，这都不用我們操心，他都給办了。那天吃了十好几桌菜，凡是掌柜認識的人都来了。大吃大喝一陣。临完事，掌柜的把我們几个叫进去，說是这謝师的酒得我們花錢，柜上給墊上啦。錢不能不還，怎么还呢，这样吧，为这桌席，我們每人再給他白干半年。一頓飯得流我們半年的汗，这也是老例。真是剝削得还有份儿嗎？不过，他也只能再吸我們半年的血。半年一过，他要留我們当师付，給工錢。我們認可別处找路去，到底也沒有留在他那儿。

在外面干了短时期的活，1942年我煩人說合，进了电厂，在修配場工作。大把头于长有把我派到他的打手王世昌手下做活。我是新来的工人，外面的处世經驗淺，再搭上生活很困难，不懂得“溜上”，不懂得給把头送礼，光知道成天低头干活。因此修配車間的大小头子都恨上了我，暗地派人監視我，雞蛋里挑骨头，故意給小鞋穿。虽然穿小鞋了，为了糊口，“哑叭亏肚里咽”，我从来也不声张。人們常常笑我：“瘦馬瘦的都沒火气了。不敢說不敢道的。”

越躲事越来事。在那人吃人的社会里，有句俗語說得好，“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有些人真是踩在腦袋

上發坏！1943年春天，这天我正干着活呢，就听背后有人站在不近不远的地方，用一种又讓人听得見，又不讓人听得見的噪音，往外摔打話儿：“于头，你看这裁人的单子上也真怪，为什么朱桂生的名字都有，就沒有瘦馬的呢？”

我回头一看，正是把头于长有跟他的軍师，外号叫蛤蟆秧子的工賊赵恩元在叨咕呢！于长有故意把嗓門提高，說声：“把他也填上吧。”

我一听，这不糟了吗，赶紧找朱桂生去。朱桂生綽号朱大炮。他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快下班的时候就堵着把头办公的那間小屋罵了起来：“他媽的誰要想吃独食，我跟他白刀子进去，紅刀子出来！”

打手王世昌出来了。意思是要問問他罵的是誰。朱桂生是敢說敢干，提起个大刮刀，还是罵罵咧咧：“他媽的不怕死，来呀，我給他个一刀脖子齐！”

这一来，把几个小子吓唬住了。誰也沒敢吱声儿。事情竟这样了过去。

第二天，連这点毒也种到我身上了。傳下話来，我被裁了。我找到于长有，問他：“这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一回事？你問外国人去呀。我不知道。”

“你別裝孙子了！”我火了。

于长有也火儿了，喊了一声：“来人，把他赶出去！”立时打手們都拥上来。

一看这架势，我沒有好啦。大伙劝着，我一赌气离开厂子。当时心里想，在外边受这罪，还不如回家受去呢，我

回老家种地了。帮着父亲在家种了一年的地，不行，家里也是没活路呀。1943年正是日本鬼子在乡村进行瘋狂的屠杀，搞治安强化运动的时候，乡村简直成了恐怖的地獄。我一看，还是回天津去。

到了天津，又找我那个本家二叔去了。他这才知道我已不在电厂。就说：“你不在那儿，倒是把我的保单撤回来呀。”我连忙跑到公司，找一位先生要联保書。那是一位过去见过面的老先生。他一查档案，竟說：“不对呀，你们第三所發来的几个被裁的人里，沒有你的名字啊！”

这一句话把我說蒙了。这是怎么回事，哦，我明白了，这是于长有跟蛤蟆秧子搗的鬼。他們暗暗的把我踹了。瞧我这胆小的劲，我连忙求他：“老先生，帮我个忙，我还能回去不？”

“行呀，有封信，在外国人面前說說，也就行了。”

这事情不难办。沒几天，我就拿着信回来上班了。大伙瞧見我，都嚷起来：“瘦馬，你跑那去啦？这一猛子扎的够深。一年多沒有看見你呀！”

拿着这信我奔于长有的办公室来了。別瞧这小子又损又坏，他一看我，臉上未免也有点不是味儿。再一瞧信，这家伙嘴上强裝出点儿笑来：“这太好了，我老早就希望你回来呀！外国人同意，太好了，太好了。”

蛤蟆秧子也假裝欢迎，說：“瘦馬，你回来，我起心眼里高兴，老人一起，不比新人好嘛。”

我也假裝不明白的，說了几句門面話。狠狠咽了兩口

唾沫。为了糊口吃饭，我说什么呢。这話一咽咽了多年，直到解放以后，于长有和蛤蟆秧子受到法律制裁，我这才把話吐出来了。千年冰河开了冻，万年铁树开了花，畢竟善惡是非分明了。

解放了，不光是善惡分明，而且党想尽办法在培养人才，挖掘人才。就拿我这个老实巴交，人人見了都要笑一声的“瘦馬”來說吧，居然还是1954年的天津市劳动模范呢！

其实，我并沒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那年冬天，电厂下在白河的五口吸水管子，因为天寒，上游下来的冰凌太厚，在水落潮的时候，一下子把铁管子拔断了。这还是我們电厂几十年来头一遭遇到的这么一樁大事故。电厂用水很多，我們这个小厂子，一分鐘还要吸八百多吨的水呢，这一沒水，問題可大了。鍋爐沒水就得爆炸，汽机沒汽，就不能运行，立刻全厂的鍋爐都压火了，汽机全停了，綫路都拉閂了。我那时是修配車間水管組的組長，修水管子正是我們的責任，我又是個共产党员，能眼看着电厂遇生这样大的事，不玩命嗎？我們去修水管子，跑到高处，臥到冰上，河風好硬，天气正冷，真是伸出手来都打哆嗦呀。可是冷又有什么呢？想起二十多年前，自己当徒弟的时候，穿着一个空心的破棉袄，在三層樓頂上因为冷得揣手便要挨打的事情來；我还在乎什么冷不冷呢，我和大伙一样，光想一件事了，早恢复一分鐘就可以早發一分鐘的电，早發一分鐘的电，我們无数的工厂就可以早生产一分鐘。干，干，不抓紧干怎么行呢？

干着，干着，不知为什么，支部書記下来了，隨后，厂長，黨委書記也下来了。叫我別干了：“馬增惠，你回去休息休息。你人太瘦，体力不济，又有血壓低的毛病。不行啊，現在你已經干了一天一夜啦。”

“怎么，一天一夜了？我应了一声：“好，好，干完这一段，能吸水了，我就上去。”

不久，管子扎好，可以吸水了，那曉得一开水閘，力量一大，又折了！真急死人！干，接着干！

干着，干着，不知为什么，黨委書記朝我發火了。他說：“党命令你馬上离开。”

“离开干什么？”

“回家睡覺去。这是組織決定。”

我懂得組織紀律的重要性，只好把工作交給別人，走开了。我并不是故意，我当时只是覺着放心不下，不覺着困，也不覺着累。眼睛前面光是那几口大鐵管子在轉悠。无论如何我也放不下心去。从三条胡同，黨委書記眼睜睜的看着我回家去了。对不起，从四条胡同，我又溜回来了。又下去干了。我們伙伴們懂得我这心情，就說：“瘦馬內勁不含糊，讓他干吧，別給他嚷嚷啊！”

五条吸水管又嘩嘩地、大张着嘴向里吸水的时候，我这才知道我一連干了三十六个小时。三十六小时有什么，可是就为这点事迹，大伙非选我做劳动模范不可！党給我的鼓励和荣誉太多了。

(王庭芳 整理)

## 于恩源

于恩源 口述

父亲是个沒有正式职业的流浪工人。靠卖短为生，今天車站干个零活，明天就給蓋房子的当个小工。我們家人口偏偏很多，母亲一共生了我們哥八个，我是老六。賺的錢不够吃飽肚子的，成天在愁吃愁穿的过日子。

我記事的时候大約是十一二岁，三个哥哥已在工厂学徒。白給人家使唤还不行，还需要家里照顧他們的穿戴。我和四哥五哥就过流浪儿的生活，在街头找点閑活，帮助家內生活。平常是到野外坟地里打草，拾柴禾，有时候，遇上有錢人家办紅白事，我們就去打“小鬧”，拿旗罗傘盖，或是打串灯。有时候，也跟着吹鼓手去敲小銅鑼，这叫当“黃梨”。白天干这个，晚上我們可以到李純祠堂里的貧民小学上兩個鐘头的不花錢的學。可惜我也沒識了几个字，一來是人家不好好教，二來是我們冻着餓着学，也学不下去。反正那就是替有錢人家做慈善事業，給他們賺名譽罢了。

我的第一个正式职业是到棉花機擇棉花。到那儿，人家嫌小，把头不肯要。亏了有熟人說合，算是进去了。擇了半天，我手儿生，只擇了二斤来棉花。把头一看，說我跟他泡蘑菇，抄起竹棍子就打，把我吓的抱着腦袋跑出了棉花機。白干了半天！

活儿很难找。正式工作是在兩年以后，我长成了半大小伙子，跟着爸爸哥哥到“电灯房”来当小工子。看見比国鬼住的那兩座考究的楼房了嗎？那都是我們一鍼一鍼地土挖下去，又一塊一塊地砖給蓋起来的。我們哥几个干活干的卖力气，讓工头看中了。随后蓋义国鬼子的球場，英國鬼子的跑馬場我們又都跟去了。因为有活干，哥几个都掙錢，家里这才算是顧得上嘴了。

时节，三哥已經在一家电机厂出师了。認識人比較多，他对我的希望也大。就跟父亲說：“我現在能掙錢了，家里不用他們几个見天見都去掙現錢了。讓老六到三条石德利兴鐵工厂学徒去吧。”

学技术是好事。爸爸贊成，我也乐意。于是乐嘿嘿的跟着三哥到三条石去了。

德利兴机器厂在三条石算是数得上的大厂。光师付就有三十来位，徒弟就更多。当天按了手印，进了厂子。我三哥剛走。掌柜的就給我来了个下馬威，他說：

“于六，告訴你，來这儿要好好干活学手艺，把师付們侍候好了。要是不啊，你可要知道家有家法，柜有柜章，厂有厂規。小心你的脊梁、屁股、腿！”

看掌柜的那副凶相，再瞧瞧徒弟們那份慘样，一下子  
就把我弄的怵头了。我連忙應了兩聲。跟着便由師付領着  
干活去了。

名义上是學徒，实际上學什么徒呀，拿我們當牛馬使  
喎。我干的是炊事員的打雜兒的工作，刷盤子洗碗。完了  
事再跟着师兄們裝卸生鐵，搬弄廢鐵，打扫院子。完了事  
再給師付們做小跑，买点心端飯泡茶。哪个師付叫，就給  
哪个師付干，別說手慢了，就是應慢了都打。師付們打起  
來是毫不留情，把当初他們受的氣都使出來，他們認為是  
多年的媳婦熬成婆，這回可得顯顯威風了。大師兄們也  
打，那就純粹是拿小徒弟撒氣了。

三条石是天津最早的冶金機械發源地，这儿的作坊鐵  
厂子如林似海，都是小本經營。那些厂主們，專一的利用  
小徒工，剝削的都沒了份兒。有人說拿人當牛馬使，說實  
在的，比牛馬都不如。牛馬不是還得讓睡够了覺嗎？我們  
这儿起早睡晚，一天要干上十七、八个小时的活。夜晚几  
十个徒弟滾在一塊睡，沒一个睡够覺的。有些徒弟惊吓得  
睡覺的時候鬧“夢囉”，冷丁地爬起來往院里跑，不曉得  
撞在那里，这才算是夢醒了，趕緊倒頭再睡。一天缺覺可以，  
兩天也能对付，日子長了誰頂得住啊？把我們熬的都  
跟得了大病似的。走着走着道兒就能打盹，撞得頭破血  
出。

在这活地獄里熬了几个月，实在熬不下去啦。这天下午，我借口要回家拿衣服向掌柜的請假，柜上还真准了半

天假。天哪，我可見着太阳了。到了家，我鼻涕眼泪一齐来，抱住爹媽哭着嚷：“打死我，我也不回去了！这罪没法受呀！”

三哥听说我不回去，气得什么似的，罵我沒出息。媽他劝我熬上四年，也就出来了。不行，說什么我也不回去。我算是吃了秤砣，鉄了心啦。

父亲知道我这罪难受，就說：“不去算啦，还是跟我干活吧！”我算是逃出了这座地獄……

1930年的春天，那年我正16岁。从三条石鐵厂子跑出来有一年了。三哥又煩人把我介紹到济南六合櫈灯厂做学徒的。这家櫈灯厂是当时山东省軍閥手下六大处的处長們合資办的，所以名字叫做六合。領東的經理姓焦，这小子是通过他的小老婆和六大处的处长們的关系，才巴結上的这份差事。他的小老婆是軍閥張宗昌的姨太太。这个买卖就是这么烏七八糟的搞起来的。可是表面看，这个厂子有錢有勢，挺唬人。我去的时候，厂子剛剛建成，還沒有开工。工人也沒有招齐。徒工我是第一名。这可真是歪打正着，瞎貓碰上死耗子了。往后来的徒工，岁数比我大的也好，小的也好，通統称呼我大师哥。

厂子开工了，我被分配到机床車間做旋活。表面看，比三条石的鐵厂作坊來得新一些，骨子里可是換湯不換藥，有把头有监工，而且厂子里有規章，不許罢工怠工。对徒工，这儿倒是不用什么卖身契，可是徒弟得随叫随到，沒有工作時間，也是一干干到半宵才打住。也是不准出

厂，不准請假，不准打架。厂方还特地訂制打徒工用的大板子，藤子竿做的教鞭。还有几塊大砖是罰跪、罰站用的。我們徒工，不論那个，誰要是一天沒挨打，那算是交了好运啦。天下烏鵲一般黑。那年月，当徒工到处都是这样受折磨呀！

別瞧我做大师兄和他們一齐挨揍，可是我却不翻回手來，拿师弟們來出氣。我受过苦，知道苦的滋味，大家苦还苦不够呢，怎么还能再罵师弟，再打师弟呢？我从来不打罵他們，而且遇上事总是尽量維护他們，替他們挨打；为什么这样作？当时思想并不清楚，現在可以分析分析这事了。这就是阶级友爱呀，我本能的要这样作。記得有一年，正是三伏天，热的人火燒火燎的，我們整天搬鐵，上車床子，澆鑄鐵活，得使多大劲，流多少汗哪？可是厨房的师付們也欺侮徒弟們，新蒸的馒头不給我們徒工們吃，专把剩下来的，长了老长毛儿的坏馒头讓我們打扫。咬一口臭味熏人，大伙撕开馒头，沒法往下咽，直翻白眼。我气往上撞，自己不吃没什么，大伙都不能吃，我覺着我这做师哥的有点責任。便給出了个主意。把坏了的馒头都往房頂上扔，扔完了再要，要完了再扔。給他扔了个一光二淨，徒弟們就口口声声的喊着要新蒸的馒头。厨師付奇怪，怎么坏馒头都吃光了呢？就来查看，有大师哥带头，小徒弟們都上来啦。跟他吵架。

这家伙不說理，还要唬我們：“監工的來啦，你們不怕挨打嗎，你們要造反哪。”

他这叫喰火。大伙劲头儿起来啦，我也胆子壮啦，就带头喊了一声：“打呀！”话到手到，我一手抓住他的脖领，用拳头朝他前胸来了两下子。徒弟们跟上去了，七手八脚竟把他打倒在地。又踢又踹。

大伙的劲头更高啦，我喊了一声：“搶呀！”我們几十个徒工一窝蜂的跑进厨房，好像饿虎扑食，打开笼屉，把新蒸的馒头给搶了个精光。

还没容我們吃完呢。有个小徒弟拼命跑来喊：“快跑呀，大监工的拿着鞭子来啦。”这一嗓子不要紧，把小徒弟們吓的炸了营，乱窜乱躲，这个监工的也是天津来的，是个流氓出身。整治我們徒弟那是又毒又狠。有好多徒弟都讓他打的發傻了。誰不是吓的藏藏躲躲呀。

他罵罵咧咧的掄起藤条鞭子朝我們乱抽乱打。我身子往后一撤，渾身一热，攔住他說：“喂喂，你別亂打人。冤有头債有主。什么事有我于恩源一人当。”

我才十六岁，看我說話这么硬气，大师哥往自己身上攬不是。把他猴鬼子气炸了肺。他丢开别的徒工揚鞭子朝我来了，咬着牙說，“我今天把你揍死！”

我也火上来了，嚷道：“来来来！今天卖給你兩下！”我拼命向他前胸撞去。

他把我揪住：“好小子，你認打認罰吧，認打，你看見我房內挂的二尺半长，寸半厚的檀木板子了沒有？老老实实挨他二十下。認罰，給我跪兩個鐘头的方砖。”

那年月，挨打不寒碜，矮人一头跪半截身子，那才叫

塞蟲呢。我不能給他下跪。說：“好吧，你打吧！”

这家伙咬緊了牙，屏住了氣，掙開木板，照我后腿狠命打了十板。把我的褲子打開了花，馬上我覺着一陣針扎着的痛，屁股肿起多高。不過，我頂住了，沒哼一声。別說我挨的多痛了吧，連他打人的都累得呼呼直喘。

他歇了歇勁，喘着氣和我說：“好小子，真有骨頭。打一半跪一半。去，拿兩塊磚頭給我跪一個鐘點。”

嗬！我一尋思這小子和我要手腕，攬弄我呀，打成這樣，我還跪得下去么？這不是加倍的折磨我么？再說，我跪着，他歇着，有那麼便宜的事么？打人還得費力氣呢。我就成心氣他：“咱們都是天津人，咱們說話可得算數。你說打我于恩源二十板子。你就打，打掉了屁股決不吾語一声。當着大伙的面，來來來！你打，你打吧！”

這兩句話把他僵住。腦袋一晃，扑過來，狠命又是十板子。這十板子打的更狠。皮開肉綻，血順褲角流了一地，我背過氣去。後來亏師弟們把我抬回了宿舍……

一晃，在六合櫈燈廠干了快二年了。光和師弟們一塊當苦力，正經的技術是半點也沒學會。一想到來的時候，父母亲千叮萬囑，三哥也斜眼瞧我，看我有沒有學本事的決心，我要是空着手來空着手回去，我對得住老人們的心嗎？可是，沒師付肯教，問也白問。怎麼辦？凡事只怕有心人，我抓空兒就偷看師付們怎麼干活，把他們操作手法一一牢記在心里。飯後，他們歇着的時候，我就悄悄溜進車間去試作。學這點本事，真就跟做賊一樣。日子長了，

大路活我算是差不离了。到三年头上，王师付才給一定時間；讓我上車床子摸摸活兒。可是只許我把着車头挑絲，不准自己动手卡活，他还是不教給呀！

有一天，王师付叫我自己上輪，我沒摸過，怎麼上也弄不好。氣的王师付罵了我一句“笨蛋”！下邊還踢了我一脚。用手把我推到一旁，伸手把輪子安上，從这儿起，再也不教給我上輪子的活兒了。教不教在他，可是學不學却在我呀。我就乘他下班的時候，把輪子卸下，試着去安。安來安去，我就找着窍門了。有什么難的呀！

光靠偷藝不行。旋羅絲活怎麼偷呢？旋多大羅絲需要多大數字的系数。這我可沒咒念了。我压根儿不懂數學！湊巧，王师付走了，換了一位黃師付來。這可是個老好人，五十出頭的年紀，慈眉善目的，對徒弟說話從來不瞪眼。過了些日子，他和我說：“你們這些徒弟都規規矩矩的。我喜欢老老实實學手艺的孩子。有什么技术，我都教給你們。決不往棺材里头帶。”

我就跟他说了：“我沒拜過聖人，計算上一窍不通。旋什么活，自己心里沒數。”

黃師付点点头，說道：“我看你是真心實意學本事。好吧，你明天買個紙折來。”

等我把紙折買來，几天的工夫他便給抄了滿滿一折子。旋什么活用多大數，那裏面都有。這樣一來，所有的旋活我都会做了。我有了本事。

看我頂起來了。經理却貪圖省僱工錢，把黃師付辭

了。想不到我做徒弟的竟頂了他老师付的飯碗。怪不得人家不教呢。旧社会逼的人和人之間得藏奸，留后手儿，这件事真把我难受坏了。

可是，六合桅灯厂也沒有站住。經理吃私吃的太狠！連份假賬也交不出。六大股東又逼着他交賬，于是他来了个縱火自焚，好生生地从办公室里起了一把火。这一来，我們工人全都失业了。我拿了遣散費，回天津来了。

在天津，我在資本家办的全利鐵工厂当师付，一月能拿十元錢，后来漲到十二元。生活上比較安定了一些。七七事变以后就又不行了。日本鬼子进关，所有中国人办的铁工厂都受排挤。生活难以維持，我們就辞活了。那年月，机器匠的手艺，沒有車床子是混不上吃的，万般无奈，硬着头皮到日本工厂来干活儿。

我去的那家铁厂叫“东和”。势力不小，工人多，材料多，仓库总是满满的。大伙瞧着又恨又气。再加上物价一年比一年的往上漲，逼得大家生活毫无着落。不管怎样，人总得活呀，一来二去的大伙偷上他了。我們不叫偷，大伙有句行話，叫做“捎他小日本的！”

当时厂里有个叫王錫文的。一家六口，靠他一个人那点工資怎么活呀？他就想出来一个点子，不論天晴天阴，見天見他都离不开一把破雨傘。原来这把雨傘里正好擋几根铁棍，天天他都捎几根走。长了，日本鬼子就起了疑心，問他：“你的傘的什么有？”

王錫文沉不住气了。这一支吾不吃紧，戏法变漏，讓

鬼子搶過來雨傘，把鐵棍搜出。打了他一頓不要緊，還把王錫文拴在馬路的電線杆子上，用皮帶抽。

大伙找我來了，讓我給想想法子。我一說情，那鬼子倒更冒火了，說是“白帽衙門的給！”把人送走那還了得，又去找日本掌柜的。掌柜的看我技術頂瑣，所以另眼看待一番，三說兩說的，把王錫文放下來了。白帽衙門是不送了（要送去，就得押解到日本去做勞工），可是非開除不可。開除不吃緊，事由不好找，他一家六七口，馬上就得斷頓呀。那時候我們還做加活。就由我領頭把包外活做，羅絲的錢都給了王錫文。

王錫文走了。日本鬼是任誰也沒吓住。我們還是偷。

有天，王洪舉準備把鐵棍截短，好拿出去。正用車床切鐵棍呢，讓鬼子工頭一眼看見了。這工夫，我正在後邊庫房裏面拿材料呢，聽見徒弟招呼我，連忙三步并兩步的跑進東和的辦公室。

一進去，正好鬼子田川用木棒子打老王，打一棍子問一声：“你的鐵棍子的什么干活？”

不能看着自己哥們挨打呀，我過去用手一攔，說道：“鐵棍子我的干活。他的好人。”

聽說是我叫老王截鐵棍，田川把棒子放下。想不到事情竟這樣完了。不光完了，掌柜的東和還把田川這小子罵了一頓，嫌他不問青紅皂白就打人。

怎麼掌柜的東和對我這麼大的面子呢？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我的技術不賴，無形中成了工人中的技術頭兒，

鬼子格外看待我三分；一个原因是鬼子有鬼，他也想利用我。从这起，經常他約我下飯館喝酒去。

喝着喝着酒，有回他問我：“于，你的馬車的有？”

我登时就明白了。可我故意給他打岔：“工人沒有錢，馬車的怎么有？”

“不是的！”他擺擺手，“你的外邊的馬車的有。”

我赶紧問他：“你找馬車什么的干活？”

这小子慙的沒轍，說實話了。原来他也要偷。而且要和我搭伙，拉一趟有我一趟的好處。我連一秒鐘的猶豫都沒有，心里的話：“你要是偷了，還有我們窮哥們吃飯的活路嗎？”可我沒動聲色，倒是点头說好，“我給辦，我給辦。”

这小子等了几天，看我沒辦，又約我喝酒，又給我說好的。可是推了几次，这家伙也就明白了：知道我不給他办。把臉一整，老是斜眼瞪我。

鬼子心眼还不小，先來個下馬威給我瞧瞧。故意抓確儿把王洪舉開除了。這是逼我呀。我一尋思，中國人不能給他鬼子干這個，爽性我辭活吧！

从东和鐵工厂下来，我到富源鐵工厂来了。也是日本人开的厂子。机器設備比东和厂好，我用的是大車床，出活挺快。沒干了几个月，日本鬼子又看上我了。把我叫到板房談話：“你的干活大大的好，工头的干活的有。他們通統你的管理。”

什么？給鬼子当工头？我是从挨打受罵里長大的。怎

么能干这个騎在工人头上的事，我当时拒絕了。

过了些日子。掌柜的富源又找着我說：“你的工头大大的好，發財大大的有！”

“我不願意發財，我願意干活。腦筋的不行，”我这回答复的更加干脆。

看我一次再次的不肯。富源这小子倒有个舊主意。把工头的事儿暗暗扣在我腦袋上了。有天，有个工人要鑽头，富源竟把工具箱的鑰匙交給了我，讓我給他拿！

我心里可別扭透了。真還有亏良心，做了多么对不起大伙的事。咱們是凭手上的汗換飯吃的工人，怎么能爬在穷哥們的腦袋上当工头呢？趁晌午大伙歇息，我把事儿和大伙說了。我还真沒有这么沉不住气过。

大伙一听，出我的意外，异口同声，倒說這是一樁好事！他們講的有理：“你想啊，要是你当了工头，那不和大伙当了工头一样嗎？有什么事不就有个遮遮掩掩，事情不就好办了嗎？”

对呀，当工头看怎么当了。我的心不在他那边。由这儿起，我把工头的权限全攬过来了。工具工賬都攬在我的手心里。当天，我就給大伙开了个方便之門。出了好主意：“从今天起，鬼子不在，咱們就做包工活，鬼子来了，咱們就做日工活。”

这一来，把大伙乐坏了。干包工活的时间加多，大伙的工資全拿多了。

光这样还不解恨。从这儿起，我还不断溜进鬼子监工

的屋里去給大家改工賬，將包工的印章“包字”抹下去，打上一个“日”字的印章。这样鬧，大伙更合适了，包工活按量計算，量多了，多拿錢；日工活，戳子多了，多一戳多拿一天的工資。合着我們每个人都是一日双工。鬼子讓我給他管工人，好哇，看我給他管的多好啊！就这样，我們一直胡弄鬼子，直到“八一五”他們垮台，降服。

国民党接收大員来了。富源鐵工厂为伪經濟部接收。原来我是工头，于是大員們还叫我当工头。我心說我这工头不比尋常，是穷哥們的“坐探”，不是侍候你們“飞來牌”的。当工头我不干，宁可餓死也不干，我又辭活了。

朋友們介紹我到伪中紡七厂原動部来了。凭我的手艺，凭我的經歷，楞給評了个三等工。三等工就三等工，反正比当工头心里还好受一些。

到了国民党办的工厂，好呀，比鬼子办的工厂还复杂，帮派橫行，到处都是把头。当时原動部的大把头叫何文甫，还有一个就是南市流氓头子××的徒弟。这两派是大眼瞪小眼，暗地里叫勁。有天，何文甫叫我到他办公处开会。我不知是什么事就去了。

万万想不到何文甫开的是国民党的党会，把国民党布置的当前任务，大批拉攏工人扩大势力，侦察进步工人，防諜防“奸”的任务都說給大家听了，隨后就說我們原動部的××是青帮分子，不听从他的調度指揮，接着竟把我抬出来了，說是：“兄弟們，今天在这个会上我保举于恩源于师付当班长，大伙看好不好？”下面都是他养的一撥

子狗，就齐声开哄，炸窝似的喊：“好嘛，好嘛！”

鬧了归齐，还是讓我当工头呀？我要当工头何必到你这儿拿一个三等工的工錢呢？當場我沒好反駁，下來我可不客气，當場謝絕了。何文甫挺不滿意，咧着大嘴說：

“唉！你这就不对了，我連我們党的秘密都跟你說了，咱們有交情嘛。別客气了！于老弟，咱們好的时候还在后头呢。”

那年月，我是这么个处世哲学：占便宜的事，咱們不攬，吃亏的事咱們不干，能惹的惹，不能惹的咱們躲。不过，到底还是沒有完全躲清，后来还是和××拜了一把子盟兄弟。我心里却始終和他合不到一塊去，記得為了一丁点小事，就和××打过兩架。唉！勾心斗角，那碗飯可真是不好吃呀！

解放战役中，棉紡七厂原有国民党炮兵，所以滿大的一个厂子都被炮火轟毀。单单留下了發电厂部份。解放以后，这部份便改于庄發电四厂了。我这才算是正式成为电厂的修配工人，算是专做汽机保全工作了。

翻身之后，我要說的話可多了。生活变了，地位变了，思想变了，一切都变了。但从我切身來說，我觉得变得最大的还是这些：以前，我好像只会干活，可是解放后，我逐漸發現我不光会干活，而且还有时想創造、捉摸一些什么。劳动和創造，这是工人的最大特色。开始我想了一点改进、創造，这都是自然而然的那么随便一想；但是党却抓住这星星点点，又支持又鼓励。后来有了些成

績，本来这些成績都應該归功于党，但居然讓我做了好几年的劳动模范。这些事迹大致是这样：

1953年在發電四厂改建水泵，評做市級勞模。

1954年在發電四厂設計上煤工具，又被評做市級勞模。

1956年發電四厂和三厂合并，我这才調到三厂的汽机分場。三厂的設備，虽然在解放后發展得是一日千里，但在新中国的电业發展史上却早已是提都提不上的一一个又小又旧的厂子了。可在我眼睛里却还是头一遭見过这么大的場面。好在是解放了，从心里有那么一股要做好，也敢做好的勇气。所以困难越大，問題越多，自己倒是越来越勁儿，一年当中，有几項改进。比較突出的是創造了危急保安器，在汽机上安上这玩艺，一有事故馬上就可中斷。再不会發生什么危险。这一来，电厂的安全問題，便更加有保障了。这一年，我不仅被評做勞模，而且有个報紙还記載了这些事，說我是什么千手于。使我非常不安，但也确实給了我很大鼓励。

1957年改进風泵压力簧片，縮短升压時間一分鐘，延長了寿命，还解决了运行与維修爭着用風的矛盾。过去簧片一天至少要坏一兩次，改进以后，六七个月才坏一次。为这点成績，我又被評做勞模。

1958年大搞双反运动。我是工会生产委員。必須带头上陣突破保守思想。电厂的历史比較长，机器陈旧，有些老工人的思想也陈旧，不敢突破常規，干什么都凭老經驗。这些老經驗有不少是不能适应咱们大躍进的时代了。得把

它擰走，於是我們組織了一個老年機智突擊隊，專門負責解決疑難問題，“攻打關鍵”。用實際行動把老年工人的腦筋打開。在反官僚主義上，也不簡單，我們和青工一起搜集廢料，預計要獻價值黃金 800 兩的東西，結果完成了 1000 兩還多。1958 年是大躍進的第一年，事情特別多，我一生中印象最深的一樁事也發生在这一年。那就是開始制作 6800 匹的發電機。

事情是這樣：大躍進聲中，毛主席到天津視察來了。在參觀工業展覽館時，他對電業職工指示說：“發電廠可以搞點製造。”黨委根據這個英明的指示，決定利用原有的汽輪發電機的轉子，自制一台 6800 匹的汽輪發電機（包括整套的附屬設備），這個重大的任務在發電廠來說，自从建廠 54 年以來還是頭一遭。我們檢修分場修配車間仅有幾台皮帶式的舊車床、一台小龍門刨、一台小牛頭刨。十幾個老年工人還身擔着五台機輪發電機、十三台式樣不同的鍋爐大小修任務，除此以外就是百十個青年工人和徒工，他們之間有新從學校轉來的，有從農村來的，大部份是新工人。

從製造一开始就把這個繁重而光榮的任務交給了我。我帶領着一部份檢修工人就開始了製造工作。通過參加工作的同志們研究，個個斗志昂揚。但是困難的關鍵問題重重出現，比如十几噸重的高、低壓缸大鑄件的加工，光靠我們現有的幾台小床子是啃不動的。我想我現在是一個工人提拔的工程師。困難再大也不能向困難低頭，再者黨交給我們這項製造任務正处在目前電網緊張，需要生產大躍進的

日子里，能提前多发一度电，那就是多增加一份巨大的动力。何况我們制造的是6800瓩汽輪發电机呢。当时我就想起了党教育我的話，有事多想想，多和群众商量，就沒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所以我就根据党的話，通过苦思和學習別厂的土洋結合的办法，提出了一个大型土立車床的草圖；找来了工程技术人员和我們一起工作多年的老工人王桂林同志共同研究。反复研究修改，一台用洋灰作成的三米八立式土車床便設計成功了。解决了大型鑄件加工的困难。

另外，在土車床加工低压缸滑动面时，遇到了沒有大立銑車床不能加工的困难，我就主动的帮助王群瑞、王桂林兩位师付研究出利用土立車床上加小車头，用螞蟻啃骨头的方法代替了大立銑車床。后来又听取同志們的意見，使手动进刀改为土法自动进刀，加大进刀量，同时用三把刀旋活，提高效率四倍。旋高压缸找正是一項精密細致的工作，我們沒有找正工具，針對这个困难，我又和老同志們研究，提出了“四角針點”找正法，使旋高压汽缸的任务順利完成，平面瓢偏最大在0.1公厘以內。直徑椭圓度在0.2公厘以內，不亞于制造厂的加工件。隔板槽的間隙最大差0.6公厘以內，达到合格。

党教导我們作为一个生产战綫上的直接領導者必須經常关心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才能更好的發揮群众的积极性。我在领导自創6800瓩汽輪發电机工作中遵循着这一指示，哪里有困难我就到哪里去，不分黑夜白天亲自到

現場指導，多方面注意安全和質量的檢查，抓住關鍵，然後找大伙商量，發揮群眾智慧。群眾干勁沖天，困難關鍵問題真是手到擒來，不但在繁重的起重工作中沒發生任何事故，保證了安全，組裝也找到了一些製造經驗。

1959年9月26日，在苦戰八九個月的口號能下，6800瓩發電機，最後完成了。做為向偉大的國慶十年的一項獻禮，我們把捷報一直送到北京去。

這一次的製造任務給我的教育意義很大，我現在正和伙伴們一起等待新的任務。我們正為製造一個一萬瓩以上的發電機在做準備呢。

(廠史編寫小組 整理)

# 趙樹才

趙樹才口述

我們發電三廠背後是金鐘河的旧址。几年前經過人民政府的整理，已經變做一條大馬路了。但是，要回溯到先前，這條河却是船舶云集的一條水上要道。兩邊都是碼頭。碼頭上自然少不了裝卸搬運工人。這兒是個工人成長的地方。我們家就在这條河的左岸。從我爷爷起，几輩子都是干苦力，拉地排子車，後來又拉膠皮車。我是从小就繼承祖業，打十五歲起（實際是十三歲）就干這一行，拉小套①。

但是，我生的時候太晚了。金鐘河已經堵塞，拉地排子車已經不行了。我們左近的人們又有了新的職業，大半是去豬鬃廠摘豬鬃，給洋行做出口加工业務。我是跟我叔叔去的。這個行業可是苦啊，整天在塵霧當中弄豬毛，把人嗆得犯嘔。好多人都得了喘病。再說，規矩也嚴，雖然我歲數很小，還是任什麼也不懂呢，可我就看不慣。出去

① 拉小套是指拉地排子車前邊的繩套的。

大小便都得自动和头儿說一声“我解手儿”，然后双臂一抬，双腿一叉，讓头儿前后左右一搜索，連胳肢窩都摸遍了。猪鬃是出口的實重物件，誰也休想夹带一点出去。別瞧規矩这样严，錢还不多賺，一天的工錢，不够我吃兩頓飽飯的。罪过太难受，我不干了。好在家里見天見都是一鍋山芋面或高粱面熬紅羅卜，飽不飽就这一鍋。实在餓得睡不着，就来点半空花生嚼，“餓也餓習慣了。不去就不去吧。

稍大一些，我經人介紹到电厂前边那家日商醬油厂来了。是个小厂子，攤总三十来号人。大伙團結得很緊。从翻譯到會計，到工人通統串在一起，給鬼子來个大偷大运。比如說鬼子向外發100瓶子醬油，我們运出去的就是130瓶子。这多余的醬油卖掉，一人分一份外快。虽然有这一份，究竟生活还是紧，而且瞧着鬼子不解气，大伙还自行捎帶。这可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誰捎出去是誰的。为了捎醬油瓶子方便，我还特地做了个又肥又大的棉袄，里面縫着两个大口袋，一下子能裝好几瓶醬油。別瞧醬油捎的不少，一回总有十来斤，可是家里却一点也舍不得吃，都卖給飯館了。这天不巧，我下工的时候，正好鬼子从外边回来，一拉大門，瓶子碰瓶子，卡登卡登的直响。一下子讓鬼子抓住，用鞭子抽了我一頓。鬼子真損，抽完了，还从脖領往里澆涼水，冻的人渾身打哆嗦。随后，大伙劝着，这才算完事。不过，涼水也沒鎮住我，当天下午，棉袄还湿着，我就又捎了几瓶出去。

“八一五”以后，醬油厂被国民党“劫”收一空。厂子不得不关门大吉。我們工人都失业了。一失业我就去干老行当，又去拉地排子車。和我一起拉地排子車的有位張師付，他是当时电厂的推灰工。有同和我說，“推灰工人少，你要願意，我給說說，上班來得啦！”

那我还有什么不乐意的。沒几天就进了电厂。那时候推灰工的活儿真不是人干的，干一晚上能拿到七兩棒子面。下灰的时候嗆得人喘不上气来，溝里面淨是流的水，水里有硫化碱，人們多是光脚丫儿推灰，沒一个不燙脚的。有人穿着破鞋也不頂嗆，有时爛肉竟和破鞋粘在一起，連脫都脫不下来了。晚上推一夜的煤灰，轉天一早再去拉地排子車，这就叫日夜連軸轉，根本沒有睡覺的時間。那时候不是睡覺，是打盹儿，等排子車活的时候，眯糊一会儿；晚上推灰的时候，大伙抓个空儿，只要特务張七不在，有的在鍋爐房，有的在烟囱道里，鋪上一塊草包袋，枕上兩塊砖头，就睡它个半小時的。那几年就沒有睡过整宵的好觉。直到解放了，翻身了，这才有了睡覺的自由。

自然，解放了，給我們的自由太多了，何止生活上的，這一点点！党还給了我們發展的、供獻才能智慧的自由。

1952年，領導上提拔一部份青年工人进鍋爐房，看我身体壮实，就調我去学司水。車間林主任和我一說，立时感动得我差点儿掉出眼泪来。过去，我們一个推灰的臭工人，凭力气換飯，誰教給一点技术呀，那有一点發展前途

啊，这真是过去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当天回到家里，躺在床上，翻过来调过去的，怎么也睡不着，我自己暗暗叫着自己的名字“树才，树才呀，你一定要好好干，要对得起党呀！”

过去学徒要三年。在电厂里学本事，师傅怕徒弟将来偷了饭碗，所以什么也不教给。但是在新社会里，三个月咱就出师了。车间主任把我派到小炉上去，那个劲头可足啦。像是入了迷，有谁请假，我就替班，星期天我也舍不得休假。大伙都说我年轻小伙子肯干，其实不是肯干不肯干的问题，是我在报答党对我的培养教育啊。

转过年来，1953年的春天，十三号炉的师傅支援新建电力工业，调太原工作去了。组织上竟调我去接老师傅的后手。虽然我又兴奋又欢喜，知道这是党在培养我，可自己总是心虚，炉上的老师傅们工龄最短的也有七八年了，我才刚刚学了一年，就上这么大的爐子，这能行吗？未免有些嘀咕，想打退堂鼓。

针对我的这种顾虑，支部书记亲自找我谈话。问我：“小赵，工作怎么样？有嘛困难？”

“工作很好。就是有点害怕，怕完成不了任务。”

杨书记看着我发笑说：“别怕嘛，什么事全得有困难，有困难咱们就克服。千万别怕。你越怕它越欺侮你。多找老师傅学学。不懂的咱们就问。怎么样，有信心了吧？”

这还能没有信心，我气足了，连忙答道：“有信

心！”

随后，楊書記還拍拍我肩膀，說：“小伙子干吧！有困難多依靠黨。”

干哪，我胆子大了，把担子挑起来。

干哪，漸漸我还發現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也是歷來的老問題了，鍋爐里的水面不穩，不是發生干鍋，就是發生滿水，不光威脅安全發電，而且還影響國家經濟收入。可把我急壞了，整天上班下班，吃飯睡覺全琢磨這件事。

楊書記知道我琢磨這個問題，又找我談話，這時我已經入黨了，信心更足了，覺得應該敢想敢干，攻下這個堡壘。

沒有不能琢磨的事情。漸漸我找出一些經驗來了。水面不穩是由于水的循環不好。循環不好是火苗的問題，火苗的好壞是煤的問題。可是煤都是好煤。那麼問題一定是在操作技術上了。我就順着操作技術的這個路子研究起來。不久我就發現煤燒的不勻，怪不得火苗有高有低呢。我試着從風量上掌握。水往下落我就用吸風調，水漲時我就縮吸風。這樣一試，果然水面平穩了，鍋爐效率也提高了。看，就是簡簡單單的这么點事。

誰想到，大伙竟把我評做1955年的勞動模範了。而且，1956年四月還派我去首都參加“全國電業先進生產者代表會議”。更榮幸的是，在會議期間，有天，我們忽然得到通知，毛主席要接見我們全體代表。我們是在懷仁堂見到他老人家的，不光見了毛主席，而且還見到許多黨中央的負責同志。當時激動得我流下了眼淚。我是一個拉地排子

車，推灰的工人啊，居然能見到毛主席。我想見他一次，這輩子足了。

不，黨還給了我第二次的機會。1956年9月30日，國慶的前一天，就要下班的時候，書記突然叫我去。說：

“老趙，明天請你到北京觀禮去。”喜歡的我蹦了起來。第二天，我就到了北京，還居然佩着觀禮証，到觀禮台上來了。我又一次見到了毛主席，而且不光看到毛主席，還看到了那浩蕩的充滿了建設社會主義激情的几十萬人的游行隊伍。……

黨給了我這樣的榮譽。我應該怎樣努力工作來回答黨的关怀呢？這是几年來，我一直想着的問題。

（楊詩、胡寧 整理）

## 王庭芳

王庭芳

別瞧我說着一嘴天津話，說實在的，我却是山東省陽谷縣生人。提起來武二郎景陽崗打虎的地方，都知道吧？那地方離我們住處不遠。再細說，我們還不算山東人，而是從我老爺爺那輩起，逃荒逃到山東來的。聽長輩們說，老爺爺當時挑着一副擔子，前筐里放着我大爺爺，後筐里放着我二爺爺餓着肚子來到這裡。然後便利用這副擔子挑水燒水，開了個水灶。那時候，山東水運繁盛，來往旅客很多。所以就靠着這個水灶，老爺爺，爺爺苦苦熬了兩輩子。

生我以後，母親得了一種營養失調的病。有病沒錢治，光拿身子耗着，耗到後來，母親一命嗚呼。父親在家里呆不下去，便帶着我一齊奔了濟南，隨後又由濟南輾轉來到天津。那正是1937年的春天，蘆溝橋事變的前半年。一下車，我們就投奔“電燈房”來了，因為我們一位叔伯兄弟的舅舅在電房子燒鍋爐，便在他家先落腳。

事由很难找。好不容易才被荐到織袜子的作坊去。因为岁数小，干不了重活，只叫我纺线轴，纺了十个，我给坏了五对。内掌柜的火了，连一顿饭都没管吃，把我撵回舅舅家。

事由很难找。好不容易又被荐到三义庄丁記饭馆当学徒。洗碟子刷碗，抬煤倒土，这活儿咱们干得来，唯有一样，还得外饶着挨打，受骂，招气。掌柜的是变着法儿来收拾折磨小徒弟。咱是阳谷县武二郎打虎左近的人，受他这份整治啊，没那么容易的，熬了半年，咱王庭芳不给你干了，赌气溜走。这一来，没地方糊嘴了，我呆在一个乡亲开的饭馆楼上，长了一身的臊疥。饥一顿饱一顿的；瘦的不像样。可我并没闲着，看了不少的书。自然啦，那年月我也摸不着好书看，看的尽是剑侠书，什么三侠剑啦，青城十九侠啦，虽然看得晕头晕脑，但是社会里的不平等现象，有的人吃穿不尽，有的人成天混不上一饱，这些事却一直在我脑子里转。转来转去，自己给自己找到一条道路，打算跟一个老和尚去五台山修行。倒不是看破红尘，而是想着学点武术，将来也做剑侠，抱打不平！幸亏我父亲注意上我了，看我看的很紧。我呢，也舍不得父亲，觉得他太苦了；我怎么能撂下他呢？总算没拔腿。

1938年的冬天，也就因为舍不得父亲，我们爷俩一齐去当了华工。我们去的地方是山西段家嶺至宣岡鎮一带的铁路工地，我们受的罪那真是年青一代人们想也想不出的。

刚一到段家嶺工地的时候，大约吃了一个星期的面

食，以后就变样了，弄了三十多袋又黑又生芽子的大土豆，鹽也沒的吃，成天叫人們吃开了白水煮土豆。为了讓勞工們无处藏无处跑，給勞工們發了一种特制的“囚”衣，每人都罩上一套麻袋大衣麻袋褲，麻袋帽子麻袋鞋。老远的一眼望去，个个都是高个儿，腰溜圓，每人扛着一把大铁銑，真是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又冷又餓，头頂着槍子干活，誰肯使劲啊？日本鬼子就叫監工来打大伙。最可恨的要屬監工小林了，他每天瞪圓了母狗眼，不是嫌这个除土不用劲打一棒子，就是嫌那个背土走的慢来一下子。監工們太狠了。他們狠，倒教育了我們大伙，大家抱团抱的很緊，而且火頂腦門，恨不得整治他們一頓。

有天，我听说日本二掌柜的，叫西馬达的到工地上来检查。为什么要到我們这儿来呢？是包工大柜的朱八在鬼子面前夸下海口，說我們这一帮工人一个頂十个干，从来到山西沒跑过一个。西馬达登时挑大拇指，喊着：“朱家大柜干活的頂好頂好。”一听这消息，我登时便計上心来，覺得打小林的机会到啦。

怎么打法呢？我找了兩位在外边創蕩多年的流浪汉徐大爺和刘大爺說：“你們二位合計什么呢？有什么高招教給教給我！”

“你过来！”他們就对着我耳朵叨咕了一陣子。……

轉天，天還沒大亮呢，鐵鎗子就当当的敲了个山响，我們連忙揉了揉眼，伸了伸腰，一人喝了一碗谷子和黑皮土豆煮的粥。拿起鐵銑，頂着風寒上了工地。到了工地我們就

扯閑天，大家一齊“捏窩窩”，故意一字兒排开，站在鐵道一邊，手扶着鐵，不干活。

小林从山弯子外轉来，老远就喊：“为什么不干活？”奔过来，举起打人的大馬棒，照着每个人的屁股上就是一下。打来打去，打到我这儿了，不动声色，我只用力把鐵銚往下一插。就听叭嚓一声，小林的大棒子被洋鎬打斷了。小林吃勁不住，往前一栽。乘这工夫，我来了个順手牽羊，小林鬧了个大趴虎，刘大爷一脚踩在小林的大膀上，喊了一声“打！”，十几个人都涌上来了。

“快跑，快跑呀！”徐大爷是去巡風的，这时从山弯子轉过来喊給大家听。

大伙撒腿就跑，給他來了个死无見証。唯有我沒跑，反倒抄起小林打斷的半截馬棒，朝西馬达跑去。到他跟前，我一个半大不小的孩子，裝着哭喪臉的樣兒，給小林这小子告了一狀。我說：

“西馬達掌櫃，小林的每天的苦力的‘三賓’的給。你看，我的大腿打坏啦，苦力們的打跑啦！”一边說着，我一边把打斷的半截馬棒給西馬達看。

这时候，正好小林破口大罵，發瘋發狂的赶来。西馬達火儿了，过去喊叫小林：“你的苦力通統的打跑啦！”

小林怔住，連忙行禮。行禮也不行，西馬達上前跨了一步，嚷道：“苦力‘三賓’的給的不行！”緊接着掄起他那小蒲扇似的大手，一連打了小林兩記耳光。

把小林打的雙臂直垂，一動也不敢動。我們工人們都

回來了。哈哈，大伙可開心了。這是我參與的第一次的自發鬥爭，以後我摸着了門道，動不動就來這一手兒。

不過，我們當時並不願意只搞這種報復式的鬥爭，我們都想要當八路軍去。我們住的那个村子，白天鬼子兵在村口上放哨，大搖大擺的；太陽一偏西，他們就立刻扎在炮樓里了。從我們一去，見天見夜裏都有鬼子兵失踪，被我們八路軍游击队摸了去。把我們喜歡壞了，恨不得有一天能沖出去找八路軍。後來，日本鬼子在山頭上挖了个大洞，控制住制高點，以為這樣萬無一失了。哪想到我們游击队用大繩子拴了一個洋油桶，桶裏面裝滿了炸藥，乘刮風的時候把它從山上滑下來，隨着繩子還滑下兩個勇士來，把洋鐵桶送到山洞的小門上，然後兩人揪住繩子的兩頭，把桶子慟進山洞里，把十來個鬼子給炸了个粉碎。

後來，游击队的活動發展到就是白天晌午的時刻也不起來了。這天，正是太陽晒得足足的呢，從山澗里來了三個身穿半新白皮褲祆的老百姓，牽着三四馱着滿滿的麥秸的小毛駒，他們胸前都帶着良民証，通過卡子口一直到我們工地上來了。離我們不遠，他們把毛駒拴在棗樹深處，從麥秸內拉出一把歪把子，兩支駁壳槍，往皮祆里一按。一個人扛着歪把子跑進鐵道的橋底下。另兩個人就搖搖晃晃朝我們干活的地方來了。誰也睜着兩只大眼，可大伙都裝着沒有瞧見，自顧自己的活兒。他倆過來了，拿起小麻袋和我們一起背上，一扎就扎進了人群里，鬼子也分不出他們是誰來。干着干着活，太陽偏西了，十來個鬼子兵和

兩個監工的都圍在一塊兒烤火，我們干活的，手冷不過，也可以到上邊蹲一會兒再下來。我和一位李二伯也上去烤手了，他們倆也跟上來了。蹲在旁邊，一邊烤着手一邊問：

“老乡，從哪兒來的？”我一听是天津一帶口音，就說：

“我們都是從天津叫日本人招來的，也有他們抓來的。”

有个黑臉的就說：“咱們都是老乡呢。”接着那另一个人就說：“老乡們別烤啦，快下去干活。”這句話透着硬，有點命令的口氣。我們倆挺乖覺，立刻溜下來了。剛下來，就聽上邊一陣子駁壳槍響，嘎嘎嘎，咕咕咕，十來個鬼子全倒下來了。大伙一扭頭，眼巴巴的望着這兩位游擊隊員，他們真沉得住氣，把十來杆大槍都背在肩上，朝炮樓走去。炮樓上的兩個鬼子兵趴在里面，一動也不動。這兩位围着炮樓子轉了一遭，看看沒有動靜，以為鬼子兵都給打死了呢，就想往回走了。但沒想到那兩個鬼子兵爬起來，接連响了几槍，把那位中等身材的大腿打傷。這時，橋下邊的歪把子嘎嘎嘎的一陣響，立刻炮樓里槍声隆下去。兩個游擊隊員搀着那個受傷的同志走去。

這些事給我的印象太深了。真恨不得馬上跑到八路軍那裏去。事實上也不斷有人跑走。可惜，我光轉念頭沒有動腳兒，因為我讓父親給絆住了。總不能把他孤零零地丟在山西呀。不過，我却接受了斗争的影響。总是要反抗，而且一直向往着黨。……

我是日寇接管“電燈房”的前些時候，經我舅舅介紹到廠里來的。在鍋爐房燒鍋爐。不久，日寇就接管了廠

子。鬼子一来，压榨的更露骨，更瘋狂了。工人用流血斗争換來的养老金，兩袋配售白面和煤賞錢都沒有了。還建立了“三人連環保”，下班要搜腰，把工人整治的連牛馬都不如。咱能看得慣這些嗎？咱得跟那些八路軍游击队學，給他們來個出其不意的。

這天，下班了，我沒有就走，先把飯罐里的小米飯湯在大汽管子蘭盤上加熱。熱得滾開的，我這才跑到前門。門口上，工人們排成了一列，正等着走狗馬大腳搜腰。

馬大腳一邊讓工人們挨個給他張開雙臂，一邊嘴里還罵罵咧咧的說：“走，給我快走！”說着，輪到我了，他扭了我一眼，立刻就翻飯罐，我趁勢一松手，于是一罐熱滾滾的稀飯湯都潑在馬大腳的手上，脚上了。燙得這小子啊呀啊呀怪叫。嚷道：“好小子，你故意弄稀飯燙我！好，老子揍死你！”

我忍住笑說：“咦，飯罐子本來是盛飯的嘛，誰叫你來翻它？”

說得他無言可答，從我手中奪過飯罐，死命朝洋灰地上一摔。我心說，摔就摔吧，反正你小子讓我給燙啦。

以後，我又照方抓藥，把邢三整治了一下。邢三是誰？邢三原名叫李文森，是個白俄監工，專一的拿着鞭子抽打工人，長着一副吊死鬼的臉，見人總是苦臉蛋子，大伙想起天津當地傳說，邢三上坟的故事了，就給他起了这么一個外號。這天，我正彎着腰推着煤車往14號爐運煤。走到半路腰上，惹着這塊洋料了。他抓住我的后腰帶，連推帶

罵的喊：“你的不使劲，快推，快推！”

咱吃他这个又推又操的嗎？气往上撞，我一轉身跳到煤車前面，大声罵他：“你他媽的推。爷爷沒勁兒。”

邢三的鷹鉤鼻子上直冒汗珠儿，抬手就要打人。咱不能挨他的，往后退了兩步，罵道：“邢三，你有种跟爷爷下邊打來。”

罵完回头便跑。这下，可把邢三氣炸了肺，他抬腿就追，我就緊着跑。跑來跑去，我跑到12号爐子前头，正好鬼子山田在大罵推煤工人，嫌推煤推得太慢呢。我心生一計，弯腰鑽過煤牆洞，裝着很害怕的樣兒，跑到山田跟前說：“山田先生。你看李文森的‘三寶’的給。上邊推煤工都叫他打跑啦。”正好邢三也從煤牆洞里爬出來，朝我扑上来。我更有詞兒了，便說：“你看，他這不來了嗎？”

山田這兒正着急工人老是推得慢慢騰騰，煤不頂噸呢！原來是監工的把工人全打跑了哇！山田上去，嚷道：“你的什麼的干活？工人‘三寶’的給的不行。跑啦，跑啦的有！”

工人們一看有熱鬧可瞧，誰不是給他加把子勁啊？都過來指着邢三喊：“都是他把人打跑的。煤才上不去。”

山田一听更急了，伸手把邢三拍、拍打了幾下。邢三呆在那兒，居然委委屈屈的咧着大嘴直哭。我們看着可開心了。

是不是解解氣，尋尋開心就滿足了呢，并不滿足。誰不是窩着一肚子火在想鬥爭的辦法呢？有天，我們鍋爐房

的一班工人，被监工的吆喝了一声，十来把铁铣都给他撂下了。大伙七言八语的挤在一塊又扯开了，都說：“不能給他們鬼子干！得想法子啊！”

我說：“告訴你們哥几个一点活路。人家胡头班的人，有的跑单帮，有的去賣家大桥打毛子工，一天能賺好几塊‘大棉被’票①，你們說咱們呢？”

“咱們給他外邊干去，給他拆台，擋車。大伙齐心不？”

“齐心！誰要是心猿意馬，出門讓電車軋死他！”

“对，電車軋不死，來個驟車也得撞上他。哥兒們抱团，干哪！”說到这儿，大伙还对瞧了一眼，算是盟誓。

接着，我們就又拾起铁铣，喊着“一、三、五、二、四”地低头干起活来。

这时候，富根大模大样从后楼走进鍋爐房。他看我們大家干活干的还起劲。这小子竟說：“干活大大的好。”說着要过一个煤罐来，哈腰伸腿，也往爐膛里添煤，招呼大家向他学。

，“干哪！干哪！加油干哪！”副班长催着大家，一边就拿大火扒扒灰。

火越燒越旺，唿唿的，連安全門都起劲了。富根咧着大嘴带笑地说：“頂好的有，頂好的有！”

“哎呀！哎呀！”乘他高兴的这时刻，我蹲在地下裝病造魔，嚷道：“厂长先生，我肚子痛，哎呀！我站不住

---

① 指伪币一元票。

啦。厂長讓我回去吧。”

富根这小子最会收买人心。居然叫值班的电工楊文貴到他家取藥。給了我一个藥丸，这才說：“你的回去。”

我捧着肚子出了大門。聞了聞那藥丸，一股子大烟味儿。真他媽的会盗买人心，順手給他扔在馬路上。

次日早晨八点钟光景，我們約好的几个工人都在电灯房东胡同集合起来。人不算多，有几个沒来的，可是一打听，进厂的只有把头和另外兩个人。工厂的大門已經上了鎖，鬼子怕沒有接班的人，把胡头那一班的人整个扣住了。总算不賴，哥儿們心齐。

我說：“好吧，咱們別在这儿等啦。这儿离厂子近，不太保险。走，先找老梁去。他大概是讓梁大嫂拖住了脚。”

我們找到了梁师付，跟着他一齐到北站打短工“卖現錢”。真是什么鬼年月，在北站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沒碰上一个找人干活的，大家正起急呢，突然从南边开来一輛日寇抓人用的軍車。我一看来势不好，急忙招呼大家：“腿上加油，馬上走人哪！”只是腿再快，也沒有車軛轉的快，卡車已經停住，鬼子已經跳下車来了。逃走是来不及了。怎么办？人多智广，也不知是誰一眼看見馬路左边有輛轎車，正好机器坏了，停在那里。我們就一窩蜂的奔过去，推車便走。下来的日本鬼子干瞪了兩眼，沒敢抓人，他誤以为是坐汽車的人雇我們推車的了，不知里面坐的是什么人物，另抓別人去了。

一关躲过，二关难逃，我們一看在外面干临时工是腦袋拴在褲腰带上，也不是路。熬了八天只好硬着头皮又回到發电厂。斗争的道路还是找不着呀！

解放了。炮火剛剛停下来，我就从家里挖的地窖里跑出来，大踏步儿向工厂跑去。我爱人剛剛生产，只是我的心顧不上她了。再重要也沒有协助接管工厂这事儿重要了。瞧見軍代表，虽然我从来沒見过他，可我就像見了亲人似的，一面高兴，一面后悔，“如果那年在山西我跑过去，不管我爹，那我現在不曉得做了多少工作了。”

組織上也很重視我。第一次成立党課學習班，便吸收我参加。學習的內容是黨員標準，黨綱黨章，革命史等等，对我來說，真是有生以来头一次开窍，眼界开了，心胸大了。我这才懂得党的崇高和偉大。我的决心很足，要一辈子跟党走。

只是，我的觉悟不高，我還不能全心全意为了党，和党员的标准还有距离。过了些时候，我得了肺炎，在我病中，得到党組織上的关怀，特別是1950年电厂党支部整風，給了我很大教育，我深深体会到党的英明和正确，所以当党在發电厂第二次吸收黨員的时候，我便第一个交了志願書。不过这已是1952年了。

話还得从得病的事兒說起。病剛好，還沒有恢复健康呢，我就要求上班了。不这样作当时心里不舒服，一个工人一歇多半年，誰受得了呀？党組織怕我身体吃亏，也懂得我这迫切想要工作的心情，准我上班，但不叫我干司爐



2 016 6964 9

的重体力活，跟老工人耿庆祥一块做钳工，干些轻便活儿。耿师付是个党员，对我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有时连我喝水他都管。身体渐渐好了，我也要强，所以在大修13号爐的紧张工作中，我也没有因为身体不好掉队。以后，厂内哪有工作我就到哪去打游击。下班以后，我不是进学校的大门学习文化，就是进工会的大门做工会工作。我是打三厂的工会一成立就担任小组长兼合理化委员的，后来就越来越多的搞起工会的工作来了。我的工作能力虽不高，当时的信念却只有一个，工人翻身了，能力低，也得好好干，好好锻炼！

1953年的春天，党组织又调我到市委党校初级班学习。一去又是半年多。在党校放暑假的时候，我因为半辈子没休息过，休息起来筋骨都觉得难受，便白天回厂，帮助工会搞工作。当时正是工会开展群众思想检查的阶段，很需要人手。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就抓紧时间温习党校功课。晚上回到家里，因为街道上正在搞普选，我也参加了这一项活动。虽然每天都很紧张，但我的心情却是十分愉快的。

从党校学回来，组织决定叫我脱产搞工会工作，工会改选时，我被选为基层工会的副主席。光阴过得真快，一晃我在工会工作了七个年头了。但是，我的工作做的还有许多缺点，我要继续努力，对于一个年轻的工人来说，这只不过是刚刚迈了第一步。

